國　立　中　央　大　學

歷　史　研　究　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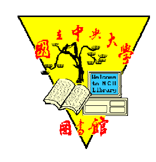
碩　士　論　文

從民主人士到人民公敵：章伯鈞的政治轉折

研 究 生：林　威　志

指導教授：齊茂吉博士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九 年 七 月



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
碩博士論文電子檔授權書

(98 年 4 月最新修正版)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全文電子檔(不包含紙本、詳備註 1 說明)，為本人於國立中央大學，撰寫之碩/博士學位論文。(以下請擇一勾選)

(○)同意 (立即開放)

( )同意 (一年後開放)，原因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同意 (二年後開放)，原因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同意 (三年後開放)，原因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不同意，原因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非專屬、無償授權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與國家圖書館，基於推動「資源共享、互惠合作」之理念，於回饋社會與學術研究之目的，得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紙本、微縮、光碟及其它各種方法將上列論文收錄、重製、公開陳列、與發行，或再授權他人以各種方法重製與利用，並得將數位化之上列論文與論文電子檔以上載網路方式，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

研究生簽名: 林威志　　　　學號：951205008

論文名稱: 從民主人士到人民公敵：章伯鈞的政治轉折

指導教授姓名：齊茂吉 博士

系所 ：歷史所　所　☐博士班　■碩士班

日期：民國 99 年 7 月 26 日

備註：

---

1. 本授權書之授權範圍僅限電子檔，紙本論文部分依著作權法第 15 條第 3 款之規定，採推定原則即預設同意圖書館得公開上架閱覽，如您有申請專利或投稿等考量，不同意紙本上架陳列，須另行加填聲明書，詳細說明與紙本聲明書請至 http://thesis.lib.ncu.edu.tw/ 下載。
2. 本授權書請填寫並**親筆**簽名後，裝訂於各紙本論文封面後之次頁（全文電子檔內之授權書簽名，可用電腦打字代替）。
3. 請加印一份單張之授權書，填寫並親筆簽名後，於辦理離校時交圖書館（以統一代轉寄給國家圖書館）。
4. 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上列論文，應依著作權法相關規定辦理。

國立中央大學碩士班研究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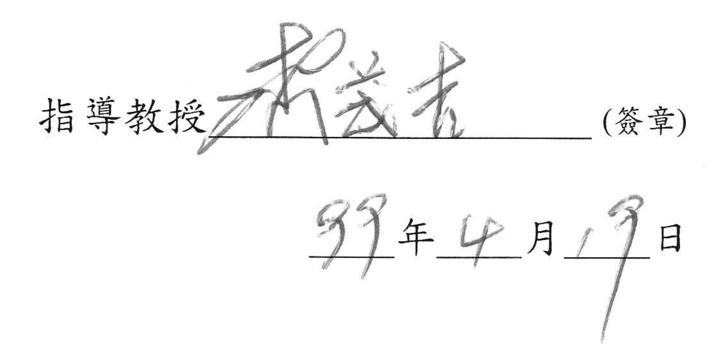
論文指導教授推薦書

歷史 學系/研究所 林威志 研究生

所提之論文

從民主人士到人民公敵：章伯鈞的政治轉折

係由本人指導撰述，同意提付審查。



指導教授 ________ (簽章)

99 年 4 月 19 日

94.11.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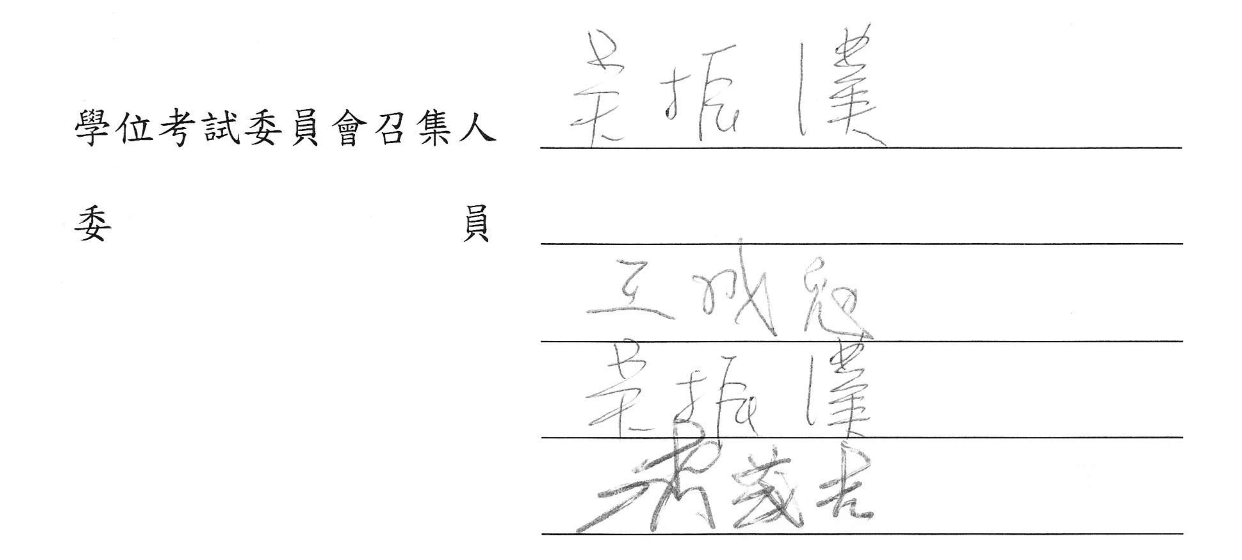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大學碩士班研究生

論文口試委員審定書

歷史 研究所 林威志 研究生所提之論文

從民主人士到人民公敵：章伯鈞的政治轉折

經本委員會審議，認定符合碩士資格標準。



學位考試委員會召集人

委　　　　　　　　員

中華民國　九十九　年　五　月　三　日

從民主人士到人民公敵：章伯鈞的政治轉折

中文摘要

章伯鈞的政治背景主要依附在第三黨之上，而第三黨在中國現代史中又面臨1949 年前後兩個不同時期，在前一階段章伯鈞從揭櫫國、共之外的第三色彩，以至於後期調和國、共衝突的中間路線。在中共建國後，以民主人士之姿進入共和國，章伯鈞響應中共的開門整風政策，並在中國民主同盟與中國農工黨內進行宣傳活動，最後在反右運動時被扣上右派帽子，政治生命也宣告終結。

本文主要探討的時間點包含 1949 年前後兩個不同時代，在中共建國以前的章伯鈞是如何遊走於國、共兩黨之間，其具體的行動為何，是否只是中共的傳聲筒；在 1957 年被毛澤東欽點為「章羅同盟」右派之首的原因何在，是否只是一般研究認為毛澤東無的放矢而刻意加諸的罪名，從民主人士到人民公敵這中間的轉變之背後因素與由來為本文討論焦點。

因此本文將從章伯鈞所在的第三黨的政治理念開始論起，進而分析章伯鈞行中間路線的背後因素；而章伯鈞在抗日軍興與國內局勢改變下，出現什麼樣的轉變，並探討章伯鈞的兩手策略問題。其次，將討論 1949 年後中共如何安排黨外人士與面對有職無權時的因應態度，進而分析章伯鈞在鳴放時期發言內容的緣由。最後將探討在反右運動時，章伯鈞為何從原先的右派份子之一，被毛澤東提升到人民公敵之首的新、舊兩項因素。

關鍵詞：章伯鈞、第三黨、中間路線、反右運動

The Transformation of Zhang Bojun's Political Career

ABSTRACT

Zhang Bojun's political ideas and actions could be divided into two different periods. Before 1949, Zhang Bojun acted as a member of the Third party to lessen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Kuomintang (KMT)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but he was much closer to CCP. After 1949, Zhang Bojun showed his fully support to the new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s of China which was established by the CCP. However, Zhang was claimed as a rightist by Mao Zedong in 1957. Mao's allegation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Zhang's political career and even ended his political life.

The aim of the thesis is to analyze the reasons why Zhang was claimed as a rightist and to indicate the influence of the indictment which directly ended Zhang's political career.

Keywords: Zhang Bojun, the middle-way, the Third Party, the Democratic League,

Anti-Rightist Movement.

謝詞

筆，難以下，心，難以述。回首過往十年點滴，步履蹣跚地走在這條路上，今年百般無奈地劃下句點。這漫長的時間裡，無時無刻欲將過去不為人知的奮鬥、悲憤、歡喜、抑鬱化為細細塵土的過往，重新彰顯在世人面前。歷史是什麼？廣為人論，就我而言不過是原將隨生命終結而深埋入土的那樣劇烈的無奈與悔恨，將之躍然於紙上，時運至此，自身也可以說得上深刻體會。悠悠大地，動人河殤，卻似乎無以容己。百年前南海康有為的維新運動雖以失敗告終，但卻也得了個光緒帝給予馳騁的機運，不得不十分羨慕。前清章學誠曾言及歷史就是要探求變與異，我做不到章學誠的經世致用之學，也談不上清時的浙西考據之學，然而史學中求變、求異是我的原則，不因事小而不為。

得以完成這份論文必須感謝大學時代的雷家驥與楊維真老師，學生從中學習與感受到歷史研究的精神與熱忱。碩士班時期指導教授齊茂吉老師對學生論文上的指點，以及口試老師吳振漢與王成勉老師的指正與批評都提供了許多幫助。此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余敏玲老師對學生的幫助也是銘記在心。除此之外，這份論文最初得以開展，不能不感謝時報文化出版公司的李濰美編輯幫筆者轉介章詒和女士。而章詒和女士數次撥冗閱讀拙著，甚至提供許多其先父章伯鈞的資料，才使得研究順利進行，論文得以完成上述皆功不可沒。雖然這份論文最終仍受限於資料的缺乏而影響了結構的走向，但如果因此而不去解決筆者心中的疑惑，則恕難從命，至少這份研究解決了論文的研究目的，也找出了章伯鈞的變，與其身處時代的異。

大學時代的好友承冀、慶中、名哲、煒曾、易倫，感謝你們這七八年來在學業與生活上的幫助，就是因為有你們，才使得回憶更為燦爛與耀眼，曲終人散盡，待那相聚時，即不聚首，也是餘音繚繞，筆筆皆是扣人心弦。研究所時期的學長，秉修、濠賓、信安、世賢，同學，威聖、伯瀚、興民、曜菖、婉平、煇翔、郁惠、柏賢、偉明、晏霆、珠伶、時成，感謝你們在課業上的幫助，以及課餘之後的鼓勵，在求學的路上走得順遂，煙硝已過，才得以放寬心胸，因為有你們才可以發現自己的卑微與狹隘，能在研究所時期得以相遇，實屬慶幸。我也感謝父母一路來的支持，以及兄姊的陪伴，家人一直是努力邁進時，腳下堅毅的基石。

若是人間無盡期，願持串鈴踏神州；不為高官名厚祿，只尋市井話車舟。這原是在大學時期的創作與感懷，時至今日也得重新開創另一番道路，是夢想的終點，卻不是人生的休止符。感謝巧君這幾年的陪伴以及對論文的幫助，使得我可以在夢想的最後旅途上盡全力放手一搏，雖然最後無法搏「君」一笑，然下一步、

下下一步我仍會努力追求幸福。

最後必須感謝那些曾在過往歲月與記憶中留下痕跡的大家，感謝你們的支持與關懷，在此致上誠摯的謝意。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吾為善惡自有評論，命豈若是邪？

2010 年 6 月 中壢雙連坡

目　錄

表目錄

圖目錄

緒　論

西元 1895 年的中國是在李鴻章（1823-1901）父子與伊藤博文（1841-1909）等人簽下馬關條約後慘淡度過。中國歷經甲午慘敗與分割危機後知識份子力求維新，此時的中國是在悲憤、憂亡的情緒底下，追求一道變革之路。而西元 1895 年也是章伯鈞（1895-1969）誕生的那一年。其時代背景正是中國三千餘年來的大變局，為秦漢以來未有之挑戰。而知識份子圖變的想法和作為，至今也仍未改變。

以往人物史的研究多集中在國、共兩黨的上層軍政人士上，索性在近年來新文化史的研究趨勢下有逐漸改變之態。然而要專對非群體性的一個小人物進行論述，有資料上的侷限性，而若以章伯鈞這類民主人士進行研究，不僅在資料上有較多來源，在研究價值上能補足以往單就制度、或政策層面研究的缺憾。故從個別人物的眼光來探討國、共兩黨在當時代下曾執行過的政策與命令，更能體現出不同的韻味。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章伯鈞所在的「第三黨」[1]最初是以中華革命黨之名出現，後經鄧演達（1895-1931）的領導與指示易名為「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鄧演達死後組織名稱變更為「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且持續到 1947 年再次改為「中國農工民主黨」並沿用至今。在這段時期開始章伯鈞逐漸成為組織的實際領導者，而在國內情勢方面的觀點與其他民主人士訴求相同，要求國共和諧並一同對日作戰。此時期可說是「中間路線」[2]受到最多注目的時期，不僅中共在統一戰線的指導原則下拉攏這股第三勢力，國民黨也同樣重視此方力量。隨著情勢發展與全面內戰爆發，中間路線已不可行之。章伯鈞與第三黨人選擇站在中共這一方。在中共建國後民主黨派也明白宣告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並向社會主義的道路邁進。然在反右運動時，章伯鈞卻受到攻擊而失勢，成為眾矢之的。故本論文題目

---

1 關於「第三黨」稱呼的由來，是因該黨創立時，曾標榜是介於國共兩黨以外之第三個政黨，人們因以「第三黨」稱之。相傳此說法是始於吳稚暉，第三黨雖歷次更名但仍慣以第三黨稱之。詳見，編者不詳，《中國黨派》（南京：中聯出版社，1948 年），頁 141；姜平，《中國民主黨派史》（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87 年），頁 16。

2 1946 年 6 月開始，張東蓀與施復亮曾分別於《再生》、《文匯報》發表了〈一個中間性的政治路線〉與〈何謂中間派〉討論了中間路線的性質與走向。詳見，金冲及，《轉折的年代——中國的 1947 年》（北京：三聯書店，2006 年），頁 432-443。

中的「人民公敵」[3]指的就是章伯鈞成為「章羅同盟」的頭號右派分子。

關於民主黨派史[4]的研究已相當豐富，而其所屬階段正為國共紛爭的世代。歷來研究受到政治立場的差異，常會出現某黨派受國、共某方控制或友好的論述，因此往往忽略了政黨或領導人本身的主觀想法。以往的研究成果已先入為主地將第三黨或章伯鈞列為親共份子、左派團體以及反蔣人士等，[5]而中共建國後因民主黨派是政治花瓶所以有職無權，到了反右運動時卻被列為右派分子成了「人民公敵」，於是乎一個左派份子變身成右派首腦，以往研究均未探討此劇烈轉變的原因，故促成筆者的研究動機所在。

章伯鈞的政治理想與同時代大多數知識份子相同，不外就是追求中國的富強與民主，只是採行的方法、理論與路線不同。透過個案研究，除了能豐富民主黨派史的研究成果外，也可以了解在中共統一戰線下個別人物的思想與應對。由此而發幾個尚待解決的問題為研究的目的：

一、章伯鈞堅持的政治理念為何，從鄧演達的第三黨政治思想中承繼了什麼，且是否影響了早期對中共的態度？另外對蔣介石（1887-1975）有何觀感，而蔣介石對第三黨人不斷的壓迫造成何種程度的影響？

二、章伯鈞最初走的是中間路線的道路，到後來卻偏向中共這一邊，其心態與緣由是什麼？在中間路線已不可行時，靠攏了中共並聲明堅決推翻蔣介石政權，然卻在私底下仍密謀壯大自身實力，其實際情況為何？

三、當中共號召黨外整風，要求各民主黨派進行大鳴大放，後來卻發生了反右運動，章伯鈞在此前後的發言動機與想法為何？章伯鈞真的想要與共產黨「爭

---

3 筆者在題目中用的「人民公敵」這一說法，除了指章伯鈞的大右派身份外，也意指在中共建國後以「人民」作為各單位、組織、團體之首要稱呼，凡事皆冠以「人民」的意思，就如同陳伯達稱呼蔣介石為人民公敵為一樣的手法。參見，陳伯達，《人民公敵蔣介石》（臺北：一橋出版社，1998 年）。

4 關於「民主黨派」這一稱謂，根據張軍民的研究指出，是抗戰後期由中共最早開始使用的，而文本是在 1945 年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東〈論聯合政府〉報告中出現。詳見，張軍民，《中國民主黨派史（新民主主義時期）》（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6 年），頁 1-2。

5 以往的研究不斷談到第三黨組織的反蔣行為，以及鄧演達等人曾同中共談判合作反對蔣介石。然而需注意的是，反對蔣介石不能就視為與中共是同一戰線。不能忽視第三黨組織在創立初期即明確表示不認同中共的革命手法與目的。從這種角度來看，不僅中共為了壯大自身力量而採行統一戰線的策略，第三黨欲反對蔣介石而也採行一種類似中共統一戰線的手法聯合共產黨。對於章伯鈞、鄧演達與第三黨人的傾共或聯共反蔣論述，可見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中國農工民主黨的奮鬥歷程》（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 年），頁 82；馬維政等編，《中國共產黨和民主黨派關係史》（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 年），頁 20；張軍民，《中國民主黨派史（新民主主義時期）》，頁 23-24；姜平，《中國民主黨派史》，頁 38-39。這些書皆將鄧演達的行為解釋為欲同中共建立反蔣的聯合陣線，如此會造成一種第三黨傾向中共的認知。實際上，這只是當時的權宜之計，第三黨靠攏中共是在更後期的事。

天下」嗎？章伯鈞的不滿從何而來？又以何理由成了「章羅同盟」右派之首？

二、研究範圍與時間斷限

本研究的研究空間選擇在章伯鈞面對於中共的統一戰線政策下，所出現的想法與實際的行為反應為研究範圍。而在中共建國後，章伯鈞如何受中共領導並參與政府。從組織的演變上來看，章伯鈞是從鄧演達身為組織主要領導人與政治理念的創造者，到鄧演達死後黃琪翔（1898-1970）繼為主要負責人，而在黃琪翔受蔣介石與陳誠（1898-1965）之邀回國任職後，章伯鈞成為第三黨組織的實際運作者。由此來看，雖然章伯鈞並非一開始就為黨的主要領導者，然因第三黨一直以鄧演達的政治理念為組織的主要思想與綱領，而且章伯鈞也一直認同鄧演達的理念。於是，可看出第三黨早期的路線與政治思想是為章伯鈞所擁護的，故在研究的範圍上便不能忽略這段過程。

在研究的時間斷限上，本研究從章伯鈞參與中華革命黨的組建開始。選擇從中華革命黨的創建開始是因為章伯鈞早年追隨鄧演達並受其理念影響至深，而參與了一連串的活動。1957 年為本研究的迄點，是因此年中共發動了反右派鬥爭，而章伯鈞被視為「章羅同盟」的右派頭號份子。其中國農工民主黨的主席職位遭撤銷，而僅保留了中央常委一職，且待遇與職等皆受到降級處份。章伯鈞從此淡出中國的政治舞台，在文化大革命時持續地受到批鬥，一直到 1969 年 5 月因胃癌而過世。

三、研究回顧

本論文之研究回顧分成兩部份。第一部份為章伯鈞人物的研究；第二部份為民主黨派的相關研究。

（一）、章伯鈞研究方面

關於章伯鈞個人研究方面，因在中共建國前主要政治活動為國共兩黨以外的範圍，而政治理念也有別於國共雙方，故本回顧以「第三方面」統稱。在 1949 年後章伯鈞參與人民政府並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以迄於反右運動中被打為右派而失勢，故此部份主要以反右運動為焦點進行研究回顧。

1.第三方面運動

關於這方面的研究有宋霖的〈章伯鈞及其“紅色”家族〉[6]，此文除概論章伯鈞的一生外，還探討章伯鈞的家族出身，對其成長背景與家世的探討能有一定程度瞭解。然仍有些問題，如章伯鈞在改組後的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曾提出反蔣、聯俄與抗日等主張，然而實際上並未提出聯共的說法。至於姜平所著《章伯鈞與中國農工民主黨》[7]一書，為目前筆者所看過唯一研究章伯鈞個人的專著，作者討論重點為章伯鈞於民主運動中的努力，而在中共建國後則致力於配合人民政府各項政策。然其研究過程中，多犯有刻意擷取史料之弊病。另外，作者並未深入討論章伯鈞於軍事武裝力量上的建立，而只重視在民主運動上的努力，此為一項重要缺失。

2.反右運動方面

反右運動在歷來研究中已不乏論述，而其中主要著作以及與章伯鈞較相關的有宋霖的〈公正評價 1957 年的章伯鈞——兼與《毛澤東傳(1949-1976)》作者商榷〉[8]，其文建構的主要背景觀念是以 1957 年以前章伯鈞與中共一直維持親密關係，進而突顯在鳴放運動中是為中共黨內整風的善意發言。因此在《毛澤東傳(1949-1976)》[9]書裡，評論章伯鈞的發言是有失恰當，且任意曲解引文。朱正的《兩家爭鳴——反右派鬥爭》[10]一書，專門討論反右運動的起因、經過與結果，其中更有一章描述了「章羅同盟」的由來，以及反右開始後許多攻擊章伯鈞的言論，作者並引用大量《人民日報》上所載文章，描述了章伯鈞在反右中的前前後後，值得參考分析，然而沒有深入分析為何章伯鈞會成為右派之首。

由以上所述可看出，章伯鈞在歷來的研究中是被忽視的一項課題，尤其在臺灣地區目前尚無成果出現，而在大陸則受限於中共各時期統一戰線為中心思想的主軸，因此論述未免有失恰當。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大陸地區對章伯鈞的重新研究與評價已漸漸出現，但在描述中共建國前的歷史時，受限於史料之缺乏與觀念差異，導致出現章伯鈞與中共關係向來合作密切的論述。

（二）、民主黨派論述方面

---

6 宋霖，〈章伯鈞及其“紅色”家族〉，《黨史博覽》，期 6（2006 年），頁 11-14。
7 姜平，《章伯鈞與中國農工民主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 年）。
8 宋霖，〈公正評價 1957 年的章伯鈞——兼與《毛澤東傳(1949-1976)》作者商榷〉，《黨史研究與教學》，期 1（2005 年），頁 67-73。
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第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年），頁 686-722。
10 朱正，《兩家爭鳴——反右派鬥爭》（臺北：允晨文化，2001 年）。

關於章伯鈞個人研究方面的成果並不多，然在民主同盟與及其所在的農工民主黨方面，多有涉及章伯鈞的政治活動討論，因此可從民主黨派的研究角度進行回顧。另外，臺灣學界對於民主黨派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出現，[11]主要以大陸方面的研究為主。

1.中國農工民主黨方面

馬維政等人所編的《中國共產黨和民主黨派關係史》[12]一書，曾探討第三黨與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關係，以及政治理念上的差異比較。對中共早期不與第三黨合作提出了批評，也對鄧演達等人的政治思想提出了糾誤。然而關於領導革命的組成份子上，因第三黨主張以平民為領導而非中共的無產階級專政，因此就認為:「第三黨主張的社會主義是不能實現的，只能是小資產階級的空想社會主義。」[13]此為研究背景中的思想方面的侷限性。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的《中國農工民主黨的奮鬥歷程》，大範圍地介紹了第三黨的發展歷史，然而在描述 1949 年前的發展時，未脫中共民主黨派史研究的一貫說法。在思想上是中共的統一戰線理論，在實際作為上為第三黨一貫與中共友好。在中共建國後的反右運動中則是受「左」的思想影響，其言曰:「對全黨的政治狀況作了不切實際的估計，因此反右鬥爭被嚴重的擴大化了」[14]，仍是中共民主黨派史研究者的一貫說法。姜平所寫作的《中國民主黨派史》[15]很大的份量在於討論第三黨的歷史，但討論僅止於中共人民政府成立。此書重點在於中華革命黨與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時期，皆有構想與實際的軍事行動，如依靠鄧演達與陳誠的關係，將第三黨人馬安插於第十八軍裡，並進行政治工作，而陳誠也接受鄧演達的這項作法，但作者並沒有解釋為何鄧演達策動反蔣的同時，鄧演達的政治理念卻與中共有所不同。

---

[11] 與民主黨派相關的學位研究論文還有王玉，〈抗戰前上海地區的抗日救國運動：以救國會為中心的探討（1935-1937）〉，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2 年；廖彥博，〈戰後「民主人士」政論分析——以香港《光明報》為中心的研究（1946-1949）〉，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蘇雅文，〈中共政權內的反對勢力及其政治型態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1984 年；陳巍杉，〈儲安平與《觀察》政論之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陳惠忠，〈自由主義知識份子與近代中國——以羅隆基為例（1928~1949）〉，臺中：私立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1997 年；盧國慶，〈抗戰初期的黨派合作〉，臺北：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1984 年；董天傑，〈中國大陸多黨合作制與民主化之研究〉，臺北：私立中國文化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年；吳秋林，〈抗戰前後的「民主黨派」〉，臺北：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 年；張曉芳，〈中國民主同盟之研究（民國二十八~三十八年）〉，臺北：國立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 年。

[12] 馬維政等編，《中國共產黨和民主黨派關係史》（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 年）。

[13] 馬維政等編，《中國共產黨和民主黨派關係史》，頁 30。

[14] 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中國農工民主黨的奮鬥歷程》，頁 142。

[15] 姜平，《中國民主黨派史》（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87 年）。

2.中國民主同盟方面

張曉芳〈中國民主同盟之研究（民國二十八～三十八年）〉為臺灣目前專門探討民主同盟的學位論文之一，其運用《中國民主同盟歷史文獻——1941-1949》[16]一書，較以往國內外研究掌握了更多史料。然而作者在研究中，將民盟分為左、中、右三派，並將第三黨視為親中共的左派團體，因此忽略了其背景因素。張軍民的《中國民主黨派史（新民主主義時期）》[17]，將眾多民主黨派作系統與完整的研究，且提出了中國民主黨派歷史分期的方法與標準理論。然在所謂的分期上，仍未脫以往主觀色彩，即思想統合在新民主主義的主軸上。另外，作者依國內大事做分期切割，以清黨後的反蔣、抗日團結、八年抗戰、以及勝利初期的爭取民主運動和內戰全面爆發後的全面倒蔣，依次列為寫作研究脈絡，如此不免喪失事件發展過程中的連貫性。

由以上所述可得知以往民主黨派史研究有以下三點問題：第一、在研究成果方面以大陸學界為主，幾乎成了「一家之言」的論述；第二、不論是在中國農工民主黨或民主同盟之章伯鈞方面的研究上，反右運動一直只是「擴大化」的錯誤而已。面對章伯鈞的發言討論，也是了無新意，很大因素是缺少章伯鈞的個人研究出現；第三、對於民主同盟中的分類問題，一般仍將其視為左、中、右三派，除救國會為中共外圍組織所構成而左傾色彩濃厚外，第三黨並不能籠統地看成為左派團體。

從以上兩項的研究回顧可以發現三點：第一、當前中共對反右運動的結論已定，導致章伯鈞不僅未遭平反，在中共對民主黨派史的研究上也是一個避重就輕的作法，因此能在研究觀點上有所突破；第二、雖然在章伯鈞個人研究或民主黨派史研究方面已逐漸重新討論，然受限於大陸主觀因素以及一貫的討論焦點，造就出章伯鈞在 1949 年前一直與中共友好，到了毛澤東（1893-1976）要求黨內整風與黨外鳴放時，沒有深入討論是什麼因素導致章伯鈞會被列入「章羅同盟」之中；第三、在臺灣的研究成果方面，將第三黨與章伯鈞視為與中共親近的左派份子，忽略第三黨政治理想的主體性。另外，因為早期的研究成果具有濃厚的政治色彩，常有失於客觀中立的角度。雖然在 1949 年時章伯鈞等人是鐵了心的擁共份子，然而「無論留或走，都是出於他們自己的抉擇」[18]，既然是出於自己的抉擇，就必須考量到其轉變思想的背景因素。從新觀點與方法上切入研究，重新探究章伯鈞在思想上的改變與抉擇，並觀看其在中共建政後所受的抑鬱與待變。

---

[16] 中國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中國民主同盟歷史文獻——1941-1949》（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3 年）。

[17] 張軍民，《中國民主黨派史（新民主主義時期）》（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6 年）。

[18] 翟志成，《當代中國哲學第一人：五論馮友蘭》（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8 年），頁 40。

四、研究方法與史料

本研究係以章伯鈞在第三方面的活動情況為主題，探討中共如何運用統一戰線的策略影響其政治走向，以及國民黨的拉攏與壓迫並進下，是如何使章伯鈞與國民政府漸行漸遠。最後討論章伯鈞在中共建國後，遇到有職無權的困境而在毛澤東號召黨外整風後，是基於何種心情與目的向中共提意見，到最後成了大右派。藉由以上問題的漸次分析，以深入探究章伯鈞的政治理念與活動。

本論文所使用的研究途徑（approach）為歷史研究法，至於蒐集史料、解讀史料的方法（method）則採文獻分析法及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著重文本資料的收集與解讀。運用的史料主要分為以下六項介紹：

（一）、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

關於臺灣國史館所藏的蔣中正檔案（以下簡稱「蔣檔」），其中的特交文電與文物圖書部分，曾記載包含第三黨早期活動，如福建事件的發生經過與前因後果，以及章伯鈞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問題。[19]另外，檔案中記有中統局與情報局等呈請蔣介石的調查報告文件，其中對第三黨的組織與宣傳內容和其軍事武裝的秘密建立曾有詳細紀錄。[20]此等可以提供在推展民主政治的口號宣傳時，檯面下又有建構軍力的另一種面像。除此之外，蔣檔也藏有對民盟的相關調查報告，其中的議題包括政治協商會議、國民大會代表、以及民盟意見紛歧與分裂等問題。[21]另外在 1947 年 2 月中統局、孫元良（1904-2007）、湯恩伯（1898-1959）與張

---

[19] 此方面檔案如〈吳鐵城電蔣中正據報蔡廷楷反對第三黨秘密改編共匪謀取潮梅，偽府內部遂起糾紛〉，民國 22 年 12 月 7 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文電，檔號：002080200137038；〈劉鎮華電蔣中正已轉電皖北各縣及駐軍嚴拿第三黨〉，民國 22 年 10 月 9 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文電，檔號：002080200126077，等資料。

[20] 此方面檔案如王宇高編，《民國二十一年之蔣介石先生》，臺北國史館藏，《蔣檔》，〈文物圖書〉，事略稿本，民國 21 年 7 月 24 日；吳淑鳳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民國 21 年 6 月至 7 月）》，第 15 冊（臺北：國史館，2004 年 12 月），頁 550-551；〈曾萬鐘電蔣中正破獲第三黨組織之革命軍人抗日聯合會〉，民國 22 年 9 月 30 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文電，檔號：002080200124099，等資料。

[21] 此方面檔案如〈又據戴笠報稱民主同盟因國民參政會席次問題發生裂痕〉，民國 34 年 5 月 1 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文物圖書，檔號：002060100200001；〈葉鎮宇函蔣中正中國民主同盟聽取黃炎培等報告赴延安與共黨毛澤東晤談及受歡迎情形暨民盟之立場等〉，民國 34 年 7 月 1 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文電，檔號：002080200301070；〈葉鎮宇函蔣中正中國民主同盟聽取黃炎培等報告赴延安與共黨毛澤東晤談及受歡迎情形暨民盟之立場等〉，民國 34 年 7 月 1 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文電，檔號：002080200301070；〈蔣中正主持中樞紀念週，國民政府委員陳其采、主計長徐堪等於週會中宣誓就職〉，民國 35 年 11 月 11 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文物圖書，檔號：002060100218011，等資料。

鎮（1899-1950）分電蔣介石，談到民盟密謀今後出路，指出了民盟積極發展現職軍人與失業軍人入盟，還有章伯鈞與羅隆基（1896-1965）等人欲乘國共戰事方酣之際，大力擴展黨務以便在國民黨下台後，以達到削弱共黨之勢力等。[22]以上所述，可知目前包含已出版的《事略稿本》與公開的檔案，可豐富章伯鈞、第三黨、以及民盟研究的內涵。尤其是調查文件與報告多為一些不為外人所知的內容，配合其對外宣傳與政治主張，可以探討章伯鈞與第三黨的不同面像，以及其對內、對外的差異之處，並深入分析與探究原因所在。

（二）、文獻彙編

探討第三黨與民主黨派史就不能忽略其相關文獻資料，而有關的史料已出版的有《歷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概況和文獻》[23]、《民主革命時期的民主黨派》、《中國民主同盟歷史文獻——1941-1949》、《中國農工民主黨歷史參考資料》等幾種，這些資料為民主同盟與中國農工民主黨各時期重要的政治宣言與綱領，其中還包含章伯鈞等主要領導人物在內的講話發言等資料，藉其內容分析政治意圖與走向，並了解各時期不同政策轉變的起因、目的與內涵。

至於中共主要領導人文集與中共中央出版的文件選集方面則有《多黨合作重要文獻選輯——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論多黨合作》[24]、《中共中央文件選集》[25]、《周恩來選集》[26]、《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27]、《毛澤東文集》[28]、《毛澤東選集》[29]、《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30]等幾種。上述資料多收錄各時期主要人物的對內、對外談話，其中除有關於統一戰線的指示與想法外，還包含了對於時局的發言與中共黨內的指示與政策方向。

（三）、1957 年鬥爭參考資料

---

[22] 此方面檔案如〈中統局及孫元良湯恩伯張鎮分電蔣中正 民盟密謀今後出路及其內部意見分歧等〉，民國 36 年 2 月 11 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文電，檔號：002080200314042，等資料。

[23] 中共中央統戰部研究室編，《歷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概況和文獻》（北京：檔案出版社，1988 年）。

[24]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政黨制度研究中心、九三學社廣西區委會、廣西社會主義學院編，《多黨合作重要文獻選輯——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論多黨合作》（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2007 年）。

[25]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至十八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1991 年）。

[26] 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周恩來選集》，上、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

[2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一至二十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 年）。

[28] 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一至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

[29]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一至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006 年）。

[30] 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至十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1998 年）。

這方面計有《章伯鈞張百生等人言論集》[31]、《章伯鈞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32]與續集[33]、《關於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章乃器、龍雲、黃紹竑的材料》[34]、《章羅聯盟罪行錄》[35]等書，這些資料除了節錄登於《人民日報》中的發言消息外，還包含了其他報紙與未刊出的書面揭發資料，也包含了章伯鈞自身的答辯。可注意的是，政治鬥爭下雖然會出現對他人無限上綱的批判，但不會有沒有任何事實基礎的批評，只是事實被擴大解讀而已，因此這方面資料仍有很大參考價值。

（四）、回憶資料與時人論述

在回憶資料方面《原上草：記憶中的反右派運動》[36]收錄了多人對於反右運動前後的回憶與感想。李維漢晚年所寫的《回憶與研究》[37]則為研究中共統一戰線史不可或缺的資料，尤其在抗戰階段以迄於 1949 年後中共中央統戰部的各式工作概況與工作會議皆有所紀錄。至於其他近年來陸續出版的眾多相關性回憶性資料，也是參考重點，不再一一介紹。

章詒和的《最後的貴族》[38]一書出版即在國內外引起巨大迴響，後來又寫了《順長江，水流殘月》[39]、《這樣事和誰細講》[40]等書。其內容主題多半為回憶含其父親章伯鈞在內的老一輩知識份子與戲角等人物，且焦點在於反右運動前後的不同際遇，正如章詒和曾說過的：「我這輩子沒有什麼意義和價值，經歷了天堂、地獄、人間三部曲。」[41]章詒和的著作歷來受到讚賞，然而批評者也不在少數，有從討論與回憶方面著手的。[42]也有人質疑的目光為，在章詒和筆下的人物活靈

---

[31] 中共瀋陽醫學院黨委整風辦公室編，《章伯鈞張百生等人言論集》（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57 年）。

[32] 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執行局編印，《章伯鈞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57 年）。

[33] 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執行局編印，《章伯鈞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續集（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57 年）。

[34] 北京市工會聯合會、北京市學生聯合會編，《關於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章乃器、龍雲、黃紹竑的材料》（出版地不詳：北京市工會聯合會、北京市學生聯合會編印，1957 年）。

[35] 石人編寫，《章羅聯盟罪行錄》（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 年）。

[36] 牛漢、鄧九平主編，《原上草：記憶中的反右派運動》（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 年）。

[37]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 年）。

[38] 此為牛津大學所出版，臺灣版為《往事並不如煙》。見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臺北：時報文化，2004 年）。

[39] 章詒和，《順長江，水流殘月》（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 年）。

[40] 章詒和，《這樣事和誰細講》（臺北：時報文化，2009 年）。

[41] 章詒和，《最後的貴族》（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1。

[42] 如北京大學中文系孔慶東就批評其內容，如康同璧方面就言：「……他那個階級是我們政權的敵人階級過的那麼好，共產黨對他們的重視是極其寬大的，他們繼續過著很奢侈的生活……」、描述史良一節曾言：「我說他寫的好，說他感情真摯，真的留戀那樣的生活，說你們家毛巾這麼髒，毛巾要每天換一條，這是人過的生活，我們過的都不是人的生活」。詳見網頁資料：http://www.edu.cn/20041031/3119274.shtml#15。（下載時間：2008 年 3 月 18 日）。

活現，似乎人就在現場紀錄一樣。就事實而論在其著作中，除回憶的資料外，作者還運用不少文本史料以供參考，故在某部份而言，其文章還是有一定可信度。章詒和的回憶性著作在本論文中為一項重要的參考資料來源，筆者將分析內容並應用之，且避免以受害者的心理來對章伯鈞討論。另外，回憶真實度雖可質疑，然若以章詒和對其父親在某件事上的態度或是所謂的「印象」來看，其利用價值還是存在的。尤其是其父親在私底下對中共與時局政治的評論，更當注意。

（五）、報章資料

在報章資料方面，《獨立評論》為胡適（1891-1962）與蔣廷黻（1895-1965）等人於 1932 年 5 月創刊，而在 1937 年 7 月停刊。其內容有內政、人生觀與外交等三個方面，其中在內政方面全力提倡民主政治。[43]至於《光明報》為民主同盟機關報，為梁漱溟（1893-1988）等人受盟中央之委託在香港發行，而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香港淪陷才停刊，[44]對日戰爭勝利後再刊。《新華日報》則紀錄了中共如何運用統戰政策製造輿論。《人民日報》則刊載中共建國後的重要社論，以及整風時期的發言資料，包含 1957 年前後章伯鈞對於時局的評論，並在反右運動時，也描述了各機關對章伯鈞的批判與鬥爭言論。上述四種資料可視為，於 1949 年前後知識份子對時局的評論與感想，可瞭解章伯鈞在內的當代人物之思想，也提供各方人物不同的觀察視野，加深研究進行時的深度與廣度。

（六）、年譜資料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所編的《周恩來年譜（1898-1949）》[45]、《周恩來年譜（1949-1976）》[46]等書，為研究進行時不可或缺的資料，其為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人員所編，能使用一般人無法查閱之史料，仔細比對與檢索，能從年譜書中獲尋不少重要訊息。惟須注意的是，年譜上沒有記載的事件，不一定在實際中不存在與未發生過。《左舜生年譜》[47]與《曾琦先生年譜》[48]則可發覺在第三勢力中青年黨等人的行動。《章伯鈞年譜（1946-1949）》[49]則可檢索中共建國前夕，章伯鈞的活動狀況。

---

43 武菁，〈七七事變前《獨立評論》及其抗日宣傳〉，《紀念七七抗戰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1998 年），頁 1-2。

44 汪東林，《梁漱溟問答錄》（長沙：湖南出版社，1992 年），頁 74-75。

4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

4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中、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年）。

47 陳正茂編，《左舜生年譜》（臺北：國史館，1998 年）。

48 陳正茂編，《曾琦先生年譜》（臺北：國史館，1996 年）。

49 章詒和編，《章伯鈞年譜（1946-1949）》（未刊稿）。

至於《光明日報歷任總編輯文選》[50]為光明日報社所編輯，收錄章伯鈞以及儲安平等人的言論文選。《救國會史料集》[51]、民國叢書所收錄影印的《鄧演達紀念集》、《鄧演達先生遺稿》[52]等幾種，包含鄧演達的文集與時論，以及民主同盟被迫解散後的經過。透過這些文章能分析其對政府與時局的看法，甚至對中共的政策與理政治念能有所了解。

五、章節架構

本文除了緒論與結論外共分為四章。第一章〈第三黨的政治思想〉除討論鄧演達的生平外，也探討其中的社會主義思想，並描述鄧演達的平民政權的理念，以其反蔣、反帝國主義與歐洲文明。最後是鄧演達對於中國出路的改革之道。

第二章為〈晉升民主人士之階——章伯鈞在第三勢力中〉，包含在中華革命黨時期、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以及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時期的活動。其中將討論章伯鈞與鄧演達的關係，認同其政治理念的哪一部分，以及福建事變中的活動情況，也將提到章伯鈞與第三黨人曾秘密進行軍事武裝之組建，其情形與動機為何將討論之。最後還有章伯鈞如何在第三勢力下，周旋於國、共兩黨之間，進行他的兩手策略。

第三章〈中共建政初期的黨外安排〉，著重於人民政府成立後，中共如何在統一戰線的架構下，對黨外份子的工作與職權安排為焦點，並探討有職無權的問題一直無法有效解決的因素，包含制度與人為意向上的矛盾情況，以及在某方面承受中共對知識份子壓抑與利用的狀況，探討其對中共政治的評論與想法。

第四章〈從天堂跌入地獄——章伯鈞在一九五七〉，其中包含了章伯鈞如何「從天堂跌入地獄」的這一轉折，以及在鳴放過程中的發言內容與後來反右運動時受到的批評攻擊。最後是探討章伯鈞如何成為「章羅同盟」的頭號大右派。

---

[50] 李春林主編，《光明日報歷任總編輯文選》（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9 年）。
[51] 周天度、孫彩霞編，《救國會史料集》（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 年）。
[52] 鄧演達著、毅君編，《鄧演達先生遺稿、鄧演達紀念集》（上海：上海書店，1990 年）。

第一章　第三黨的政治思想

章伯鈞從進入歷史舞台之始直到中共建國後，將其大部份的時間投入於第三黨的政治活動中，因此對於第三黨人所宣傳與秉持的政治理念需有所理解。其中又以鄧演達需要進行剖析，主要因素為章伯鈞在 1949 年以前主要的行動與思想受了鄧演達很大的影響，在政治組織上也是承襲了鄧演達所主導的第三黨一連串的演變，且在福建事件中依循第三黨的政治主張作了唯一一次的重要嘗試。因此勢必要對鄧演達的思想進行探討，才能對日後章伯鈞所接受或改變的有更深入的理解。尤其當章伯鈞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周旋於國、共兩黨之間時，其以何種主要的思想為依歸，又出現了何種的轉變，皆必須先對鄧演達的社會主義思想有所探討，以揭其來龍去脈。

第一節　鄧演達的早年生平

鄧演達乃廣東惠陽人，與章伯鈞為同年出生，且家世皆以務農為主，然鄧演達卻多了份軍事背景。早年受鄰鄉介紹，於 1909 年考入廣東陸軍小學，此時期參加同盟會，開啟了與國民黨的一連串糾葛。[1]從國民黨的立場來說，鄧演達雖以孫中山（1866-1925）的追隨者自任，但思想日益左傾且與中共往來。[2]另外一方面，以中共官方定論的角度來看，「他是小資產階級的激進的代表，贊成土地革命，能與我們長期合作……雖然他在思想上是反對我們的，應該批評鬥爭，但在策略上應該同他聯合。」[3]由此可知國、共兩黨之間對鄧演達的認識與掌握都不足。在孫中山提出「聯俄容共」前，鄧演達主要從事北伐與討陳工作，1924 年國民黨改組並創建黃埔軍校，鄧演達擔任教練部副主任兼總隊長，從事野外教練與軍紀風紀。[4]鄧演達在黃埔軍校中，深得學生敬重，[5]鄭洞國（1903-1991）曾回憶起鄧演達與學生同甘共苦，且要求嚴格，在學生心中如同師長與長兄，成為學生中威信僅次於廖仲愷（1877-1925）的師長。[6]甚至因為其影響力大，蔣介石

---

1 楊逸棠，《鄧演達》（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 年），頁 1-2。

2 陳佑慎，〈鄧演達與國民革命軍政工制度〉，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08 年 6 月，頁 26。

3 周恩來，〈周恩來同志談鄧演達〉，收錄於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委員會編，《鄧演達》（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 年），頁 1；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關於黨的“六大”的研究〉，《周恩來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頁 166-167。

4 李奇中，〈回憶黃埔軍校時的鄧演達先生〉，收錄於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委員會編，《鄧演達》，頁 49。

5 關於這方面的研究，可參閱陳佑慎，〈鄧演達與國民革命軍政工制度〉，頁 27-28。

6 鄭建邦、胡耀平整理，《我的戎馬生涯——鄭洞國回憶錄》（北京：團結出版社，2008 年），頁 19-20。

對他十分忌憚。[7]不過鄧演達在私底下，多所包容共黨份子的校內活動，突顯鄧演達對於具社會主義色彩的共黨人士的親近心理。

1924 年秋鄧演達辭去黃埔軍校的職位，而其辭職原因據目前的研究指出，主要是不安於中國現狀，亟於改革之道，故出國研究革命的道理。[8]1925 年鄧演達於德國柏林遊學期間，與朱德（1886-1976）、孫炳文（1885-1927）、高語罕、章伯鈞等人相識，[9]並接觸了社會主義。[10]1926 年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鄧演達回國參與此次大會，並在歡迎會上發表了遊歐心得。[11]在此報告上，鄧演達大力批評了英、法、德三國的帝國主義，但也表示三國民眾對中國革命的擁護。報告次則談到胡漢民（1879-1936）在莫斯科（Moscow）宣傳與受歡迎的情況，其中透露出：「胡先生他日回國時，當有很大的裨補的。他現在還很想用多些時間和俄國的民眾接近……然後回到中國。」[12]最後還提到在上海與戴季陶（1891-1949）會面一事。值得一提的是鄧演達在報告中，談到俄國民眾熱心於中國革命，且俄共紀律嚴明，展現出革命前後俄國不同的社會風氣，故讓人發覺出報告中充滿了「左」的色彩。此外，鄧演達在大會上被選為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進入國民黨高層之列，並就任黃埔軍校教育長。

1926 年 3 月 20 日發生了中國現代史上著名的「中山艦事件」[13]。事件發生後，鄧演達除拜訪蘇聯顧問外，且仍表示親俄政策。[14]此事件以國民黨高層通過

---

7 鄭洞國，〈鄧演達同志在黃埔〉，收錄於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委員會編，《鄧演達》，頁 54。鄭洞國並認為蔣介石借口有人要排斥校長，迫使鄧演達在 1924 年冬離開黃埔軍校。

8 陳佑慎，〈鄧演達與國民革命軍政工制度〉，頁 30-32。有另一說法是，在軍校中，左派領袖是鄧演達，右派領袖是教育長王柏齡，兩者互視為眼中釘，一次鄧演達打了王柏齡後，就出走外國。參見王唯廉，〈武漢時代的鄧演達〉，收錄於海天出版社編，《現代史料》，第一集（出版地不詳：海天出版社，1933 年），頁 267-268。

9 楊逸棠，《鄧演達》，頁 11；陳佑慎，〈鄧演達與國民革命軍政工制度〉，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08 年 6 月，頁 31-32。

10 王唯廉提到鄧演達遇到高語罕接受了社會主義的宣傳，但因鄧演達個性強，所以沒加入共產黨。詳見，王唯廉，〈武漢時代的鄧演達〉，收錄於海天出版社編，《現代史料》，第一集，頁 268。

11 鄧演達資歷尚淺，然由汪精衛特別引介報告，似乎是刻意安排。參見，楊逸棠，《鄧演達》，頁 12；陳佑慎，〈鄧演達與國民革命軍政工制度〉，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08 年 6 月，頁 50。此報告內容參閱，鄧演達，〈關於游歐的報告〉，《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日刊》，收錄於周天度編，《鄧演達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頁 4-12。

12 鄧演達，〈關於游歐的報告〉，《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日刊》，收錄於周天度編，《鄧演達文集》，頁 11。

13 即蔣介石以軍事力量包圍蘇聯顧問和逮捕多名具共黨身份的黨代表。然中山艦事件其原因與經過歷來眾說紛紜，本文不另闡述，相關研究可參考，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臺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6 年），頁 483-503；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香港：三聯書店，2008 年），頁 131-149；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年），頁 117-126。

14 陳佑慎，〈鄧演達與國民革命軍政工制度〉，頁 53。

了整理黨務案與剋期北伐案而告終。在北伐先前，國民黨新編了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即總政治部，並由鄧演達所接掌。關於鄧演達在北伐之初以至於攻克武昌前的政治部工作，非本文重點故不再冗述。[15]鄧演達主要從事於革命的宣傳工作，然而寧漢分裂之勢出現後，政局又有了改變。目前學界的說法是在武漢當局下的工農運動出現過左的風氣，第三國際方面又受到毛澤東（1893-1976）的農民運動報告影響，[16]不顧及唐生智（1889-1970）等舊式湘系軍人的出身背景，認為革命高潮即將來到。而汪精衛（1883-1944）等武漢高層人士又懼及黨內共黨份子日演越烈的活動，於是在「馬日事變」之後，面對唐生智與張發奎（1896-1980）相繼支持汪精衛的情況下，鄧演達無力回天。[17]

從汪精衛的支持到背棄，鄧演達想必是五味雜陳。武漢分共後，鄧演達於1927 年 7 月喬裝出國到了莫斯科。隨後，中共於 8 月初發動各地的武裝暴動，宣告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劃下句點。周恩來（1898-1976）曾談到：「在武漢時，若以鄧演達為中心，不以汪精衛為中心，會更好些，而當時我們不重視他。」[18]因此，從鄧演達第二次出國前的活動紀錄來看，在第一次國共合作的背景下，國民黨內充斥許多跨黨份子，鄧演達抓住孫中山的民生主義中對農民問題的反思與其本身的親蘇心理，被視為國民黨「左派」份子並在後來黯然出國。然而周恩來雖說：「若以鄧演達為中心會更好些」，卻是無稽之談，鄧演達在武漢時期既使頗具聲望，然而要放棄汪精衛而保鄧演達只能說是事後之論。同為中共早期領導人的包惠僧（1894-1979）也曾說到：

> 當時共產黨確實是忽視了鄧演達的重要性，甚至重視唐生智而不重視鄧演達，這是共產黨的一個失策。如果共產黨同鄧演達結合成一個堅定的同盟，由他掌握四軍、十一軍的實力，再加上新編二十軍及我們領導的工農群眾，對唐生智叛變的部屬許克祥等給以有力的打擊，我想汪精衛等還會跟著我們向左轉，革命的局勢，武漢政府的前途，還有可為。[19]

包惠僧的此段言論可以看出中共仍清楚知道，在武漢時期若不與國民黨決裂，就需要有汪精衛這塊招牌。而鄧演達則被視為當時軍隊勢力的支持，然若要完全以

---

15 相關討論可參考，陳佑慎，〈鄧演達與國民革命軍政工制度〉，頁 65-80。

16 即〈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文中毛澤東認為在短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各省地聯合起來，喪送帝國主義、軍閥與土豪劣紳。詳見，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頁 12-44。可另見，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頁 192-210。

17 張發奎曾談到其與鄧演達原有牢不可破的友誼，中共也期望鄧演達能以私人感情影響他，然而他與鄧演達分歧的關鍵是汪精衛。詳見，張發奎口述、夏蓮瑛訪談紀錄、鄭義翻譯校註，《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香港：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 年），頁 137。

18 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關於黨的“六大”的研究〉，《周恩來選集》，上卷，頁 167。

19 包惠僧，《包惠僧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年），頁 343。

鄧演達為中心，則是無助於情勢，只要汪精衛仍在武漢政權中，就難以輪到鄧演達居於主導之位，何況鄧演達似乎也是藉由汪精衛之引介回國進入國民黨領導階層之中。[20]此外，在決裂之前，鄧演達曾試圖拉攏張發奎等人，以保住第四軍、十一軍的武力支持。最後失敗的因素不單只是張發奎對鄧演達的政治路線不感興趣而已，[21]另項原因張發奎自身也說了：

> 對「分共」政策，我認為，在革命成功之前，革命力量不應該分裂。當然，一旦汪精衛決定分共，我會支持他，因為在這個問題上他比我更高瞻遠矚。……既然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認為分共是正確的，我當然聽他的。我絕對支持他分共，正如先前寧漢分裂時我絕對支持他的立場。……鄧演達說，汪精衛的政治生涯已經告終，叫我不要再聽他的話。……我反駁說，汪精衛的政治生命並未終結，他只是得了病，只要他一息尚存，我們就應該請醫生拯救他。這說明了那時候我仍然是左傾的。我說，我們仍然可以同汪精衛談談。我的觀點是我們必須支持他。[22]

由此可知中共當時焦點仍是在汪精衛身上，甚至期待鄧演達對軍隊的掌控來影響汪精衛的決定。然而，他們所不知的是張發奎等人早已隨著政局的演變與動盪，轉而全力支持汪精衛分共的決定了。

鄧演達於 1927 年 7 月出國，約於 1930 年 5 月回國。期間腳步履及蘇聯、德國、英國、義大利、保加利亞、土耳其、伊拉克、與印度，最後經香港回到中國。這段時間的遊歷經驗，對日後第三黨的政治路線有了新的規劃，其政策思想也越趨成熟。

第二節　鄧演達的社會主義思想與第三黨政治理念

基本上從鄧演達在莫斯科開始，到被國民黨人逮捕而槍決為止，主要從事於第三黨的政治活動。因此此節將著重探討其社會主義思想的具體內容，並由此觀察日後章伯鈞與第三黨政策續行的依歸點。

鄧演達在各國遊歷期間，除了考察其社會經濟與文化狀態外，還有一項重要的改變。根據前文可以得知鄧演達一直懷有親俄與親共的心理，不論是在黃埔校

---

20 即前文討論的，鄧演達於 1926 年回國參加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時，汪精衛在歡迎會上特別向眾人引介鄧演達。

21 此說法可參見，陳佑慎，〈鄧演達與國民革命軍政工制度〉，頁 168。

22 張發奎口述、夏蓮瑛訪談紀錄、鄭義翻譯校註，《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頁 136-137。

內對共黨活動的包容，抑或中山艦事件時對蘇聯顧問的慰問，甚至是武漢分共時與蘇聯顧問一道至莫斯科等等皆可看出。然而此次離開莫斯科後，鄧演達卻高舉反對第三國際控制以及中共武裝暴動的政策。[23]然可以確定的是鄧演達的「左派」思想沒有改變。但為何會有這種轉變，在莫斯科時期，鄧演達和宋慶齡（1893-1981）與陳友仁（1878-1944）曾商談另組新黨的事情，並聯名發表了由鄧演達起草的〈對中國及世界革命民眾宣言〉一文，可說是鄧演達在離開武漢後，對於失敗經驗的檢討並考慮今後的方向。我們可從此文看出幾點：一、鄧演達認為帝國主義由「**消極的暗助反革命勢力的時期，進入到積極的進攻中國時期**」[24]，並且聯合封建軍閥、地主豪紳與高利資本家一同壓榨中國。二、不僅批評蔣介石等南京政權，也針對武漢高層的背叛行為攻訐。甚言曰：「**他們——無論為南京為武漢，皆竊取中國國民黨之旗號，曲解及假托革命的三民主義之內容，其實已為舊勢力之化身，軍閥之工具，民眾之仇敵。**」[25]三、追尋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後的聯俄、容共、以及農民問題三項議題，表現了國民黨改組後的一貫黨內「左派」色彩。[26]四、宣告組成「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因鄧演達等人認為南京與武漢皆已背離孫中山的路線，於是將以革命手段中止其受第二次大會委託之職權，並籌設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重新選舉正式的中央執行委員會。[27]此舉等於是否定了原國民黨組織，而以孫中山的名號開啟另一個黨組織。

鄧演達繼續延用國民黨的招牌除了孫中山的因素外，無可諱言的，也有吸收原國民黨內的「左派」人士之用意。然也促成了鄧演達無法繼續追求同俄國合作的原因之一。在當時第三國際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已放棄各階級聯合的國民革命，將由無產階級直接行動武裝奪權，[28]也就是已放棄與國民黨的合作。此情勢下鄧演達繼續以國民黨的名義行動，便難以得到第三國際的支持，[29]於是鄧演達

---

[23] 相關內容下文將探討。基本上第三國際設立初期，世界的共產黨執政國家仍算少數，當時列寧所在的蘇聯成為影響第三國際的主要國家，一直到史達林時期仍是如此。另外，鄧演達對於第三國際與蘇聯也未清楚劃分，多將兩者視為一體兩面。於是之故，筆者於文中將兩者視為一體一併討論之，不再分別闡述。

[24] 鄧演達，《鄧演達先生遺稿》（上海：上海書店，1990 年），頁 282；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中國農工民主黨歷史參考資料》，第一輯，醞釀建黨時期（出版地不詳：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1 年），頁 10。

[25] 鄧演達，《鄧演達先生遺稿》，頁 286；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中國農工民主黨歷史參考資料》，第一輯，醞釀建黨時期，頁 12-13。

[26] 楊奎松認為中共在第一次國共合作後期，認定是否為國民黨左派的新標準即為：是否贊同孫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即聯俄、聯共、擁護工農。贊同者，即為左派，亦即是革命的；反對者，即為右派，亦即是反革命；對此懷疑動搖者，即為中派，或是新右派。詳見，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頁 178-179。

[27] 鄧演達，《鄧演達先生遺稿》，頁 290-291。

[28] 楊逸棠，《鄧演達》，頁 60-61。

[29] 至於楊逸棠曾回憶起鄧演達回國後曾對他說斯大林贊成鄧演達回國領導革命的進行，既使回憶內容屬實，也沒有改變第三國際未來的政策走向。第二次國共合作已是西安事變之後的事。合作的對象也已不可能是鄧演達了。參見，楊逸棠，《鄧演達》，頁 56。

在 1927 年 12 月離開莫斯科。第三國際不支持鄧演達的臨時行動委員會的主張，是否就是促成鄧演達改變的原因之一？無可厚非的，此時期第三國際與國民黨無法繼續合作，改為支持中共上海中央遙控的邊區割據路線，過去支持國民黨左派的情勢不再，第三黨也難以發展，的確是鄧演達思求轉變的因素之一。然而鄧演達是否有對未來政治走向的思考變異，因而也同樣導致了鄧演達反第三國際與中共暴動路線的決定，將是下文繼續探討的重點。

1930 年 5 月鄧演達回國密居上海，原先譚平山（1886-1956）以鄧演達的名義設立中華革命黨並組織活動。目前研究成果少有探討到第三黨設立初期譚平山與鄧演達的意見衝突，既使是周偉嘉也只簡單談到鄧演達對譚平山起草的政治主張感到反對，並在鄧演達回國後由鄧統一了黨內視聽。[30]楊逸棠甚至只提到譚平山贊同鄧演達起草的政治主張，並希望由鄧演達主持工作，自己則短暫休息。[31]詳細的過程不得而知。實際上，根據由譚平山起草的中華革命黨之宣言內容，其主要思想為以農工階級為主體，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與新舊封建軍閥之荼毒，並且充滿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其言曰：

> ……中國革命得到真正的成功，一定要以廣大的勞苦平民為中心，聯合一切被壓迫的民眾構成民族階級，與帝國主義作整個的鬥爭才能實現。故中國革命充滿了階級性，就是說中國革命的鬥爭就是一種階級鬥爭，就是無產者國家與有產者國家的鬥爭。[32]

此外，譚平山認為中華革命黨就是農民本身的政黨，土地革命與耕者有其田是黨的主要任務和政策。甚言：「中國革命終究的目的，不是在於發展資本主義，而在乎達到社會主義的建立。」[33]

至於與國、共兩黨的關係上，其認為國民黨自辛亥革命之初就已是多階級的政黨，並非建立在革命階級強而有力的政黨上，直到蔣介石與汪精衛相繼背叛革命之後，是一種階級異同自然分劃的趨勢。另外在共產黨方面，認為共黨左傾路線的錯誤：「農民暴動當然不能反對的，但我們反對妄動與亂動。共產黨數個目

---

[30] 相關內容可參閱，周偉嘉，《中国革命と第三党》（東京：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株式会社，1998 年），頁 72。

[31] 楊逸棠，《鄧演達》，頁 74。

[32] 譚平山，《第三黨政綱 ： 中華革命黨宣言》（Moskva: Izdatel' stvo KUTK，1929 年），頁 2；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中國農工民主黨歷史參考資料》，第一輯，醞釀建黨時期，頁 46-47。

[33] 譚平山，《第三黨政綱 ： 中華革命黨宣言》，頁 6-7；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中國農工民主黨歷史參考資料》，第一輯，醞釀建黨時期，頁 52。《中國農工民主黨歷史參考資料》此書此處紀錄的是：「中國革命終究的目的，不是在乎發展資本主義，而在乎達到社會主義的建設」，應屬誤載。

中無計劃無系統的游擊式的農民暴動，不獨離列寧所謂藝術化的暴動很遠……」[34]，此外更認為：「欲以共產黨代替民族革命的黨而完成中國革命更是個人的幻想」[35]。然而，根據鄧演達的〈怎樣去復興中國革命——平民革命？〉一文，可知鄧演達認為中國現實需要的不是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的革命，而是平民革命。[36]鄧演達認為革命的首要目標，應當推翻南京的國民黨政權，之後實行社會主義。且鄧演達的平民革命理想除推翻國民黨外，還要主張土地國有，並以耕者有其田為過渡辦法。不過，其解決土地問題的原則不包含激烈的鬥爭地主方式，只規定不耕作者不能有土地，其地產將由政府收購。此外政府還要發達國家資本，避免大資本家的惡意壟斷。[37]故並非譚平山所認為的，中國革命是超資本主義的，而直接朝社會主義的方向前進，即是否經過資本主義的問題。[38]鄧演達甚至批評譚平山之綱領「只是戴了三民主義的帽子，更換了新三民主義的實質」[39]。由此可知，鄧演達與譚平山的意見衝突主要在於鄧提出了「平民革命」的理念，且在譚平山的宣言草案中可發現其反對中共不結合城市工人暴動的盲動路線，對於鄧演達欲先完成的國家資本主義有一段差距。故譚平山沒有積極劃清和共產黨之間的界線，似乎是遭到鄧演達與其支持者反對的重要因素之一。這在鄧演達後來一連串的言論中可以意識到此點。

於是之故，在中華革命黨內部的鄧系人馬也對譚平山不服的情況下，鄧演達批評譚平山擬定的草案後，不少鄧系人馬如季方、彭澤民（1877-1956）、邱學訓等人相繼脫離，直到鄧演達歸國後才加入臨時行動委員會。[40]

---

[34] 譚平山，《第三黨政綱 ： 中華革命黨宣言》，頁 21；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中國農工民主黨歷史參考資料》，第一輯，醞釀建黨時期，頁 69。

[35] 譚平山，《第三黨政綱 ： 中華革命黨宣言》，頁 22；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中國農工民主黨歷史參考資料》，第一輯，醞釀建黨時期，頁 70。此書紀錄的是：「欲以共產黨替代民族革命的黨……」，同屬誤載。

[36] 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中國農工民主黨歷史參考資料》，第二輯，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時期（出版地不詳：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2 年），頁 207。

[37] 鄧演達，《鄧演達先生遺稿》，頁 446-456。

[38] 譚平山，《第三黨政綱 ： 中華革命黨宣言》，頁 7-8；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中國農工民主黨歷史參考資料》，第一輯，醞釀建黨時期，頁 53-54。值得注意的，乃譚平山的共產黨員身份，原先在中共黨內地位不低，其在南昌暴動後，遭中共開除黨籍。根據時人回憶，譚平山進入中華革命黨時，除不斷攻擊改組派外，對於共產黨則少有批評。詳見，王實甫，〈第三黨的創始及沒落〉，收錄於海天出版社編，《現代史料》，第一集，頁 264。

[39] 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中國農工民主黨的奮鬥歷程》（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 年），頁 80。

[40] 王實甫，〈第三黨的創始及沒落〉，收錄於海天出版社編，《現代史料》，第一集，頁 264-265。王實甫於此文提到當時追隨譚平山的只有雙重人格章伯鈞、小官僚王忱心等人。然而這只能解釋鄧系人馬脫離後，章伯鈞未跟著離開。實際上，在鄧演達批評譚平山先前，許多鄧系人馬一樣可說是照著譚平山行動。如邱學訓受譚平山影響，在機關雜誌上猛攻改組派。參見，王實甫，〈第三黨的創始及沒落〉，收錄於海天出版社編，《現代史料》，第一集，頁 264。

1930 年 8 月在上海正式舉行將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的第一次全國幹部會議。會中通過鄧演達起草的〈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政治主張〉(以下簡稱〈政治主張〉)，並選舉鄧演達為總幹事，章伯鈞為宣傳委員會主任。此外在中國各地設立機構，組織活動。從鄧演達回國直到被捕這段期間裡，留下許多對於中國問題的想法與時論，以及對於第三黨政治理念的言論主張出現，可以說是鄧演達對於中國存在的各種問題而衍生出第三黨急於努力的方向。因此首先探討鄧演達是如何看待中國問題的：

一、帝國主義侵略

近代中國對帝國主義一直是一項敏感的話題，不少文人知識份子常痛批外國的侵略，不論是在領土租割、治外法權、甚至是國民經濟上，都將中國視為魚肉任其宰割，於是反帝侵略的議題一直和中國近、現代史如影隨形，也激化出了中國的民族主義內涵。鄧演達對於中國未來的政治理想同樣地包含了反帝國主義這一區塊，在當時鄧演達主要是針對蔣介石以及中共兩者，間接地攻擊背後的外國勢力。

對於蔣介石的南京政權，鄧演達素來抱有敵意，除了抨擊其軍閥、官僚與地主聯合統治的結構外，可以注意的是鄧演達似乎對於基督教意識也無好感。從鄧演達的〈中國到那裡去？〉一文中，可以發現一些蛛絲馬跡：

> 現時的南京統治，一面以“禮義廉恥”的假面去復古，使與曾國藩所代表的社會秩序和諧，一面更通過了基督教徒與美國相結，為鎮壓革命勢力的外援，所以現時反革命的南京統治，在本質上實與太平革命時代的滿清統治無異。所不同的只是：有眾多的買辦及銀行家做它的基礎，及反映這個基礎的基督教意識。[41]

由上引文可以發現鄧演達除了反南京政權背後的美國勢力之外，也可看出鄧演達認為南京政權以「禮義廉恥」與基督教義來當作馴服人民的一種工具，藉由外來的洋槍鐵砲、金彈銀彈以及宣撫人民的教約聖經，從外在至內在地壓服人民的活動。呂實強就曾探討到，基督教在中國傳教權的獲得，係依靠了武力、詐術，因而聯同其他對中國的權利，一同列入不平等條約中。使人認為基督教在中國傳播，是西方侵略勢力的另一種形式。[42]鄧演達會如此攻擊基督教除早期的不平等條約影響外，此時又多了「軍閥」蔣介石勾結外國勢力及其內涵的基督教意識。

---

[41] 周天度編，《鄧演達文集》，頁 160；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中國農工民主黨歷史參考資料》，第二輯，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時期，頁 40-41；鄧演達，《鄧演達先生遺稿》，頁 3-4。

[42] 呂實強，《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一八六〇——一八七四)》(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 年)，頁 198。

新、舊情感交相映，鄧演達對基督教意識沒有好感也不意外了，因此在探討南京政權的意識形態時，歸結出六種團體，其中基督教徒也列入其中。[43]鄧演達這種對於外國文明的攻擊甚至還將焦點擴展到「歐洲文明」上：

> 在城市的軍閥官僚政客黨棍與高利的投機商人銀行家，在鄉村地主豪紳，都已分別接收了"歐洲文明"的一面，過著驕奢淫逸〔有標為驕奢淫佚者，引者註〕的生活；如果小百姓們一旦不安本份，起來和那些老爺先生們算賬，那麼老爺先生們必定更要起來接收"歐洲文明"的另一面，多買些飛機大炮，多招些人馬，去教訓他們（南京的"訓政"！）。[44]

不論是美國或歐洲文明在鄧演達看來都屬於帝國主義的力量，鄧演達自始至終都對帝國主義懷有強烈敵意，可以說在鄧演達死前一直與帝國主義勢不兩立。[45]此外在外交方面鄧演達認為另外還有三種力量，即蘇聯勢力、第二國際以及共同被壓迫的民族力量。[46]在〈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政治主張〉中，鄧演達說了：

> 帝國主義——是我們的敵人，我們必須針對它們之間的矛盾，用種種方法努力和它爭鬥。第二種——蘇聯——力量，客觀上可以做我們的朋友；但是如果它要利用中國扛木梢，要干涉中國的革命，則我們不能因為它的口頭上的宣傳而不抗拒它。第三種——各國的社會黨——在它們的綱領上應該可以做我們的朋友；但是在實際對外政策上是對我們要求的，我們應該提防它們，並且攻擊它們政府的反動政策。第四種——被壓迫民族們——是我們真實的朋友，真實的政治聯盟者。[47]

第二國際領導下的各國社會黨雖然也是採行社會主義，並有左右該國政權的能力，但論其對外政策仍是一種殖民政策，因此廣義來看實與鄧演達眼中的帝國主義力量無異。因此鄧演達在同月樊迪華來華時，有了以下的言論：「第二國際外交政策是跟着帝國主義的腳跟走的。所以我們被壓迫民族們不能不批評它並且反對它的外交政策。我們站在勞苦平民大眾的立場上，認為第二國際的領導是不能

---

[43] 周天度編，《鄧演達文集》，頁 224-225；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中國農工民主黨歷史參考資料》，第二輯，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時期，頁 87；鄧演達，《鄧演達先生遺稿》，頁 95-96。

[44] 周天度編，《鄧演達文集》，頁 160；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中國農工民主黨歷史參考資料》，第二輯，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時期，頁 40；鄧演達，《鄧演達先生遺稿》，頁 2-3。

[45] 朱春燕、李鴻生，〈鄧演達品格初探〉，《學術研究》，期 12（1996 年），頁 68。

[46] 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中國農工民主黨歷史參考資料》，第二輯，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時期，頁 18-23。

[47] 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中國農工民主黨歷史參考資料》，第二輯，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時期，頁 22-23。

充分代表工人利益。」[48]於是乎，姑且可將鄧演達心中的國際勢力大體分為三類：第一，是國際勢力以帝國主義的方式侵略中國；第二，蘇俄及其第三國際領導的各國共產革命；[49]第三，就是舉凡一切全球同樣被壓迫的民族。

在前文中已約略探討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問題，至於蘇聯與第三國際則是另一項重要議題。蘇聯與第三國際在本質上仍算是一股帝國主義勢力，然而在俄國十月大革命與宣稱放棄對華的種種不平等條約後有了改變，人民對俄國有了不一樣的態度。然而從鄧演達的眼中來看，不論是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黨或是俄國的共產黨，整體來說皆可視為社會主義，故客觀上都可以做為朋友。然而，要因此把在中國的鄧演達或是第三黨推向是第三國際以及中共的友人未免過於牽強。此種只能說是，在類似的政治理想與具有共同敵人的情況下，有合作的可能性。如果換個角度來看，事後周恩來於若干年後對鄧演達下的基本論調，也是基於同樣的道理。[50]

鄧演達基於第三黨設立時所立下的政治思想，原本就是遊走於國、共兩黨之間，這是一項十分重要卻又簡單明瞭的情境。鄧演達認為蔣介石背棄孫中山當時的政策方向，因此以「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的名義另組第三黨（自視為另一個國民黨）[51]。同樣地，鄧演達對於共產黨有所顧忌，甚至如前文探討的在鄧演達與譚平山意見相左的癥結點上，有項重要因素即為譚平山沒有將第三黨與中共劃清界線。此外，鄧演達為之詬病的即是中共背後的第三國際。其言：「目前的蘇聯是在一個退守的時期，因此第三國際要擴大東方共產黨的聲勢以為保護蘇聯的前衛。這種自己本位的政策，實與要求民族解放及平民解放的中國革命的旨趣不同。」[52]在此種情況下，第三國際支持的中國共產黨實與中國革命相悖。甚至也不再支持鄧演達眼中孫中山的三大政策所代表的國民黨時，就沒有合作的可能。至於中共當時進行的邊區蘇維埃政權及其暴動策略，更是為鄧演達所批評。從某方面來看，二戰末期的第三勢力運動其發軔，或可追溯至第三黨的創設，

---

48 周天度編，《鄧演達文集》，頁 175；鄧演達，《鄧演達先生遺稿》，頁 305-306。

49 有研究藉此認為鄧演達雖然十分反對以斯大林為首的第三國際，但在客觀上仍然視其為朋友。參見，文茂瓊，〈鄧演達社會主義思想初探〉，成都：西南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思想政治教育碩士學位論文，2006 年 6 月，頁 37-38。作者強調了鄧演達在客觀上可以與第三國際做朋友，但實際上在後來反第三國際的言論層出不窮，砲火也十分猛烈。不過至少對於第三黨發展歷史上，可以說是為後來與中共合作下了一個可供追尋的依歸。

50 即前文探討的，周恩來認為可與鄧演達在策略上聯合，然而在思想上應與其鬥爭。詳見註釋 3 及其引文。

51 因此此時期的第三黨與國民黨之間，因鄧演達存在的關係帶有一種新、舊交替的色彩，不過在鄧演達死後，第三黨的性質有了改變。相關問題將於第二章討論。

52 周天度編，《鄧演達文集》，頁 164；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中國農工民主黨歷史參考資料》，第二輯，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時期，頁 45；鄧演達，《鄧演達先生遺稿》，頁 10。

只不過此時期的第三黨（或稱第三勢力）比抗戰時期更多了對於蔣介石與中共的敵對意識。至於此種敵對意識的轉變是經過了許多事件的影響與醞釀，此問題將於下一章再詳細討論。

二、內戰與社會經濟問題

中國自民國成立以後不斷的內戰導致許多的社會經濟問題，然而鄧演達似乎認為是中國內部的文化因素才誘使戰爭接連的發生。鄧演達甚至認為內戰應可尋跡至太平革命之時。其言：「太平革命起於滿洲的官僚政治腐朽至於極度及英法來侵之時，也即是農業經濟衰落之時。當時中國社會之矛盾，除了和前代所表演的以外，還加上了帝國主義侵入中國底文化的政治的及經濟的勢力底萌芽。」[53]因此鄧演達才將中國內戰的文化意義歸於是結算前代的社會制度。鄧演達認為中國是單調的農業社會，長期循環於農業社會的內部戰爭，貧農與地主爭換位置的戰爭，這才是中國文化的基礎。然而由於農業經濟的頹落，促使文化的衰亡，於是從太平革命起，下至當時的軍閥混戰，皆可視為中國在與舊的封建文化結算大潮當中。[54]當時在中國的不論是資本主義或是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都是否決了中國的封建文化。至於從此衍生出第三黨的目標則應為國家經濟取代舊有的中國封建文化，也因此才能結束循環不斷的內戰問題。

至於鄧演達構思第三黨如何改善中國的社會經濟問題，並使中國遠離內戰的循環，將是接下來的探討重點。

三、中國的出路

在前文當中已大略提到鄧演達的〈怎樣去復興中國革命——平民革命？〉一文，此文可說是鄧演達對平民政權或平民革命最完整的言論紀錄，其以探討中國革命失敗的問題為始，進而切入復興革命的手段與方法。關於中國問題前文已有分析，於此將注意鄧演達的改革理念。

鄧演達將中國革命的核心問題及其改革標的分成三類：在經濟方面應以集體力量構成計劃經濟或國家經濟；政治方面應革除官僚政治與軍事獨裁；在社會意義上要掃除名分與偶像崇拜。[55]至於具體目標即是建立平民政權，其是生產者的政權與反特殊階級的政權，鄧演達將其簡義為：「平民政權是由生產者所構成而進行社會、經濟、文化的解放，並使之平民化的一種權力機關。」[56]鄧演達心中

---

[53] 周天度編，《鄧演達文集》，頁 184-185；鄧演達，《鄧演達先生遺稿》，頁 43-44。

[54] 周天度編，《鄧演達文集》，頁 188；鄧演達，《鄧演達先生遺稿》，頁 50。

[55] 周天度編，《鄧演達文集》，頁 297-298；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中國農工民主黨歷史參考資料》，第二輯，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時期，頁 194-195；鄧演達，《鄧演達先生遺稿》，頁 238-239。

[56] 周天度編，《鄧演達文集》，頁 317；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中國農工民主

的中國農業經濟問題是遠大於工人問題的，綜覽鄧演達留下的言論資料來看，對於改革農業經濟有較多的方法與主張，相較於工人階級的參加實際生產管理或要求工人們提防中共與第三國際的宣傳之寥寥數筆，相去甚大。[57]甚至認為中國問題的核心問題就是要解決農村中的矛盾。為此鄧演達提出了一套農業政策，其中的先驅即為耕者有其田。其要求的具體事項如下：

（一）宣佈耕者有其田，不耕作者不能有耕地。

（二）免納佃租，其中佃農及雇農可暫行保有原佃耕地的使用權與收益權。但地主回村並能實際耕作者，主佃雙方，暫時共享土地的使用權與收益權。

（三）由國民會議規定土地法，分別規定農戶占有耕地的最高額和最低額，及國家收買土地定價法。

（四）私人占有耕地最高額外的土地，由國家以國有土地為抵押，發行五十年長期土地公債，按國民會議所規定的土地定價原則及各地地方政府所決定的土地價格，收買歸為國有。在最低額下的土地，應強迫使其互相合併或加入合作社經營。

（五）國家以外的公共團體所有土地亦按私有土地收歸為國有法。

（六）凡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等及其他反革命的團體的全部財產應沒收為國有。

（七）一切收為國有的土地，應由管理機關按照土地分配原則及各地標準分配於耕作的農民。原佃耕及無地雇農，與退伍軍人等應有同等機會領有土地，但只限於使用權與收益權。

（八）領有土地而不耕作，或怠工、耕作不力的農民，應被剝奪使用權與收益權，耕作私有土地的農民犯以上條件剝奪其占有權。

（九）不得私行買賣土地，不得已時的土地占有權及使用權的轉移按土地法得土地管理機關的允許而行之。[58]〔加底線者為筆者所強調〕

黨歷史參考資料》，第二輯，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時期，頁 215；鄧演達，《鄧演達先生遺稿》，頁 269。

[57] 關於此點可參閱鄧演達的〈“五一”紀念節告工友〉一文，詳見周天度編，《鄧演達文集》，頁 283-285；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中國農工民主黨歷史參考資料》，第二輯，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時期，頁 179-181；鄧演達，《鄧演達先生遺稿》，頁 312-315。

[58] 周天度編，《鄧演達文集》，頁 307-308；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中國農工民主黨歷史參考資料》，第二輯，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時期，頁 204-205；鄧演達，《鄧演達先生遺稿》，頁 453-454。

鄧演達對於耕者有其田的大體想法如上，實際從事耕作者能有土地使其利用，且土地沒收的方式較為溫和，鄧演達就說到：「我們反對采取無條件的沒收土地的辦法。我們認為共產黨現時所采取的手段——燒田契、鏟田界……燒殺等手段，不過是代表極端情感的爆烈，而不是革命的正當的手段。」[59]此外還有一點值得注意，鄧演達眼中的耕者有其田，是土地的使用權以及受益權，不因此也代表具有土地的所有權，這也是為何佃農、雇農以及退伍軍人只能領用土地耕作而不能擁有土地的原因所在。然而這並不表示人民無法得到土地的所有權，鄧演達認為只要依各地情況訂定土地占有的額度標準，私人還是可以占有一定的土地。只不過若原占有土地在最低額之下，則會被強迫合併或合作經營之。鄧演達對於農業政策的理想藍圖也還包括了：改訂田賦、農業的科學技術改良、發展水利設施並改善內地交通與設立農民銀行、促進農業合作、辦理國營或公營農業、以及移民墾殖事務等等的技術問題。在此不再冗述。

以上是關於鄧演達的農業改革問題，至於在平民政權的政治組織上，主要是由職業團體所組織的。鄧演達為此曾說明：

> 在平民群眾的組織當中，最切實的莫過於職業的組織，如工會、農會等。只有職業組織能使從事各種生產的平民發生密切的利害關係……其次重要的是准職業組織，如學生會、婦女組織、兵士組織等等。喚醒平民群眾和組織平民群眾，這是平民政權的必要的先決條件。[60]

這些職業團體散佈在工廠工人、手工業者、自耕農、佃農、雇農及設計生產、管理生產與運輸人員當中。其中，鄧演達認為由於工人與農民於平民政權中占大多數，因此其為平民政權的重心，也就是以工農為重心的爭鬥同盟。平民政權即以職業團體為代表構成中央與地方的政權發動機關，並組織各層級的國民大會行使政權。在國民大會之下設立執行機關。各地的權力機關為省民大會、縣民大會、鄉民大會等等。至於國民大會中的職業團體組成比例，鄧演達將其分為兩類，直接參加生產的農民工人占 60%，其他各職業團體及准職業團體占 40%。[61]

---

59 周天度編，《鄧演達文集》，頁 308；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中國農工民主黨歷史參考資料》，第二輯，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時期，頁 206；鄧演達，《鄧演達先生遺稿》，頁 456。

60 周天度編，《鄧演達文集》，頁 351；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中國農工民主黨歷史參考資料》，第二輯，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時期，頁 16。

61 周天度編，《鄧演達文集》，頁 351；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中國農工民主黨歷史參考資料》，第二輯，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時期，頁 17；張軍民，《中國民主黨派史（新民主主義時期）》（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6 年），頁 30-33。

以上約略就是鄧演達對於中國出路的改革之道，同樣的也是為第三黨設立初期定下一個政治主張與綱領。觀看鄧演達對於第三黨的政治理念時，讓人聯想到民粹主義（Populism）[62]這一思想。關於民粹主義的定義，歷來充滿許多複雜的討論，且又不能將之視為專門的農民運動。[63]只不過鄧演達的蘇聯經歷是否接受到俄國 19 世紀末的農村改革運動影響，耐人尋味。

第三節　未成之業

1931 年 8 月 17 日鄧演達在上海遭到逮捕，事之起因為鄧演達擬與陳銘樞（1889-1965）率十九路軍樹起停止內戰、反對蔣介石的旗幟，並在南方建立反蔣基地，然而在事發之前就因人告密而被捕。被捕期間經宋慶齡與陳誠等人在內多方援救無效，於同年 11 月 29 日晚被秘密處決。

鄧演達在第三黨的歷史上主要貢獻是在於建立黨的政治主張與理想，至於實際行動方面則因過早離世而未能有什麼實際作為。在鄧演達死後的第三黨領導短暫出現過一些爭歧，徐謙（1871-1940）、章伯鈞、黃琪翔為當時黨內主要幹部，在鄧演達被捕期間召開的全國代表大會上，他們各自的支持者比例分別為：黃琪翔為 40%、章伯鈞為 27%、徐謙為 25%，[64]都沒有超過半數。然因黃琪翔號稱為青年軍人派的第二號人物，且與鄧演達有結義弟兄之情，[65]於是黨務暫由黃琪翔負責。[66]鄧演達死後第三黨的領導位置，有一段時間由黃琪翔所掌控，至於章伯鈞地位的逐步擢升似乎是在抗戰期間發生。[67]這也是筆者在第二章將繼續探討的問題。

鄧演達將第三黨帶往反對蔣介石與共產黨之路歷經波折，[68]楊逸棠為此曾做

---

[62] 民粹主義或言為平民主義，卡農范（Margaret Canovan）曾進行界定，並區分為農民民粹主義、農場主民粹主義和知識份子民粹主義。就第三黨而言，其類似於俄國 19 世紀末青年份子從城市到農村的改革運動，強調農民的土地擁有權與分配，並將農民組織為「村社」（obshchina）自我管理與集體所有。詳見，保羅．塔格特（Paul Taggart）著、袁明旭譯，《民粹主義》（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年），頁 24-30、61-63。

[63] 塔格特認為在拉丁美洲的民粹主義運動中，也涉及了政治家對於城市工人運動的領導，參見保羅．塔格特（Paul Taggart）著、袁明旭譯，《民粹主義》，頁 25。

[64] 培宣，〈第三黨之形成與幻變〉，收錄於海天出版社編，《現代史料》，第四集（出版地不詳：海天出版社，1935 年），頁 126。

[65] 菊池貴晴著，劉大孝譯，《中國第三勢力史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 年），頁 63。

[66] 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中國農工民主黨的奮鬥歷程》，頁 91。

[67] 黃琪翔在七七事變前，即由陳誠之邀回國抗日，對日作戰期間主要從事戰爭事務；第三黨似乎不是其著力所在。

[68] 在鄧演達生前並未明確揭櫫反對國民黨之態，主要集中於蔣介石身上，且至抗日軍興，國民黨在中國握有抗日主導之勢，第三黨的活動有了轉變。至於反共一事，則逐漸形成停止內戰，一同抗日。

過解釋，並歸為三點原因：

> 其一、鄧演達到底還只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激進革命家，他的革命思想有其堅決的然而不徹底的一面。他畢竟沒有充分看到中國工人階級的力量，特別是他們在中國現代革命歷史中的領導地位。……缺乏完全清醒的理論基礎去團結真正的朋友——中國共產黨。其二、鄧演達絕對不去和蔣介石同流合污，但亦不願和共產黨並肩前進，他是想在政治上走出自己的道路來，繼承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其三、除了鄧演達不同意共產黨的某些主張外，當時的中國共產黨還在幼年期，……鄧演達過多地看到共產黨當時的一些"過火"的行動，加上他對第三國際的指導路線認為是不符合中國國情的，是錯誤的，所以鄧演達就因而反對共產黨的主張和做法。[69]

關於上述第二與第三點已作過討論，然第一點說鄧演達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激進革命家」，則是受到中共上層即周恩來的定論所起，此在前文已說明。楊逸棠認為鄧演達沒有注意到工人階級，甚至沒有團結中共，因此革命思想堅決而不徹底。然而中共也是在城市暴動失敗後，轉入邊區割據，從此在邊區農村以至於日後的陝北時期，皆是進行農民運動與土地革命。農人、第二條戰線與地下組織促成中共的壯大，工人階級非處於主要之列。對於最早注意農民階級的力量，鄧演達與毛澤東之間可謂不遑多讓。[70]

鄧演達死後第三黨曾陷入派系問題，但第三黨也非無所運動，[71]其中福建事件就是一次主要活動。不過對日戰爭日熾，第三黨與章伯鈞等人致力的方向又有了改變。

---

[69] 楊逸棠，《鄧演達》，頁 81-82。

[70] 周恩來談鄧演達時，就曾說到：討論土地問題時，與毛澤東意見一致。詳見，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周恩來選集》，上卷，頁 166-167。另外，鄧演達任中國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長期間，兼任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並由毛澤東為副所長主持所務。在講習所開學典禮上，鄧演達說到：「中國的革命就是農民的革命。……中國的國家都是農民的。……中國的革命，總要耕者有其田。」，參見，周天度編，《鄧演達文集》，頁 65-66；楊逸棠，《鄧演達》，頁 39。

[71] Kenneth 認為鄧演達死後第三黨因派系問題，無人可組織有效的重建運動。詳見，John Kenneth Olenik, *Left Wing Radicalism in the Kuomintang : Teng Yen-Ta and the Genesis of the Third Party Movement in China, 1924-1931*(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h. D. dissertation , 1974) , p. 284.

第二章　章伯鈞在第三勢力中

在前文已探討鄧演達及其第三黨的政治理念，因此此處將考察章伯鈞對於鄧演達平民政權的主張繼承了多少，且在鄧演達死後第三黨的走向有何改變。在黃琪翔將心力投入抗戰事務後，章伯鈞面對國、共內戰與日本侵略加劇，在這三者之間究竟扮演了何種角色，且又將第三黨帶往何處，是本章討論的焦點。章伯鈞從反蔣反南京政權、又演變至調和國、共紛爭的第三勢力，這一連串的路線改變值得耐人尋味。二戰結束後國共進行和談，此時期民主同盟所代表的第三勢力受到國共兩黨與國際勢力的注視，並成為各方角力的焦點。然而為何最終民主同盟分裂，青年黨與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走上殊途？此事不能輕忽國民黨歷次暴力行為與迫害活動，而戰後以來國內輿論求和厭戰的氛圍，為此時期的歷史背景。本章藉由章伯鈞的角度，來探討其中的變化與思想上的溯源。

第一節　章伯鈞早年生平與鄧演達之關係

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 年），章伯鈞出身於安徽省桐城縣（現為樅陽縣）[1]。家勢雖非仕宦世家，然而因前人慘澹經營，逐漸累積家財，使得章家成為安徽江北的地主家庭。章伯鈞便在此一背景下誕生，然在幼年喪父後，轉由其叔父撫養。家中置有學田，以供族人讀書之用。章伯鈞在家塾讀書，後入桐城中學，此時章家勢衰，章伯鈞只能刻苦求學。1916 年考入武昌高等師範英文系，畢業後曾任安徽省立第四師範學校校長。至 1922 年獲得安徽省公費留學而前往德國柏林大學研讀哲學。[2]

在德期間，經朱德（1886-1976）介紹於 1923 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孫中山實行聯俄容共政策後，章伯鈞也於德國加入國民黨。[3]另外，留德期間也結識了同年的鄧演達[4]。鄧演達的理念之一為追隨孫中山並發達國家資本主義，及解決

1　姜平之書為「縱陽縣」，實應為「樅陽縣」，詳見姜平，《章伯鈞與中國農工民主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 年），頁 1；宋霖，〈章伯鈞及其“紅色”家族〉，《黨史博覽》，期 6（2006 年），頁 12。

2　姜平，《章伯鈞與中國農工民主黨》，頁 1-2。

3　姜平，《章伯鈞與中國農工民主黨》，頁 12。

4　根據章詒和回憶其父與鄧演達的關係：「…對這兩個問題，兩人觀點極為接近，可謂志同道合……鄧演達被殺害，父親繼承著鄧演達這面旗幟，一直到新中國成立。第三黨幾次易名，但都是以鄧演達手擬的綱領作為黨章的基石。父親對別人曾說：『要像寡婦守節一樣，守住鄧先生的精神。』」，見網頁：http://www.epochtimes.com/b5/3/9/28/n384381.htm。（下載時間：2007 年 6 月 4 日）。可以見得章伯鈞與鄧演達之交情，與對鄧演達的理念認同之深。又可見，江迅，〈叫右派父親太沈重〉，《亞洲週刊》（1997 年 6 月 16-22 日），頁 44-45。至於包惠僧在他回憶裡所言：「……章伯鈞是在柏林留學時結識鄧演達的，他倆人見面多半是談男女風情的問題，很少談正事。」，值得疑異。筆者認為有兩項因素，第一：章伯鈞歷次政治活動多

土地問題等。因此，章伯鈞 1923 年加入中共，其認同度應是一大焦點，不過至少在認識鄧演達之後，其思想與原先受朱德影響下加入中共有一定的轉變。此因從章伯鈞與中共失聯後，便沒再恢復聯絡並從此持續追隨鄧演達的第三黨。[5]鄧演達與中共兩者之間，顯見的章伯鈞已做出了選擇。武漢分共後，章伯鈞參與了八一「南昌起義」，事敗後前往香港，並且脫離共黨組織。[6]值得注意的是，章伯鈞等人參與了南昌暴動，事後又批評此一行為。[7]其轉變的關鍵，應與鄧演達的影響有關。

鄧演達於 1930 年回國後不久，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在第一次全國幹部會議裡，章伯鈞被選為宣傳委員會主席。此時期，章伯鈞在宣傳工作上的主要作為有創辦《革命行動》半月刊、《革命行動日報》等，此外還有一些地方性的報章雜誌。另外，利用國內外發生的重大事件，及時發表宣言、聲明等文章，以及宣傳行動委員會的政治主張。[8]

自 1931 年九一八事變與隔年的一二八事變後，面對日本侵略加劇，章伯鈞在〈我們最近的政治主張〉曾言：

> 現時最主要的革命的巨敵，是殘存的封建勢力，帝國主義之政治的及經濟的壓迫，以及連結於這兩種巨大勢力之附屬物。所以現階級革命之主要任務是：徹底完成民主革命，而以土地革命為重心，徹底完成民族革命，而以驅逐帝國主義在華的勢力為急務，以開闢社會主義之建設的道路。[9]

遵循鄧演達的方向走;第二：包惠僧此評論是伴隨對於馬日事變前後，中共未積極拉攏鄧演達，也未對章伯鈞下達任何指示所作的檢討(章伯鈞不久之後脫離了中共)。因此章伯鈞在此階段不僅未收到中共拉攏鄧演達的指示，另以其對於鄧的親近，欲使鄧的部隊參與城市暴動的可能性也低。參見，包惠僧，《包惠僧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年)，頁 344。

5 章詒和，《一半烟遮，一半雲埋》(香港：星克爾出版，2007 年)，頁 7。

6 姜平，《章伯鈞與中國農工民主黨》，頁 15-18。在共產國際以及瞿秋白的主持下，一批參加南昌暴動的中共人士受到處分。而章伯鈞對中共的左傾路線不滿，且對第三國際大有看法，故在與中共失去聯繫後，便沒主動恢復。詳見，章詒和，《一半烟遮，一半雲埋》，頁 7。

7 此因在中華革命黨設立初期，黨內對中共的蘇維埃政權曾有一番批評，如：在譚平山方面，認為中共在農村暴動底下，輕視了都市產業工人的運動，參見譚平山，《第三黨政綱 ： 中華革命黨宣言》(Moskva: Izdatel' stvo KUTK，1929 年)，頁 21；章伯鈞的想法為，中共將農村到都市中的小資產階級，在恐怖戰略之下，驅入了反革命的陣營，參見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中國農工民主黨歷史參考資料》，第二輯，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時期(出版地不詳：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2 年)，頁 269；至於鄧演達，則認為平民政權建立起來，則所謂紅軍必然自潰，參見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中國農工民主黨歷史參考資料》，第二輯，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時期，頁 217。相較之下，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編的《中國農工民主黨的奮鬥歷程》一書，在這方面的討論保守得多，只言及「不贊成中國共產黨當時組織工農起義建立農村根據地的作法」，詳見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中國農工民主黨的奮鬥歷程》(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 年)，頁 78。

8 姜平，《章伯鈞與中國農工民主黨》，頁 52-53。

9 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中國農工民主黨歷史參考資料》，第二輯，中國國

於此除可見一貫對帝國主義的態度外，還可知其目標為社會主義。而以土地革命為重心，則是為第三黨平民政權中的主要政策之理念，即耕者有其田。因此，不認同中國共產黨是因於當時的暴動路線、恐怖行為與蘇維埃政權的建立。然就遠程目標——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與中共還是相同的。另外，章伯鈞也認為：

> 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前程是無疑問的，並且在較遠的將來也可以合流的；但各國實現社會主義的方式，各有其特殊的歷史和社會經濟的條件來決定；而且各有自己的步驟與階段，決不能一般公式化的在第三國際領導下來完成的。[10]

由此觀之，章伯鈞不認同第三國際指導下的共產黨在中國的行動，並認為中國要走自己的路。[11]不過卻為日後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的合作留下一絲溯源的線索。在此必須重視一個問題，即章伯鈞在臨時行動委員會期間的政治理念除上述反對中共對第三國際的盲從與暴動路線外，其與中共的差異點何在。章伯鈞曾論及：

> 在號稱廣大區域的農村蘇維埃的建立和紅軍發展的形勢下，依然在組織上發生不斷的分裂，在政治路線上表現無常的動搖，抓不起真正無產階級，去領導城市中的鬥爭，甚至脫離了目前急不容緩的民主與民族鬥爭的路線……[12]

究其當時的平民政權理念來看，是依靠國家資本主義下的計劃經濟來提升農民地位；並配合時局，首重於抵抗日本的軍事侵略為首要目的。由此來看，中共當時作法顯得躁進，在中國沒有強大的經濟統制組織下，就要以激烈的根據地革命方式達到社會主義，連帶的也忽視了現階段面臨的外力侵擾。因此在章伯鈞來看，現時的政治目標應為團結抵抗日本，並且還要藉由國家力量將社會推向國家資本主義的計劃經濟而扶助工農的處境。可說是「從東方式的封建社會走向近代資本主義」[13]，再轉入國家資本主義的平民政權裡頭。在福建事件前，目前可找到關於章伯鈞完整的言論是〈我們最近的政治主張〉，由前文以及第一章之分析可知，不論是在反對帝國主義方面、土地改革的經濟方面，甚至是在反蔣、反共上，實

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時期，頁 280。

10 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中國農工民主黨歷史參考資料》，第二輯，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時期，頁 296。

11 這點與鄧演達的觀點是相符合的，如鄧演達曾指責共產黨是第三國際的養子。見馬維政等編，《中國共產黨和民主黨派關係史》（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 年），頁 19。

12 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中國農工民主黨歷史參考資料》，第二輯，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時期，頁 269。

13 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中國農工民主黨歷史參考資料》，第二輯，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時期，頁 276。

與鄧演達的理念如出一轍，也印證了前文所說的章伯鈞對鄧演達的理念認同之深。不過章伯鈞除了贊同鄧演達的農工平民政權外，值得注意的是章伯鈞也認為將來世界是會走向無產階級專政的，其言曰：

> 將來的政治型態亦必然的變成無產階級專政的方式；但是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中，中國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不是工人階級單獨進行的社會主義革命，不是直接建立工人革命政權的革命；所以，在這種轉變期間的革命政權，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從前資本主義轉變到社會主義過渡期間之農工民主專政。[14]

由此可知，章伯鈞除了宣揚鄧演達的平民革命外，也透露出本身認為將來中國是要走向無產階級專政的，相較於鄧演達多所宣傳的平民革命與社會主義道路之前途，更點明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可能。

1931 年 11 月 29 日鄧演達遭殺害，繼續使用「國民黨」的旗號已經沒有實際意義，而且更加仇恨蔣介石，章伯鈞曾提議將黨名改為「中國農工黨」，但黃琪翔等人不贊同。為了維護團結、避免分裂，章伯鈞暫時放棄個人主張，並支持和維護黃琪翔的領導地位。[15]基本上，自 1927 年以後的反國民黨人士及其思想，絕不能忽略蔣介石的四一二清黨之舉與汪精衛的武漢分共。因為此為蔣、汪二人以暴力方式對付異己分子，對於社會輿論有深刻的影響。尤其是對於素來懷有社會主義思想的一批人，成為其對國民黨反感的遠因之一。而這批人力圖以和平改良的方式來建立民主國家，而這種和平改良的政治傾向，使他們既反對國民黨的獨裁政治，又對共產黨的武裝鬥爭方式採取不贊成的態度。[16]然對於章伯鈞而言，他反對共產黨的主要因素應為其激烈的土地政策，至於武裝鬥爭為其不得已的手段。不過對於鄧演達遭難，導致章伯鈞心懷不滿，因此反蔣也是必然的。

鄧演達的死導致了第三黨與國民黨之間的聯繫趨於淡薄，原本鄧演達在言論宣傳上主要是反蔣以及反對南京政權為主，更甚於對國民黨的批評。因此鄧演達

---

[14] 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我們最近的政治主張〉，《中國農工民主黨歷史參考資料》，第二輯，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時期，頁 287。實際上根據列寧主義的國家論來看，資產階級經過無產階級的暴力推翻後，轉入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詳見，鄭學稼，《列寧主義國家論之批判》（臺北：國際共黨問題研究社，1976 年），頁 204-205。

[15] 姜平，《章伯鈞與中國農工民主黨》，頁 70。根據民國 37 年出版的《中國黨派》一書所記，鄧演達死後黃琪翔於南方組織社會民主黨，徐謙組織農工黨於北方，而章伯鈞等人於武漢組織中華農工黨，陳啟修、黃慎之則加入國民黨之改組派。並於 1933 年由黃琪翔與陳銘樞合組的生產黨，在福建發動閩變，事敗後譚平山與徐謙等遂宣佈脫黨。詳見，編者不詳，《中國黨派》（南京：中聯出版社，1948 年），頁 142。因此分裂是有的，然仍有統一的行動。此外，第一章已有討論，在鄧演達死後的第三黨雖有派系問題，然仍暫由黃琪翔管理黨務。

[16] 王力平，〈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民主黨派的“中間色彩”淺析〉，《中國現代史》，期 9（1993 年），頁 22。

一死，似乎促使章伯鈞與第三黨可以在政壇上與國民黨公開唱反調，此因鄧演達自視為承繼孫中山的理念並組織了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只要南京的國民黨政權存在，鄧演達在情感上不便於另外成立政權或建立同中共一樣在地方割據的組織。然而鄧演達的死使情勢改變，使第三黨的獨立性更顯眼（不再只是一個「新的」國民黨，或是被當成中國國民黨底下的一個派系而鄧演達是這左派的領導者），可以有更直接具體的行動，其中福建事件就是最明顯的體現。此外，鄧演達的死除了使第三黨獨立個體更顯明外，也因摒除了國民黨的色彩而導致第三黨在日後第三勢力運動中更具有第三者的代表性。過去孫中山的「追隨者」已死，連帶著「國民黨」這塊招牌也沒有用處。[17]第三黨失去了鄧演達這號人物後，也等同於喪失了吸引國民黨內青年軍人的加入之誘因。不過也出現了一個契機，在鄧死之前較多只能從事於聯絡各地反蔣人士或第四軍系統的將領展開反蔣活動，[18]然而鄧演達一死第三黨也就便於大張旗鼓高舉「共和國」大旗了。

時序進入 1932 年，當年一二八事變結束後十九路軍被調至福建，第三黨人藉由黃琪翔與十九路軍前領導人陳銘樞（1889-1965）的關係[19]，臨時行動委員會的成員進入福建一帶進行政治工作。另外，據 1932 年 7 月 24 日蔣介石電魯滌平指出：

> 據報第三黨在浙江方面軍事活動實力：(1) 台州新河鎮各山鄉共計實力二千餘，實用槍枝約五百餘，由該部首領梁玉指揮；(2) 仙居縣附近各山鄉鎮共計實力八百餘，實用槍枝約二百餘，由該部首領吳施博指揮；(3) 縉雲、永康、武義等三縣共計實力四千餘，實用槍枝約五百餘，由該部首領朱仲明指揮等語。希即嚴查為要。[20]

此條目顯示了第三黨在閩變事件前，曾試圖自行發展地方武力，拓展基層組織實力，並非只單靠十九路軍為發動事變的基本籌碼。雖然實力薄弱，且在閩變事件後，整個軍事力量即被敉平而十九路軍也遭改編，然此事件可以證明早在國共內戰期間第三勢力出現前，非國民黨或共產黨之間的小黨派曾試圖發展武力的最佳

---

[17] 此因臨時行動委員會在定名時，鄧演達認為國民黨這塊招牌可以吸引國民黨內的反蔣的現役軍人力量，因此「國民黨這塊舊招牌，還有一定的用處」，參見羅任一的回憶資料，轉引自，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中國農工民主黨的奮鬥歷程》，頁 82。

[18] 如 1931 年鄧演達曾寄兩封信給黃琪翔討論聯合馮玉祥倒蔣事宜，並派人前去陝甘指導軍事工作。參見，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委員會編，《鄧演達》（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 年），頁 120-122。

[19] 陳銘樞自言：「蔣介石殺害鄧演達，又破壞十九路軍淞滬抗戰，使我同他的矛盾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詳見，朱宗震等編，《陳銘樞回憶錄》（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 年），頁 109。

[20] 王宇高編，《民國二十一年之蔣介石先生》，臺北國史館藏，《蔣檔》，〈文物圖書〉，事略稿本，民國 21 年 7 月 24 日；吳淑鳳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民國 21 年 6 月至 7 月）》，第 15 冊（臺北：國史館，2004 年 12 月），頁 550-551。

證明。

1933 年 11 月福建事變爆發，蔡廷鍇（1892-1968）、陳銘樞、李濟深（1885-1959）、黃琪翔等人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即福建人民政府），章伯鈞擔任經濟、文化委員會委員和土地委員會主任。[21]不過，為求福建人民政府內部團結，迎合陳銘樞組織生產人民黨的想法，故於 1933 年 12 月 11 日宣佈解散臨時行動委員會，[22]但是以「中國革命行動委員會」的名義宣佈解散。[23]據胡適（1891-1962）當時曾在《獨立評論》[24]所言：

> 新政府通令各機關，把中山遺像和遺囑都撤廢了。據報所載，二十日人民代表大會的主席黃琪翔也通電脫離「第三黨」。這個運動的領袖至今好像沒有宣布什麼特別政黨的組織。[25]

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後與中共訂立停戰協定，此協定主要是「停止軍事行動，暫時劃定軍事疆界線……釋放在福建各牢獄中政治犯……依互助互惠之原則，另

---

[21] 姜平，《章伯鈞與中國農工民主黨》，頁 77-80；姜平，《中國民主黨派史》（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87 年），頁 69。

[22] 即〈中國革命行動委員會宣告解散啟事〉，見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中國農工民主黨歷史參考資料》，第二輯，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時期，頁 258。這也與福建事變的主力是由陳銘樞等十九路軍領導人有關。然就福建人民政府所宣傳的政治口號上來看：「保障人民權利；實行農工解放；實現生產人民政權；組織人民革命政府；否認一切賣國條約；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蔣介石；打倒賣國殘民的南京政府；撲滅蔣介石走狗藍衣社；打倒以南京為中心的國民黨系統；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收復東北失地；反對對日妥協，取消塘沽協定；中華民族解放萬歲！」其實受第三黨的政治主張影響甚大。參見，福建省檔案館編，《福建事變檔案資料（1933.11──1934.1）》（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 年），頁 22。當然在福建事變中，胡漢民占有一定的影響力，尤其是在各反蔣人士中擔任居中協調的角色，只是對福建方面改國號、新黨、以及和共黨關係上頗有疑慮。相關討論可參閱，楊天石，《蔣介石真相之一 掌權：南京政府》（臺北：風雲時代，2009 年），頁 255-268。

[23] 姜平，《章伯鈞與中國農工民主黨》，頁 84。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農工民主黨歷史參考資料》第二輯一書中，說明了章伯鈞於福建事變後，於香港通電復黨，並且不承認解散黨一事，此點姜平並未提及。參見國農工民主黨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中國農工民主黨歷史參考資料》，第二輯，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時期，頁 258。

[24] 《獨立評論》創刊於 1932 年 5 月，停辦於 1937 年 7 月，邵銘煌認為《獨立評論》可以說是「九一八事變」下的產物。並為為胡適與丁文江等人在面對「國難」之下，尋求一條言論救國的道路。章清也認為《獨立評論》創辦來說一是國家遭逢九一八事變引發的國難，二是讀書人正努力重整已到山窮水盡的北京大學，因此雜誌的創辦實是形勢所逼。至於在《獨立評論》的銷售量上來說，在問世一年多後，銷售量急增。武菁就提到，其每期能印 1.2 萬~1.3 萬冊，在當時是不小的數目，可見其影響範圍的廣泛。在讀者群方面，其讀者大部分是學生。其次為公務員，再次是開明商人。此外，根據蔣廷黻的回憶有一些青年軍官也一直看《獨立評論》，由此可知，其讀者群是遍布公、學、兵、商等，故《獨立評論》產生的輿論是極具影響力的。相關資料參見，邵銘煌，〈抗戰前北方學人與「獨立評論」（一九三二──一九三七）〉，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79 年 6 月，頁 20；章清，〈“學術社會”的建構與知識分子的“權勢網絡”──《獨立評論》群體及其角色與身分〉，《歷史研究》，總 278 號期 4（2002 年），頁 45；武菁，〈七七事變前《獨立評論》及其抗日宣傳〉，《紀念七七抗戰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4；蔣廷黻英文口述，謝鍾璉譯，《蔣廷黻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4 年），頁 140。

[25] 胡適，〈福建的大變局〉，《獨立評論》（北平），第 79 號，中華民國 22 年 12 月 3 日。

定商業條約」[26]諸項，可說是一份消極的協定，尤其是雙方只有停戰而未有軍事合作的協議出現。[27]人民政府成立後，得不到各方支持且內部又傳出不合[28]，且後來王明（1904-1974）主導的國際派不認同人民政府。[29]在內外問題繁雜之下，不久之後人民政府遭政府鎮壓，主要領導人多流亡海外。

值得注意的是，福建事變還導致另一件插曲，即引發了《獨立評論》上的「民主與獨裁（專制）」的論爭，也是另類的社會輿論對於反內戰的討論。在福建事變發生當時，胡適即有發表評論，其言曰：

> 十一月二十日的變局，從報紙上的記載看來，頗像是一種陳橋兵變，黃袍加身的故事。陳銘樞並不曾到場，而大會上最有力的指揮者卻是前第四軍長黃琪翔。人民權利的宣言是黃琪翔宣讀的。閩皖代表提出了「建立人民革命政府」的提案，黃琪翔即宣稱「大會決定無條件的接受此項提案」，這提案當然無條件的一致通過了。[30]

從言談中可以顯見胡適對於此事件的態度。胡適在不清楚事情的真相下，認為陳銘樞等人是受到第三黨人的慫恿，進而對全國通電聲討蔣介石，並且更視為是「只是一羣『同床異夢』的軍人政客，用驟然的手段，隨時湊合成的一個反國民黨的革命局面。」[31]估不論事件背後的真相為何，也不討論其所擁護的政治理念為何，其手段已造成知識份子的不滿。人民政府雖號召取消國民政府的黨治，但因處在中國面臨外敵侵略的局勢下，一切的革命行為與內戰都將受到誹抵。無怪乎胡適會認為不論什麼金字招牌，都不能解除內戰的罪惡。[32]

---

26 薛謀成、鄭全備選編，《"福建事變"資料選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 年），頁 57-58。

27 據陳銘樞回憶，在事變前即已派人與中共談判合作問題，然「經過一個月商談，沒有結果。後聞秦邦憲還罵我們"比蔣介石更反動"。」參見，朱宗震等編，《陳銘樞回憶錄》，頁 124。如此來看，事變經過當中，會簽訂消極的停戰與商業往來協定，也就事出有因了。從中共對閩變的態度來看，不會提供實質的軍事或物品協助。當然這也與當時中共陷入第五次圍剿的局勢有關。因此曾有資料指出：「……第三黨秘密改編共匪已成兩師，其目的在取得潮梅為根據。蔡對此極反對，偽府內部因此糾紛日多，李、陳無法處置……」值得商榷其真實性。參見，〈吳鐵城電蔣中正據報蔡廷楷反對第三黨秘密改編共匪謀取潮梅，偽府內部遂起糾紛〉，民國 22 年 12 月 7 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文電，檔號：002080200137038。

28 其實在事變發生前，內部就有分歧。吳明剛曾談到鼓山會議是福建事變醞釀過程中重要一次會議，也是領導核心內部意見分歧最大的一次會議。為此蔡廷鍇曾說：「陳銘樞排除一切，一意蠻幹地發動了。」詳見，吳明剛，《1933：福建事變始末》（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年），頁 225。

29 相關研究可參閱，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係之研究》（臺北：東大圖書，1995 年），頁 2。

30 胡適，〈福建的大變局〉，《獨立評論》，第 79 號，中華民國 22 年 12 月 3 日。

31 胡適，〈福建的大變局〉，《獨立評論》，第 79 號，中華民國 22 年 12 月 3 日。

32 胡適，〈福建的大變局〉，《獨立評論》，第 79 號，中華民國 22 年 12 月 3 日；在兩年多後的兩廣事件發生時，胡適如唱此調，其言：「在這個強鄰威脅猛進的局勢之下，無論什麼金字招牌，都不能減輕掀動內戰的大責任……」詳見，胡適，〈「親者所痛，仇者所快！」〉，《獨

第二節　章伯鈞及其第三黨的改變

1935 年正當中共放棄蘇維埃根據地，「長征」至毛兒蓋[33]之時，第三國際在莫斯科舉行第七次大會，王明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發表了〈中國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呼籲各黨派聯合抗日：

> 當今我亡國滅種大禍迫在眉睫之時，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再一次向全體同胞呼籲：無論各黨派間在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政見和利害的不同，無論各界同胞間有任何意見上或利益上的差異，無論各軍隊間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敵對行動，大家都應當有“兄弟鬩牆外禦其侮”的真誠覺悟，首先大家都應當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人力、物力、財力、武力等）去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34]

〈八一宣言〉發表後，就得到黃琪翔、章伯鈞等人的響應。[35]其中黃琪翔更告訴章伯鈞說：「從現在鬥爭的實際情況來看，共產黨是鬥爭的主力，要革命就必須與紅軍取得聯繫，必須同共產黨合作。」[36]福建事變失敗後，其呈現一明顯事實，即當時無法鞏固有效的武裝力量。而此時中共〈八一宣言〉的發表，恰好打開一扇窗，以共同抗日為名實行黨派合作，埋下日後章伯鈞以及反內戰人士於第三勢力中角力的戰場。另外，中共發表此宣言的影響力，與國民黨的清黨、以及暗殺鄧演達所造成的社會輿論，彼此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1935 年 10 月下旬，章伯鈞在香港與彭澤民、丘哲等人會合，經過商討決定將組織名稱改為「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而組織的綱領仍以鄧演達主持確定的綱領作為基本綱領。[37]意即為延續鄧演達的改革理念。1935 年 11 月章伯鈞等人於香港召開第一次臨時代表大會（後改稱第二次全國幹部會議），會議通過了〈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臨時行動綱領〉、〈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告同志書〉(以下簡稱〈臨時行動綱領〉與〈告同志書〉)[38]。

立評論》(北平)，第 206 號，中華民國 25 年 6 月 21 日。

33 1935 年 8 月 20 日，中央政治局在四川毛兒蓋舉行會議，著重討論紅軍主力的發展方向問題。

34 中央檔案館編，〈中國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一九三四——一九三五）》，第十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年），頁 521-522。

35 姜平，《章伯鈞與中國農工民主黨》，頁 97。

36 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中國農工民主黨的奮鬥歷程》，頁 95；姜平，《章伯鈞與中國農工民主黨》，頁 88。

37 彭衛，〈農工民主黨在抗戰時期的積極作用評述〉，《重慶社會主義學院學報》，期 1(2005 年)，頁 50。

38 〈告同志書〉雖未標明著者，然依內容與當時第三黨主事者來看，有可能出於章伯鈞之手。

〈臨時行動綱領〉中有幾項重點，如儘快對日作戰、實行聯俄政策、召集全國人民非常代表大會、進行土地革命等。[39]而〈告同志書〉中，提出了以馬列主義為思想武器和組織反日陣線的建議。[40]這是與臨時行動委員會時期最大的不同之處，〈告同志書〉中說：

> ……中國的反動層，不僅是軍閥官僚買辦地主豪紳，中國的資產階級亦復如此；過去的大革命，因資產階級中途的叛變而流產；在現在，中國的資產階級又公開親日……證明中國反帝反日的革命，不能與反軍閥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地主豪紳的革命分開。
>
> ……
>
> 我們之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既不是盲目的把中國當歐洲，更不是機械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做教條，而是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以理解中國的社會，及其歷史過程，決定我們的鬥爭綱領，政策和方法等等。[41]

由此可知在歷經鄧演達遭到殺害、福建事變的失敗、以及中共〈八一宣言〉的發佈後，章伯鈞等人在思想與路線上的轉變，即國民黨歷來以暴力和消滅對方的方式來對付異黨異己，章伯鈞因而藉由馬列主義來凸顯中國的階級問題，進一步提高第三黨的凝結力以及加強於階級理論上的穩固。然章伯鈞對於馬列主義的瞭解程度仍值得探討。根據章詒和的說法，其曾謂：

> 父親講，讀馬（克思）恩（格斯）要看德文版的，蘇聯的俄譯本不行，中共的譯本就更不準確了。六〇、六一年的時候，毛澤東提出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核心是階級和階級鬥爭，父親聽了怒不可遏，說：「把馬克思主義說成是階級和階級鬥爭學說，叫混蛋邏輯。」話的尖銳以及聲音之大，把我和媽媽都嚇呆了。[42]

章伯鈞原即在德國哲學系攻讀黑格爾和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對馬克思等人的理論思想自有一番瞭解，然而在實際政策的執行上，仍然沒有中共在土改中的階級

---

[39] 姜平，《章伯鈞與中國農工民主黨》，頁 90-93；邱錢牧、林浣芬等，《民主革命時期的民主黨派》（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頁 562-569。

[40] 中央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寫，《中國農工民主黨章程》（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83 年），頁 28。

[41] 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中國農工民主黨歷史參考資料》，第三輯，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時期（出版地不詳：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出版年不詳），頁 2-3。

[42] 章詒和，《最後的貴族》（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276。

鬥爭方式[43]，只不過在思想方面，可謂逐步接受了現實環境的難鉅，力圖從組織成員的思想上進行革新。章詒和此段回憶雖提到章伯鈞對於把馬克思主義當成階級鬥爭學說感到憤怒，然而在當年的〈告同志書〉上的確是藉由馬列來強化階級理論，可當成是一種工具上的使用性突出，此外也有可能是因為列寧將馬克思的階級理論在十月革命中實現，增加了階級鬥爭的色彩。不過第三黨此次的改組也透露出一個事實，即在福建事變失敗，黃琪翔去國後對第三黨的影響力大減，章伯鈞在鄧演達的平民革命主張上又添了馬列的理論。[44]

另外，許多大陸方面的研究曾指出在〈臨時行動綱領〉中提出了聯俄聯共政策，然而實際上聯共方面的策略未曾出現，此實需仔細注意。[45]

1935 年 12 月瓦窯堡會議後，中共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並且要求「廣泛的統一戰線」，並且批評了黨內的關門主義，並爭取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46]進而於 1936 年 4 月，中共中央發表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創立全國各黨各派的抗日人民陣線宣言〉，提出了「抗日救國是我們的共同要求」、「創立抗日的人民陣線以抵禦日本帝國主義盜匪們的長驅直入」、以及「召集全國抗日救國代表大會，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47]。

西安事變發生後，使「聯蔣抗日」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勢已成，[48]也

---

[43] 在〈臨時行動綱領〉中關於土地問題一項，仍是鄧演達的方式，即沒收土地與分配予農民。詳見，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中國農工民主黨歷史參考資料》，第三輯，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時期，頁 19。

[44] 此因不論是〈告同志書〉或〈臨時行動綱領〉其實不出鄧演達的平民革命主張太遠，只是因應時局將反帝中的反日議題升高加溫，並在理論工具上加添了馬列主義一則。

[45] 如在《章伯鈞與中國農工民主黨》一書中，曾提及「聯俄聯共政策」，參見姜平，《章伯鈞與中國農工民主黨》，頁 91。但在〈臨時行動綱領〉中實際上只言及：「我們不是共產黨人，我們的任務，更不是在中國建設蘇維埃，而是進行民族革命，達到民主自由的目的。可是我們承認蘇維埃是其現有區域的政權形式，要敦促紅軍與全國反帝的軍隊和人民取一致的行動，共同對日作戰。」，參見邱錢牧、林浣芬等，《民主革命時期的民主黨派》，頁 567；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中國農工民主黨歷史參考資料》，第三輯，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時期，頁 18。可見此時期聯俄的主要原因是考量第三國際與中共的關係，並又有孫中山聯俄時期的歷史因素上而出現的。如此結合俄國與中共一同抗日。

[46]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一九三四——一九三五）》，第十冊，頁 617-619。

[47] 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創立全國各黨各派的抗日人民陣線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一九三六——一九三八）》，第十一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年），頁 18。

[48] 當然對當時大部分的知識份子而言，只知道西安事變與中共有關，對幕後的蘇聯與張學良立場較難得知，只能確定的西安事變後國、共兩黨抗日統一戰線已成。千家駒就曾憶起：「十二月二十五日，我和廷璆正在青島一西餐館進餐，忽然聽到中央電台廣播，『現在報告大家一個特大的好消息，蔣委員長已於今日由張學良護送回到洛陽……』不少顧客鼓掌歡呼，以後廣播員又一再廣播，當時我們對中共的統一戰線政策缺乏了解，對於蔣介石之被扣留又被釋放，甚為疑惑。」，詳見，千家駒，《從追求到幻滅——一個中國經濟學家的自傳》（臺北：時報文化，1993 年），頁 93。

促使大規模的內戰暫告停止。[49]西安事變可說是章伯鈞政治生涯的一個轉折，此因從第三黨早期鄧演達主事開始直到 1936 年 6 月的兩廣事變中，在南寧召開的各黨派聯席會議上章伯鈞還在疾呼：「立即組成反蔣政府，發動抗日戰爭」[50]，然而在同年 12 月西安事變之後情勢急轉直下，整個中國局勢與社會輿論成了不論在聲望上或政治態勢上蔣介石為最高的領導。維持了將近十年之久的反蔣活動暫告一個段落。此外，反蔣活動的結束也促使另一個局勢的崛起有了可能，即結束對蔣敵視下的第三勢力運動因子初成。

附帶一提，在西安事變發生前，曾發生救國會「七君子」[51]被捕一事。救國會為中間偏左團體，其成立背景與「七君子事件」之發生，顯示除抗日這個民族主義情緒外，還包括不滿國民黨訓政作為的抨擊以及對共產黨的同情心態。[52]「七君子事件」在海外華僑與國際人士間引起了很大反響，各國知名人士都致電國民政府，要求恢復「七君子」的自由。[53]而據曹聚仁（1900-1972）所言：「救國會一開頭，並無政治組織上的聯繫，比較接近的，還是廣西的軍政當局，其次則宋慶齡表示積極支持。」、「『七君子』被捕後，國人對於救國會反而重視起來…反宣傳的作用很大，幾乎鬧得全國皆知了。」[54]此後，民主人士對國民黨的反感，又多了一筆。

盧溝橋事變爆發後，中國正式與日本打了起來，而中共也趁此機會進行大力的宣傳。宣傳工作主要在組織救亡協會或援助抗戰委員會等類似機構上，其中 1937 年 7 月 15 日中央書記處給各地黨部的指示中曾提及：

> 對國民黨每一抗戰的步驟，應採取歡迎與贊成的態度，堅決反對挑撥離間的陰謀。共產黨員應實際上成為各地救亡運動與救亡組織之發起人，宣傳者與組織者，以誠懇坦白謙遜之態度與努力的工作，取得信仰及這類團體中的領導位置。[55]

經過這番作為，中共不僅取得了社會輿論，更重要的是對於民主人士的拉攏上取得良好的效果。

1938 年 3 月解放行動委員會於武漢召開第三次全國幹部會議，會議通過了

---

[49] 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係之研究》，頁 427-429。
[50] 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中國農工民主黨的奮鬥歷程》，頁 101。
[51] 即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史良、李公樸、王造時、沙千里七人。
[52] 王玉，〈從「七君子」的背景看救國會的成立〉，《白沙人文社會學報》，期 2（2003 年 10 月），頁 236。王玉此文結論頗值得參考。尤其七君子的背景與中國農工民主黨之政治立場，有許多相似之處。
[53] 周天度主編，《七君子傳》（河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年），頁 87。
[54] 曹聚仁遺稿，〈民主同盟的形成及其下場〉，《傳記文學》，卷 72 期 1（1998 年 1 月），頁 78。
[55]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一九三六——一九三八）》，第十一冊，頁 289-290。

增補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決定中央負責人均暫時不定職稱，並推定章伯鈞為黨的總聯絡人。[56]黃琪翔為原總書記，但因加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因此不便公開主持黨務。[57]然實際上從此時開始直到第三黨再次改組為農工民主黨之日，章伯鈞逐步成為第三黨的實際領導者。此外第三次全國幹部會議也通過了〈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抗戰時期的政治主張〉（以下簡稱〈抗戰時期的政治主張〉），此內容包含甚廣：在軍事方面實行持久戰、外交上堅持抵日、政治上要求民主政治，建立「全民救國代表大會」、經濟方面改善民生、以及教育上的戰時教育之提出等。[58]基本上皆配合戰時的實際考量，唯值得注意的是，〈抗戰時期的政治主張〉，明白提出了人民有武裝的自由，以期發揮救國的能力。[59]第三黨人對基層組織與發展軍事力量的努力未曾間斷，根據蔣中正於 1940 年 9 月 9 日給陳誠的手諭顯示：

> 辭修吾弟勛鑒：
>
> 第三黨組織自上年復活以來，現在正在積極進行發展，而以第六戰區長官部與第四戰區、第七戰區為基本對象，此絕非任意無根之談。望嚴密考察與取締，如其部中有不先呈明而活動黨外組織者，應以破壞紀律與圖謀不軌論坐也。順頌戎祉。中正手啟。九月九日。[60]

此條說明第三黨人欲發展軍隊裡頭人脈關係，以現有的軍事武裝之拉攏和建立自身地方軍力雙管齊下。可知即使福建事變失敗，第三黨仍不放棄擁有軍事力量的構想。此外，也可看出既使在西安事變後聯蔣抗日之勢已成，章伯鈞在暗地裡仍允使第三黨在現役軍人中發展勢力。不過在公開政治場合上，一致承認蔣介石的地位則毋庸置疑。

1938 年 3 月 29 日至 4 月 1 日，國民黨於漢口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制定〈抗戰建國綱領〉，宣佈設立國民參政會。[61]在此之前，章伯鈞在分析國際形勢與中國抗戰時曾提到：

> 中國在過去十年間，曾有不斷的各種性質的內爭，其陣線的分佈，是以內

---

56 姜平，《章伯鈞與中國農工民主黨》，頁 109；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中國農工民主黨的奮鬥歷程》，頁 107；中央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寫，《中國農工民主黨章程》，頁 31。1936 年 10 月黃琪翔應陳誠之邀回國後，大部份時間投入於戰爭事務中。

57 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中國農工民主黨的奮鬥歷程》，頁 107。

58 邱錢牧、林浣芬等，《民主革命時期的民主黨派》，頁 569-585；姜平，《章伯鈞與中國農工民主黨》，頁 109-113。

59 邱錢牧、林浣芬等，《民主革命時期的民主黨派》，頁 575。

60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下冊（臺北：國史館，2007 年），頁 468。

61 彥奇、王幼樵編，《中國農工民主黨歷史研究：民主革命時期》（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4 年），頁 69。

> 在的社會矛盾為規定的因素，但一旦因民族國家的危機，大過一切內在的矛盾，便立即構成對立的統一，產生了為國家民族獨立而抗戰的民族統一戰線。[62]

巧合的是，所謂過去的十年間有過不少內爭，其實也包含了章伯鈞自己在內，過去的反蔣運動在面臨外敵侵略下，做出了為抗戰而生的統一戰線，當然不論是否出於主觀自願，其時的社會輿論也容不下反蔣聲浪。

第一屆國民參政會於 1938 年 7 月在武漢召開，章伯鈞是第三黨被選為參政員的唯一代表。他對參政會的活動非常重視，並且藉著開會時機，在會內外積極活動。[63]當然章伯鈞此前也對國民參政會提出了幾點意見：

> 根據國民黨臨時全代會的決議，已經頒布了國民參政會的組織條例，這一事實，充分證明了中國已經開始走向民主政治的道路。因此，對於國民參政會的組織，在原則上，我們是十分贊成的，雖然，它並不是一個完全的民意機關。我們認為這種參政會的實現，及其發展，是可以成為走向全民救亡代表大會最高原則的一種步驟。我們對於國民參政會的組織條例，願提出下列的意見，以供政府和全國人士的參考：第一，……確定全國各在野黨派的參加，人數可由政府按實際情形規定，但代表必須由各黨派自己推選。……第二，……若以為全國各職業團體的組織尚未完備（其實全國各文化團體及經濟團體的組織情形亦何嘗完備），亦應當保留若干名額待其參加。第三，……目前辦理選政困難，亦屬事實，但各在野黨派及人民團體的參政員，必須由其自行推選……第四，……（一）參政會得依據政府所決定的國策（如抗戰建國綱領之類），有制定法令之權，（二）參政會得有自行召集會議之權。……第五，參政會既是民意機關，則參政員的權利（如自由討論與發表主張等）與保障（如非法逮捕及制裁等）這一點，是一個民主國家的政府對於人民代表應當給予的。[64]

章伯鈞對參政會的期待不外乎就是強調應有的立法之權與言論自由的保障，而對於職業團體代表權的問題則可視為鄧演達理想中的平民政權由職業團體構成有關，因此章伯鈞才會認為職業團體應在參政會代表中占有一席之地。章伯鈞除在參政會上活躍外，也於隔年 10 月參與「統一建國同志會」之發起。它還不算是

---

[62] 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中國農工民主黨歷史參考資料》，第三輯，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時期，頁 34。

[63] 姜平，《章伯鈞與中國農工民主黨》，頁 124。

[64] 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中國農工民主黨歷史參考資料》，第三輯，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時期，頁 47-49。

一個政黨，但卻為日後「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成立，做了組織上的準備。[65]

第一屆國民參政會結束，會議通過組織憲政期成會，任務是協助政府修改憲法草案，促成憲政。於此時期，國、共兩黨對於爭取中間分子的支持，莫不盡其心力。其中，1940 年 4 月 1 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就曾給予爭取小黨派及中間分子的指示：

> 蔣正在用心實行憲政的允諾拉攏各小黨派及中間派分子，孤立我們，同時把內戰與磨擦的責任推在我們身上…各小黨派及中間分子中有反對內戰停止磨擦實行憲政好意的要求，但他們對於國民黨是內戰的挑撥者磨擦的主動者則不了解…我們對策為得同各小黨派及中間分子聯合，必須同他們一起……[66]

在中共的極力拉攏之下，加上原本思想理論上的相近以及對國民黨素來的反感，章伯鈞與中共走得愈來愈近。國民黨也欲拉近與章伯鈞的距離，不論此事是否屬實，章伯鈞與國民黨之間一直保持距離。[67]

在 1940 年 7、8 月之時，中共中央討論周恩來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工作報告和南方局的工作報告。在會議上，毛澤東即充分肯定周恩來的統一戰線工作，尤其注意到了中間勢力，要求今後要更加注意國民黨統治區這方面的工作。[68]

1941 年 1 月新四軍事件爆發後，民主黨派分子有感於國共關係日益惡化，於是籌劃組織「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思結合第三方面之力，共謀團結。[69]聞黎明就認為作為國、共之間的中間黨派，他們雖然看到了國、共的尖銳對立，但不認為新四軍事件就一定會導致國、共走向分裂。[70]中國民主同盟的前身即是 1941 年成立的民主政團同盟，並且從政團同盟成立時起，章伯鈞一直擔任同盟中央常委和組織部部長、組織委員會主任長達十餘年。[71]另外根據《周恩來年譜》中 1941

---

[65] 姜平，《章伯鈞與中國農工民主黨》，頁 131。

[66]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一九三九——一九四〇）》，第十二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年），頁 344-345。

[67] 姜平，《章伯鈞與中國農工民主黨》，頁 117-118。姜平書中言及，陳誠、陳立夫與曾琦皆曾先後找章伯鈞談話，不過都被拒絕。值得一提的，筆者遍查《曾琦先生年譜》一書，並未有此事的記載。參見，陳正茂編，《曾琦先生年譜》（臺北：國史館，1996 年）。

[68] 金冲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 年），頁 603。

[69] 陳正茂編，《曾琦先生年譜》，頁 159。

[70] 聞黎明，《第三種力量與抗戰時期的中國政治》（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 年），頁 186。

[71] 有另一種說法是，抗戰開始後第三黨雖然取得合法地位，但因國民黨基於歷史原因故對第三黨壓迫，章伯鈞與丘哲等人為保存第三黨才欲聯合各黨派，以民主力量對抗蔣介石的壓力。參見，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研究室編，《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農工民主黨（1930——1945）》（無出版項，內部研究資料），頁 47。

年 1 月 15 日條裡曾對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成立有所紀錄：

> 致電毛澤東并中共中央書記處：當前各小黨派想成立一民主聯盟，以求自保和發展。我們力促其成，條件為真正中間，不要偏向國民黨。我們決定利用此時機，一面加緊布置疏散和隱蔽；一面加強統戰活動，主要目的在對外國朋友和小黨派作進一層的解釋和活動，以繼續揭穿蔣介石。[72]

此乃面對新四軍事件後，藉著各黨派之間的聯合促使國共團結抗日的時機，中共欲在此方面上爭取聲援，並宣傳國民黨不極力抗日的手法。不過於日後有一意外的小插曲，即在 1947 年的《新華日報》上曾刊載一則聲明，駁斥中央社宣稱有中共秘密文件並有一份地下鬥爭綱領的存在。報導中還提及：「此次中央社所發表之文件，其用意顯然要造出莫須有的藉口，對民主同盟、民主建國會、民主促進會……等民主人士的組織，加以摧殘。所以我們有道義上的責任，對中外人士作此聲明。」[73]此報導在當時出現的因素，應是中共欲澄清與第三勢力之間並無過度「親密」的關係，並撇清可能有交叉黨員的存在，如此欲避免民眾中對於第三勢力已與中共合作的輿論出現。

此外，各民主黨派希望透過第二屆國民參政會來緩解一下國共矛盾，紛紛表示這次會議中共方面的代表權必不可少。[74]由此可知，在面臨新四軍事件爆發後，中共中央頗能利用時機加強宣傳，而位居「正統」地位的國民政府，則不斷受到各方壓力，被要求公正的分配參政會參政員名額。

至於在這一階段裡頭，中共中央除對內部下達加強統戰活動外，對外界及知識份子的民主宣傳上則利用報刊來製造輿論。茲就此時期《新華日報》的內容來概論其宣傳內容與手法：

第一，不時地報導國際共黨組織利用民主選舉方式參與其所屬國家的政權，或以抗爭示威方式爭取國家的民主。例如，1946 年 5 月時有報導指出世界二十國共產黨領導或參加了政府，並言：「現在除蘇聯和中國外，世界上已有十八個國家的共產黨，領導或參加了政府，這就是規定世界一定要向和平民主之路發展的保證。」[75]

---

7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頁 497。在同年 1 月 24 日周恩來與董必武、葉劍英聯名致電中共中央，也曾提到新四軍事件後，民主黨派對國民黨大感失望，有加強團結的必要。章伯鈞與左舜生等人欲與中共合作進行民主和反內戰運動。詳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頁 500。

73 《新華日報》（太岳版），中華民國 36 年 5 月 9 日，版 1。

74 金冲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頁 618。

75 《新華日報》（太岳版），中華民國 35 年 5 月 21 日，版 3。

第二，報導國民黨破壞言論自由與迫害民主人士。在 1946 年 4 月 9 日即報導抗議搜捕《解放日報》，並言：「這一事件，表現國民黨當局直接出來破壞全國人民的居住、人身、言論、出版的自由，破壞政協會決議的實行，全國人民如果不立刻起來制止，那麼中國人民爭取和平民主的事業，將更加遭受更嚴重的困難。」[76]

第三，將國民黨的發動內戰與召開國大解釋為反對民主。例如對於出兵東北一事，即言：「……因此就必須動員一切民主力量，團結一致，反對增兵東北，反對內戰、堅持東北問題和平解決，堅持民主權利、堅持立即改組國民政府，堅持民主憲法，堅持國民黨軍隊澈底縮編及澈底國家化，堅持三大協議的百分之百實現。」[77]，此為將反戰與民主議題相結合。而召開國民大會更被批評為「一黨」的國大，《新華日報》即以暹邏華僑通電反對國大為名，報導了其團體「決然反對此禍國殃民之一黨『國大』，而全力擁護先生等（指毛澤東與張瀾兩位，引者註）堅持和平團結，實行政協決議之主張……。」[78]

第四，報導中共指導下的地方政府民主選舉活動。以陽城縣補選國大代表大會一事為例：「今天我們選舉是和國民黨地區的選舉完全不同。國民黨區的選舉，仍然和過去一樣，是由國民黨一黨包辦，有錢有勢的人才能有選舉權。而在我們解放區的選舉，才是完全民主的選舉，沒有任何限制，誰願選誰就能選誰。」[79]，此明白地將兩黨選舉情況作一比較。又如內蒙古察哈爾省在張家口舉行代表會議，並實行自由普選成立盟政府。報導云：「平民與喇嘛總管、族長，同樣有平等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以無記名投票產生了各族的民主政府……。」[80]並於隔年又報導內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以及自治綱領通過的消息，報導提及：「在政府性質上：綱領中規定：『內蒙古民族各階層聯合……實行高度自治的區域民主政府』。在人民權利上規定：『凡十八歲以上，不分階級、性別、民族、信仰、文化，除剝奪公民權及精神病者外，皆有選舉與被選舉權』……。」[81]又如松江省舉行人民代表大會正式成立民主政府，報導中有言：「這是一個民主的地方聯合政府，其中有共產黨員、國民黨員，也有民主同盟和無黨派人士，完全按照三三制原則而組成的……。」[82]

第五，在社論中明白說明中國共產黨主張民主，由人民作主、以及全體中國

---

[76] 《新華日報》（太岳版），中華民國 35 年 4 月 9 日，版 3。
[77] 《新華日報》（太岳版），中華民國 35 年 4 月 15 日，版 2。
[78] 《新華日報》（太岳版），中華民國 35 年 12 月 29 日，版 3。
[79] 《新華日報》（太岳版），中華民國 35 年 4 月 19 日，版 2。
[80] 《新華日報》（太岳版），中華民國 35 年 5 月 11 日，版 3。
[81] 《新華日報》（太岳版），中華民國 36 年 5 月 19 日，版 3。
[82] 《新華日報》（太岳版），中華民國 35 年 5 月 25 日，版 1。

人民合作建設新國家。此外，也聲明只有以私有財產為基礎又為民族所保護的自由工業制度和自由土地制度，才能發展民族生產力致國家於富強。[83]

上述《新華日報》中所報導的各項消息，其真實度與實際情況並非本文探討的焦點。然而藉由報導國際間的共黨組織和平參與政權，以及中共勢力下的民主選舉，期能影響社會大眾對中共民主的觀感，再配合所提倡的「聯合政府」之宣傳，能達到一定程度的影響力。此外，對於國民黨的負面新聞不時穿插其中，不論是壓制言論自由、特務殺人、發動內戰、召開「一黨」的國大、以及壓迫民主人士等，致使民眾對國、共兩黨之間產生了高下立判之感。

在關注中共對內、對外的統戰與民主宣傳之後，回到本文主題。需注意的是，在此時期章伯鈞等第三黨人因國民黨當局之壓迫，[84]「……日漸左傾，提出聯蘇聯共為中心，主張與我黨更密切合作，還派出章伯鈞等同我們談判，表示合作誠意，盼我們給予切實援助，我們已表示贊同。」[85]此外還要求中共對第三黨的綱領、組織和宣傳給予支持和肯定。[86]如此很明顯發現了國民黨對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的壓迫導致發展困難，迫使章伯鈞向理念相近的中共提出合作意圖與伸援，不過關於聯俄的主張在前文已有討論，並非是因日漸左傾才提出的，且從經濟援助上來看，此也不是頭一遭或絕響，從早期的孫科（1891-1973）、陳公博（1892-1946）到後來的龍雲（1884-1962）與民盟的關係都有過金錢上的往來。[87]此時檯面下第三黨與中共關係已十分密切，然檯面上因面對黨派聯合的組建，仍舊標榜獨立於國、共兩黨之間的第三勢力。且即使第三黨接受中共援助，並不代表章伯鈞等人已放棄了原先的政治理想，只是面對於當前局勢，國、共的和談、團結抗日以及民主政治之推行，成為第三黨的首要理念了。

1941 年 3 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成立大會於重慶召開，《光明報》於 10 月發表啟事，宣告政團同盟的成立。就其主張綱領而言，不外乎貫徹抗日、結束黨治、加強國內團結、軍隊國家化、保障人身自由、尊重學術與言論自由、以及健全監

---

[83] 《新華日報》（太岳版），中華民國 35 年 7 月 4 日，版 1。

[84] 如自第一居國民參政會結束後，參政員的資格就沒有章伯鈞，直到 1945 第四居才又恢復資格。詳見，姜平，《章伯鈞與中國農工民主黨》，頁 137。

[8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頁 500。

[86] 楊力，〈爭取中間勢力——記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在重慶與第三黨的交往〉，《重慶社會主義學院學報》，期 3（2005 年），頁 62；姜平，《章伯鈞與中國農工民主黨》，頁 137。姜平此段討論曾引用了肖翰香的《中國農工民主黨和中國共產黨的關係》一書，裡頭也對周恩來 1 月 24 日寄予中共中央的信有所討論，然而肖翰香之文章卻多了「該黨〔第三黨，引者註〕凡在大是大非的鬥爭中，都站在共產黨一邊，採取了積極的態度。」此段話。此明顯有失偏頗，如同本文前述，第三黨與中共的關係是一種漸近的過程，而非在國共衝突中，都是靠攏中共。

[87] 相關資料可參見，王唯廉，〈第三黨的故事〉，收錄於海天出版社編，《現代史料》，第一集（出版地不詳：海天出版社，1933 年），頁 261；楊維真，《從合作到決裂：論龍雲與中央的關係（1927-1949）》（臺北：國史館，2000 年），頁 267-268。

察機關等。[88]其成立宣言中，明確指出了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是一聯合體，並非單一組織，也非是一個政黨，而是許多黨派的聯合。[89]

1942 年開始，在章伯鈞等人的極力主張下，民主政團同盟又將救國會吸收入盟，救國會人數雖少，但因有七君子一行人等，故提高了政團同盟在社會中的影響。[90]從此，政團同盟中所謂的「三黨三派」（即第三黨、青年黨、國社黨、救國會、職教社、鄉村建設派）出現，形成一支力量不小的政治團體。

1944 年起為便廣泛吸收無黨派人士入盟，欲取消「政團」的聯合體，形成廣大民主人士的聯合體。9 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於重慶開會，會議通過取消同盟的團體會員制，以後盟員一律以個人名義加入。此次會議也改組中央領導機構，而章伯鈞被選為組織委員會主任。[91]章伯鈞在此時期多半在宣揚民主政治與言論自由，其於《中華論壇》的發刊詞上就說了：「民主國家的精神，就是言論自由的表現。輿論之真正的發揚，就是民主政治的基礎……思想與政見是人人不必盡同的，亦事實上所不能盡同的。如強人以相同，或脅之以相同，只是徒勞而已。」[92]在蔣介石於 1945 年的元旦廣播中談到在反攻基礎確立後，將召開國民大會並頒布憲法歸政於民，章伯鈞為此加以評論並提出了幾點意見：

> （一）……我們今天應當要求當政的國民黨能真正首先實行三民主義的民主和全國共守的憲政，……（二）憲政的實施，本為中國人民早經企求及奮鬥之目標，盡速完成、無待戰後之議，自從抗戰以來，即為在野黨派力持之主張。但在尚未召開大會，實施憲政之前，一般民主自由的權利，如集會、言論、結社之自由；召開競選、發表政治主張之自由、以及黨派合法平等地位的確立，必須立即實現，……（三）……當前國內的主要問題，是民主團結的問題，召開國民大會與實行憲政，自是促進和實現民主團結的門徑，如用得其道，在抗戰的今日，則可以達到服從"軍事第一"的目標，同時又可以奠定"建國必成"的基礎。但離開實際、困守成規，以主觀代替客觀，以感情代替真理，以塞責代替事業，則此等制憲之國民大會，或會變成一種政治鬥爭的對象。……（四）……政治須服從軍事。但同時，

88 中國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中國民主同盟歷史文獻——1941-1949》（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3 年），頁 8-9。

89 中國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中國民主同盟歷史文獻——1941-1949》，頁 10。

90 姜平，《章伯鈞與中國農工民主黨》，頁 144。一般研究，則以救國會入政團同盟後，使組織加重左傾色彩。或言避免外人引起聯想，救國會遲至 1942 年才加入。參見，張曉芳，〈中國民主同盟之研究（民國二十八~三十八年）〉，臺北：國立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 年，頁 26-27。

91 姜平，《章伯鈞與中國農工民主黨》，頁 145-146。

92 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中國農工民主黨歷史參考資料》，第三輯，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時期，頁 83。

> 我們又不可忽視了另一個重大的原則，那就是政治是保証軍事勝利的前提。……我們根據上面的看法，認為在召集國民大會以前，應該先有方法邀請各黨派參加共同商決當前各種迫切的政治問題，藉以扭轉時局的危機。[93]

簡而言之，章伯鈞表達的訴求很明確，即在國大召開以前就應召集各黨派商討國事，盡早共同議事，且給予在野黨派合法地位。尤其當時在野勢力已集結成中國民主同盟並涵蓋了許多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章伯鈞此番言論也是在向國民黨要求正視民盟的在野實力，並盡早提供合法自由的活動空間。

不過，自從改為民主同盟後，盟員逐漸增多，於是好奇者、投機者既蜂擁而來，盟員乃趨於複雜，中共想利用「民盟」做為工具的意圖，也逐步明顯了。[94] 曹聚仁表示：「中共和國民黨之想利用『民盟』的心理是相等的；主要的原因，還在於華盛頓方面重視這股第三者的中間勢力。」[95]不論章伯鈞等人最初心態為何，盟員趨於複雜、投機者增多，為不樂見之事。[96]

1945 年 4 月，中國共產黨「七大」於延安開幕，會中毛澤東發表了〈論聯合政府〉的報告，其中提出了：「成立一個由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和無黨無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聯合組成的臨時的中央政府，發布一個民主的施政綱領。」[97]此言論影響甚大，章詒和認為：

> 當時張瀾、張君勱、黃炎培、羅隆基以及父親在內，都不想完全切斷與國民黨的聯繫。父親與陳誠之間、羅隆基與宋子文之間一直都保持著很好的交往和私人情誼。恰恰老蔣死命擠壓民盟，盯梢，跟蹤，暗殺，直至解散，硬是把個中間道路堵死，硬是把個民盟推到中共一邊。加之，毛澤東及時放出來"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和高揚"聯合政府"的旗幟，它們終於打動了這些民主人士。務虛的羅隆基、務實的章伯鈞都相信了。儘管他們都不信共產主義和馬列主義，但都覺得中國歷史進程的確需要"民主主義"，中國社會的確需要"聯合政府"。[98]

若以章伯鈞來看，其對馬列主義並非不甚瞭解。但在當時的環境影響下，中共與

---

93 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中國農工民主黨歷史參考資料》，第三輯，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時期，頁 86-88。
94 曹聚仁遺稿，〈民主同盟的形成及其下場〉，《傳記文學》，頁 77-78。
95 曹聚仁遺稿，〈民主同盟的形成及其下場〉，《傳記文學》，頁 78。
96 如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中，章伯鈞指責昆明分部自擬規程與無視中央指揮。參見，張曉芳，〈中國民主同盟之研究（民國二十八~三十八年）〉，頁 34；編者不詳，《中國黨派》，頁 10-14。
97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年），頁 1067。
98 章詒和，《順長江，水流殘月》（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 181。

毛澤東宣揚的新走向更能打動章伯鈞。由此，可以清楚看到毛澤東之〈新民主主義論〉與〈論聯合政府〉的影響程度。

抗戰勝利後，民盟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並公佈政治報告與宣言，對於政治會議、聯合政府、以及國民大會三個問題，皆提出了主張。[99]這主張，從政府當局看來，民盟是站在共產黨那一方面的。[100]此因民盟與中共皆極力表達召集中國內的民主人士一同召開政治會議，其中實行聯合政府與解除黨治的主張，在民盟的支持下，於國民黨人的眼裡，無異是民盟與中共唱雙簧。

1945 年 5 月 1 日戴笠給蔣中正的情報就已指出，民盟內部在第四屆參政員席次中，青年黨佔有九名，而章伯鈞、張君勱、黃炎培與梁漱溟等人亦入選，惟獨救國會人士無入選，沈鈞儒因此大為不滿，甚至要求中共同意不出席參政會。[101]1945 年 7 月 1 日至 5 日，左舜生與章伯鈞等六位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前往延安訪問，並欲請中共恢復與國民黨的商談，並敦請中共參政員出席以討論國民大會為主要議題的四屆一次參政會。[102]姜平曾提及章伯鈞於此程中，受毛澤東單獨召見，感到中共中央對他是了解和信任的，因而深受鼓舞，此後更加靠攏共產黨。[103]但實際上根據《蔣中正總統檔案》，情報報告民盟開會情況，指出黃炎培在會上曾公開提到毛澤東召見左舜生與章伯鈞密談六個小時，至於密談情形黃炎培說：「會談內容，本人亦不詳悉，可請左舜生報告。」[104]而非姜平所論及只是與章一人談話，因此其言章伯鈞深受鼓舞並更加靠攏共產黨的論斷值得疑異。會末左舜生曾辯駁云：「在延安與毛澤東密談內容，目前尚不能發表，但本人已向最高當局報告……」至於此次會議章伯鈞的情況據言：「雖曾出席，但見會中情勢不佳，逗留不久，即藉故退席。」[105]實際上三人的密談內容據目前所得資料，只

---

[99] 中國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中國民主同盟歷史文獻——1941-1949》，頁 78。

[100] 曹聚仁遺稿，〈民主同盟的形成及其下場〉，《傳記文學》，頁 80。

[101] 〈又據戴笠報稱民主同盟因國民參政會席次問題發生裂痕〉，民國 34 年 5 月 1 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文物圖書，檔號：002060100200001。

[102] 原本王雲五也在其列，然出發前因身體不適未前往，因此實際到者為：褚輔成、黃炎培、左舜生、冷遹、章伯鈞、傅斯年六位。參見，聞黎明，《第三種力量與抗戰時期的中國政治》，頁 339。聞黎明此書誤記為 1944 年 7 月延安之行，實際上為 1945 年，不過對文論沒有造成影響。

[103] 姜平，《章伯鈞與中國農工民主黨》，頁 150、166。然根據《蔣檔》與《周恩來年譜（1898-1949）》都可以得知章伯鈞並非獨自與毛澤東面談，實際上在場者至少仍有周恩來與左舜生。詳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頁 625。此外，據左舜生事後回憶，其感覺毛澤東為一獨裁者。另外，認為其公務員和黨員沒脫離群眾，但也認為毛澤東野心勃勃，而且根本不要民主。參見陳正茂編，《左舜生年譜》（臺北：國史館，1998 年），頁 169-172。值得注意的是，此乃事後追憶，其正確性頗有疑義。

[104] 〈葉鎮宇函蔣中正中國民主同盟聽取黃炎培等報告赴延安與共黨毛澤東晤談及受歡迎情形暨民盟之立場等〉，民國 34 年 7 月 1 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文電，檔號：002080200301070。

[105] 〈葉鎮宇函蔣中正中國民主同盟聽取黃炎培等報告赴延安與共黨毛澤東晤談及受歡迎情形暨

能約略得知左舜生對毛澤東印象不佳。不過可以確定的，在日本投降後隔月，章伯鈞即以第三黨領袖的名義發表時局談話：

> 凡任何形式之內戰及軍事行動，不僅要遭遇國人之堅決反對，且為友邦所不許。……吾人願以下列數事奉告：（一）吾人須明白坦率承認國民黨及蔣主席擔負領導抗戰及領導建國之重任，但同時吾人又必須堅決要求國民黨應立即結束黨治，實現民主，給人民以民主權利，並承認現有一切抗日民主黨派合法地位。……（二）目前解放區之軍隊及政權問題之解決，須著眼於實際情況，覓取妥當而切實的過渡辦法，因此等軍隊與政權，係由當地人民取自敵人，有功抗戰，不能視為化外，予以敵視的態度。……（三）……吾人所希望友邦的協助不在軍火的供給，而在經濟與文化兩方面。（四）日本雖敗，但報復之念甚切。所謂“勾踐滅吳”之故事，日本侵略者知之甚稔，應徹底毀滅其侵略的基礎。[106]

從上引文可看出，章伯鈞除承認蔣介石的領導地位外，在意的就是國、共間的問題，望國民黨採行合適辦法解決中共問題，而不是直接以敵對組織的態度進行軍事上的「處理」。此段言論較所謂的「深受鼓舞，此後更加靠攏共產黨」客觀許多，何況當時的反內戰與和平解決國、共問題乃為中間路線與第三勢力的共識。另外章伯鈞的此次談話中也可發現，第三黨早期極端排斥歐美文化的情形有了改變，這或許與美國在對日作戰上的貢獻有關，且在當時國內視聽上美國以原子彈結束日本戰事也是眾所皆知的道理。

在因應上接收過程中國、共不斷發生衝突，內戰並有越演越烈的可能時，章伯鈞在 1945 年 11 月提到：

> 我們不能認為共產黨是無誠意的，是樂於內戰的。我們可以說，他們現在所力爭的主要問題，除如何實現和平民主建國大方針以外，就是保存解放區的民主政權的事實問題……我們各黨派及人民應重申擁護三民主義擁護國民政府並擁護蔣主席的誠意，但堅決要求國民黨必須遵守政治解決不打內戰的諾言。[107]

時局發展至此，章伯鈞仍是基於第三勢力中的中間路線觀點，宣傳擁護國民政府並要求和平解決中共問題，其中對於中共解放區內的民主政權也視為既存的事

民盟之立場等〉，民國 34 年 7 月 1 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文電，檔號：002080200301070。

[106] 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中國農工民主黨歷史參考資料》，第三輯，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時期，頁 89-91。

[107] 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中國農工民主黨歷史參考資料》，第三輯，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時期，頁 96-98。

實。於此再觀察前文曾討論關於中共對自身民主政權的宣傳，可發現其對社會輿論的確造成影響。

1945 年 12 中旬左舜生與羅隆基就政協席次問題起了爭議，[108] 12 月下旬國民黨與青年黨就簽訂了兩黨合作協議。青年黨便退出民主同盟。1946 年 1 月 10 日政治協商會議召開，對於改組政府、整編軍隊、國民大會、憲法草案、施政綱領五項達成協議。另外，章伯鈞在此次政協會議上，曾提及共同綱領的問題，並認為：「應把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約法做為訂定綱領的根據。」[109]即聯俄、容共與扶助農民的政策。

1946 年 7 月初全面內戰爆發，中間路線似已無希望之時。至 7 月又先後發生了李公樸與聞一多被刺殺兩案，此事件可以說促使逐漸左傾的民主人士，意志更加地堅決。[110]章伯鈞即言：

> 愚蠢的反動者！你們看看秦始皇的屠殺政策，滿清末年捕殺維新的義士，有何補於滅亡的命運？今日民主人士都在為和平民主努力，作合法公開的鬥爭，而反動的屠夫竟處處逼人民造反，逼人民上梁山。[111]

從四一二清黨、七君子事件、到李、聞案，可說是民主人士對國民黨的徹底失望之路。有一點需注意，就算是到政協會議，一般的民主人士仍願意以蔣介石為領導，而開放政權。而李、聞案發生後，就如同曹聚仁所言：「『李聞事件』，決定了我們最後趨向。這個『我們』，可以代表全國公教人員、小資產階級及知識青年的共同趨向，我們都是民盟的群眾。」、「國民政府之失去人心，因素很多。而在野黨（民主同盟）的決意和當局分手，華盛頓當局對於蔣政權的絕望，則自李（公樸）聞（一多）在昆明被暗殺事件始。」[112]然而，一整個國共內戰後期，一般民主人士的支持度與對象，應會隨國共兩方勢力之消長而改變。[113]

---

[108] 民盟有九個名額，左舜生要求其中青年黨要佔五席，參見陳正茂編，《左舜生年譜》，頁 178。

[109] 中國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中國民主同盟歷史文獻——1941-1949》，頁 127。

[110] 關於這點張曉芳也曾論及，在「李聞案」後民盟透露了打算改變策略以爭取更大生存空間的企圖。參見張曉芳，〈中國民主同盟之研究（民國二十八~三十八年）〉，頁 68。此外國民黨當時許多的手法頗令人不解，甚至令後人認為其在自掘墳墓，如上海物價飛騰的時期，平民排隊買米為了基本的糧食問題進而引發爭執與搶米風波，然而卻被視為是受到共產黨煽動。參見，關愚謙，《浪——一個叛國者的人生傳奇》（臺北：寶瓶文化，2003 年），頁 93-94。

[111] 章伯鈞，〈哀悼李公樸聞一多先生〉，李春林主編，《光明日報歷任總編輯文選》（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9 年），頁 63。

[112] 曹聚仁遺稿，〈民主同盟的形成及其下場〉，《傳記文學》，頁 79-80。

[113] 此可見從 1946 年 6 月開始，張東蓀與施復亮分別於《再生》、《文匯報》發表了〈一個中間性的政治路線〉與〈何謂中間派〉討論了中間路線的性質與走向。到 1948 年年初，施復亮清楚瞭解中間路線的不可行。詳見，金冲及，《轉折的年代——中國的 1947 年》（北京：三聯書店，2006 年），頁 432-443。期間轉變，除國民黨歷來政治迫害與施政不當外，與國民政府軍事行動節節失利有很大關係。當然一般知識份子不會清楚表明放棄和平改良的理念，而以

時在上海活動的章伯鈞與第三方面人士，奔走於國共兩黨之間為之傳話，為中國的停止內戰繼續努力。章伯鈞就曾對召開國大發表意見：

> 由最高國防會議所決定召開的國民大會是不能約束各黨派的，這是國民黨一黨獨裁的國民大會，而不是經過政治協商的國民大會。……對於和平的前途，我覺得是還有希望的。因為從國際條件上看，當前的世界政局並不是一個混亂的局面；從國內情形看，當前民主的力量並沒有足以削弱的象徵，有此兩因素，便可說明和平仍有希望。此外政府最高當局憑著實際的經驗，有時能順應潮流，也能使局勢扭轉。[114]

由此可知，章伯鈞認為當時國大的召開不符合民意基礎，然而尚未放棄中間路線的可能，第三勢力的影響力仍存在。為此國、共兩黨也皆極力拉攏第三方面的支持，時在上海進行統一戰線工作的李維漢（1896-1984）曾言：「作為中間勢力的第三方面，是國共雙方都在爭取的對象，因為他們代表著一大批人，誰爭取了他們，誰就擴大了自己的同盟軍。」[115]隨著十月份中旬國軍佔領了南北交通要地張家口，在東北一帶的安東又受攻擊。第三方面人士仍對雙方停戰而努力，如安東被攻佔後，要求中共放低姿態繼續談判，李維漢曾對此事有所描述：

> 二十五日晚間，梁漱溟、黃炎培、羅隆基、章伯鈞來我方住處，談他們分頭與政府各代表談話的情況。黃炎培說，陳誠催促快些談好停戰問題。周恩來即問：安東如何？章伯鈞答，陳誠說安東已於昨天拿到手。聽他一說，我們一致表示憤慨。……黃炎培當時竭力請求我們暫時不要發表聲明，並說這幾天如有什麼行動，彼此先打個招呼，請我們轉告延安加以考慮。我們同意了他的意見。[116]

除了在軍事上調解雙方外，第三方面也困腦於國民黨單方面召開國大而中共拒絕參加。因此甚至向蔣介石寫了建議信，要求延後國大的召開日期，屬名的有章伯鈞、沈鈞儒（1875-1963）、羅隆基與張申府（1893-1986）等人，然據李維漢所說：「事後章伯鈞、沈鈞儒、張申府把信的原稿給我們看，經過我方向其指出這種自投火坑的錯誤作法之後，他們三人才去交通銀行（這是當時第三方面人士的聚會地）把們三人的簽名塗掉了。」[117]此事情也曾在《蔣中正總統檔案》中有所紀錄，據民國 35 年 11 月 11 日云：

民主與反民主兩個極端之間做出一個選擇，來為自身的變化提出一個交待。

[114] 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中國農工民主黨歷史參考資料》，第三輯，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時期，頁 104-105。

[115]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 年），頁 646。

[116]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頁 647-648。

[117]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頁 650。

> ……莫德惠等轉陳第三方面所呈之意見書，請求政府延期召開國民大會。如政府能予接受，則第三方面青年黨、民主社會黨、及民主同盟等即可提出國民大會代表名單云（按民主同盟內之左派份子沈鈞儒、章伯鈞等簽署此一意見書後，乃又接受「共方」指使，塗抹取消，出爾反爾，正小人之常態也）[118]

兩方說法比較之下實為有趣，此時期第三黨人章伯鈞已與中共十分接近，常與中共統戰部有所往來，故先前雖受張君勱影響簽下意見書，卻隨後因李維漢等人的指示又塗掉簽名。而此事件的前後雖無改變任何現實問題，但表明了第三勢力在政治方面的居中協調。然事實上國共雙方皆已無可供協商的餘地，而國大的召開也代表著第三勢力的分裂。

還有一點值得一提，在全面內戰爆發後，章伯鈞在表面上仍為停止內戰奔走之時，私底下卻進行軍隊的策反工作，其中就曾與馮玉祥、李濟深、陳銘樞等共同對第五路軍軍長吳化文進行策反，只不過後來結果不得而知。[119]由此回頭審視當年西安事變後，章伯鈞雖然驟然停止了反蔣活動，並在日後政壇上遊走於國、共之間，也進入了走中間路線的第三勢力中，奔走於反對內戰、開放民主與言論自由之道，然而私底下不僅仍與反蔣人士往來且不斷嘗試組織軍事武力，如此充分說明了章伯鈞的兩面性格。但這兩面性不僅表現在對於蔣介石身上而已，對中共也一樣如此，論其原因章詒和自身就說了：

> 父親有着很突出的兩面性，江湖作風和政客色彩。這與他長期搞第三黨，在夾縫中求生、在夾擊中求存的政治生涯，有着直接的關係。在統戰部那裏，他的話都是跟進、擁護中共的。回到民盟和農工，他就站到了中共的對面。[120]

由此來看，章伯鈞對於國、共之間都有一種兩面性的態度，因章伯鈞、鄧演達第三黨之間有獨特的反蔣背景，故難於與第三勢力中的文人學者、商人資本家可以等同視之；章伯鈞一方面藉由第三勢力的情勢力求第三黨於民主政治中夾縫求存，但另一方面來看章伯鈞，從鄧演達時期的第三黨一樣反蔣、反共，只不過其發展成檯面下的角力了。第一章曾提到第三黨（或云第三勢力的發軔）比抗戰時期更多了對於蔣介石與中共的敵對意識，且其轉變是經歷眾多事件的影響與醞釀；到此輪廓更為顯明，這種敵對意識可以說潛伏於反內戰與民主政治的訴求之

---

[118]〈蔣中正主持中樞紀念週，國民政府委員陳其采、主計長徐堪等於週會中宣誓就職〉，民國 35 年 11 月 11 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文物圖書，檔號：002060100218011。

[119] 章詒和編，《章伯鈞年譜（1946-1949）》（未刊稿），頁 8。

[120] 章詒和，《順長江，水流殘月》，頁 12。

下。

第三節　章伯鈞走入共和國

1946 年 11 月 15 日國大召開，民盟成員拒絕參加國大，根據章伯鈞在《光明報》社論〈我們為什麼不參加國大〉所言：

> 民主書刊不斷被封閉，民主人士不斷受威脅，這怎麼像是要還政於民的措施呢！儘管下停戰令，可是軍事準備還在著著進行，各地戰事愈演愈烈，試問在這樣緊張的空氣之下如何去進行討論國是……我們今天絕不能參加這次的國大，這不僅是因為我們不能違反政協決議，而且因為我們如果參加國大，這無異為獨裁者捧場。[121]

如此表明了不參加國大之因素。[122]民盟成員參加國大與否，都無法阻止戰爭的進行。之所以不參加國民大會，與國民黨的政治迫害和言論自由的受挫與侷限關係甚大。

1946 年 11 月紀念鄧演達逝世十五週年，章伯鈞發表〈鄧演達的道路和我們當前的任務〉與〈紀念鄧演達先生〉等文。呼籲一切孫中山的忠實戰友和信徒，應該在鄧演達的旗幟下集合起來，遵循鄧演達的道路，重建農工平民聯合陣線，堅持和平民主，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反對國民黨一黨包辦的「國大」，反對內戰、獨裁、賣國政府，反對美帝國主義，堅持政協決議，爭取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為實現由農工平民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而繼續奮鬥。[123]

1947 年 2 月 3 日在上海召開第四次全國幹部會議，會議上通過了章伯鈞的〈黨務報告〉[124]，決定將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改名為中國農工民主黨（以下簡稱

---

[121] 《光明報》（香港），新 7 號，中華民國 35 年 11 月 18 日，頁 1。

[122] 另外值得一提的，青年黨參加國大之始末，李璜曾說：「共產黨既以我們參加制憲為罪大惡極，則國民黨如打不贏共產黨而失敗，我們即使不參加政府，也是一樣的罪在不赦，與國民黨同歸於盡。何況國民黨這回要求與青民兩黨平等合作，三黨共同決定施政方針，一半固為共產黨所逼成……。」李璜，《學鈍室回憶錄》，下卷（香港：明報月刊，1982 年），頁 635-636。轉引自，陳正茂編，《左舜生年譜》，頁 195。由此可以看出，戰後政局之複雜，不只有張曉芳在〈中國民主同盟之研究（民國二十八~三十八年）〉之國民黨將民盟逼向共產黨的論點，實際上左右兩派都在國共衝突與勢力夾擊下，將雙方逼到對立的一面。另外，制憲國民大會揭幕後，左舜生以青年黨中央宣傳部長身份發表談話中可見，青年黨人的實際目標是追求民主憲政，「…吾人則認停戰既已實行，惟有一致參加國大，和平始有繼續維持之希望，有人認為參加國大足以招致分裂，吾人則認為分裂本為數年來已成之事實，惟有一致參加國大，始有促進全國統一之可能…」詳見陳正茂編，《左舜生年譜》，頁 197。

[123] 彥奇、王幼樵編，《中國農工民主黨歷史研究：民主革命時期》，頁 87。

[124] 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中國農工民主黨歷史參考資料》，第四輯，中國農工民主黨時期（出版地不詳：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出版年不詳），頁 1-12。

「農工黨」)。會議並發表宣言，追求民主政治並反對內戰。[125]且通過了〈中國農工民主黨黨章〉，明文規定本黨代表農工平民利益、本黨任務為徹底完成民族解放，實現民主政治，達成社會主義。[126]至此，章伯鈞與農工黨幾乎與國民黨挑明了態度。尤其是 1947 年 5 月 26 日章伯鈞在歷經「五二〇事件」[127]後的中央大學之演講中，代表民盟發言：

> 民盟站在為老百姓的利益，不管中共實行共產主義，或是國民黨實行真正的三民主義，只要能夠使人人有飯吃，有衣穿，則民盟可以做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尾巴。[128]

此話說得很明白透徹了。只要能停止內戰，政府進行民主政治與改善人民生活狀況，就是可以合作協商的對象。然也透露出民盟人士已放棄了堅持中間路線的立場。從另個角度看章伯鈞，這已不是從前夾縫中求生的態勢，因為連表面上與國民黨基於民主政治的基礎共存也將消失殆盡。

1947 年 10 月民盟被宣佈為非法組織，於是與農工黨一同轉入地下，並遷移至香港。這是一次轉折點，民盟正式被宣佈為非法組織，且民盟公開表明應推翻蔣介石政權。[129] 1948 年 1 月在香港重新組織民盟。並召開民盟一屆三中全會，通過了其宣言與政治報告。此外根據沙千里的回憶，民盟被迫解散後曾經有過兩相爭論，其兩派為「一派人如周鯨文、曾昭掄、劉王立明等主張按照黃炎培在上海作的那樣，解散民盟；另一派如沈老、章伯鈞、鄧初民還有我（代史良）等反對，兩派人旗鼓相當，後來反對的多來了一個人（名字已記不起來），占了優勢，才通過三中全會的決議案，否定了解散民盟。」[130]因此可知，在中間路線已經完全無路可走時，曾經對民盟的續存與否發生過討論，然而據事後三中全會的報告

此黨務報告重申第三黨發展歷史、檢討黨員發展、整頓組織重新登記黨員、以及加強群眾宣傳為主。

[125] 在 1983 年出版的《中國農工民主黨章程》對此宣言是註明為：「譴責國民黨反動派在美帝國主義的扶植下瘋狂發動內戰。」但實際宣言裡頭未有如此記載。此實為研究者須當心注意。參見，中央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寫，《中國農工民主黨章程》，頁 35；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中國農工民主黨歷史參考資料》，第四輯，中國農工民主黨時期，頁 13-15。

[126] 姜平，《章伯鈞與中國農工民主黨》，頁 170。

[127] 1947 年 5 月 20 日，京滬蘇杭區專科以上十六校學生在南京舉行聯合大遊行，過程中與軍警發生衝突，造成流血事件，稱之為南京「五二〇事件」，是整個五月學潮的最高潮。參見廖風德，《學潮與戰後中國政治（1945——1949）》（臺北：東大圖書，1994 年），頁 283。「五二〇事件」可說是由中央大學學生發起「吃光運動」開始的。不過，據金沖及所言：「中央大學在當時學生多，黨員也多，進步力量強……國民黨、三青團在中大的人數雖不少，但孤立得很，起不了多少作用。」詳見，金沖及，《轉折的年代——中國的 1947 年》，頁 192。因此由中央大學學生發起，有其客觀條件存在。

[128] 《光明報》（香港），新 12 號，中華民國 36 年 6 月 19 日，頁 x。

[129] 金沖及，《轉折的年代——中國的 1947 年》，頁 430。

[130] 周天度、孫彩霞編，《救國會史料集》（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 年），頁 1098。

中可知：「……則在於以協商妥協方式，不能求得民主和平，而必須採取人民的革命鬥爭，以積極爭取民主和平。……」、「……對於民主與反民主之爭，我們就決不能有所謂中立的態度……」[131]，因此章伯鈞等人對於重組民盟的考量可謂為，結合中共與各方力量在各各層面上支持中共的解放戰爭。後來就相應於國共內戰局勢之變化，於 1948 年 5 月通電贊同中共發報召開新政協的口號。[132]1949 年 9 月，民盟主要人士應邀出席於北京的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

章詒和雖認為其父章伯鈞，堅持中間路線的主張並為制止內戰而奔走，且一直從事軍事活動欲使中間路線可行並可與國、共三分天下。[133]無奈的是，中國局勢已趨明朗，國民黨既沒有提供合法的生存空間，且又逐步失去對大陸的控制，第三勢力根本沒有空間活動。章伯鈞不論想搞民主政治的中間路線，亦或搞軍事上的三分天下都沒有這個條件了。章詒和認為其父為制止內戰而努力，筆者認為有個延伸之意，即制止內戰的目的性很明確，國、共並存下第三勢力才有活動空間。而民盟被迫解散後合法地位無法繼續，章伯鈞與第三黨似乎又時光倒退回到了西安事變前的反蔣態勢，只不過在局勢大定之前，章伯鈞欲藉由軍事實力與美國對國民黨的援助維持住第三黨的生存地盤。有趣的是，其附帶條件導致章伯鈞不能再高喊反對內戰了。

隨著戰事急轉直下，章伯鈞在同年 11 月就面臨歷史檢討的壓力，事在農工黨第五次全國幹部會議時，周恩來親自催促和壓力下，章伯鈞同意批判中間路線，並承認第三黨的歷史是「七分反蔣，三分反共」的，[134]章伯鈞即以此種歷史檢討進入共和國。

在全面內戰剛開始時，知識份子對中間路線的討論，提供了一個可參考的對象。剛開始時在國、共兩大勢力中間，需有一個強大穩定的力量且實行改革路線，此路線即為中間路線。而到情勢明朗化以前，這套作法行得通。然而隨著國民黨軍事行動的節節失利，即使仍抱持走和平中間色彩的民主人士，也能清楚的瞭解，當國、共雙方力量明顯失衡後，和平改良的道路已行不通，也沒有這個客觀環境存在了。[135]對於章伯鈞而言，當然通曉這道理，何況民主人士受國民黨的迫害已是行之有年。在情感上與現實層面皆已無合作的可能了。

---

[131] 中國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中國民主同盟歷史文獻——1941-1949》，頁 379、395。
[132] 《光明報》（香港），新 1 卷第 8 期，中華民國 37 年 6 月 16 日，頁 2。
[133] 章詒和，《順長江，水流殘月》，頁 75-76。
[134] 章詒和編，《章伯鈞年譜（1946-1949）》，頁 32；章詒和，《順長江，水流殘月》，頁 77。
[135] 陳儀深也提到了：「這一群知識份子在國共兩大勢力的拉扯之下，不得不分向左右兩邊靠攏，終究讓『槍桿子』決定一切。」詳見，陳儀深，〈國共鬥爭下的自由主義（1941-194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23（1994 年 6 月），頁 256。

毛澤東於 1939 年 10 月在《共產黨人》的發刊詞上曾經說過：「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法寶。」、「統一戰線和武裝鬥爭，是戰勝敵人的兩個基本武器。統一戰線，是實行武裝鬥爭的統一戰線。」[136]此三項法寶已為研究者熟知，然而「統一戰線，是實行武裝鬥爭的統一戰線」卻受人忽略。[137]武裝鬥爭與統一戰線自始分不開，不僅是因中共軍事力量帶給國民黨的壓力反應到了民眾的社會經濟狀況，因而促使國統區內學潮、罷工與抗議行動不斷，給予了中共實行統一戰線的機會。換個角度看，統一戰線的人士被盡力地放寬標準，不論是自願接近中共與否，只要能站到中共這方，都是歡迎的對象。如同章伯鈞一樣，其脫離中共並從事另一方的政治團體，也嘗試建立政權與地方武裝力量。然在抗戰結束兩強環繞底下，第三勢力被迫組織起來，從檯面上發聲。對他們來說，反內戰與和平解決國共爭端，不僅是出自社會民眾的求和心理，也是他們唯一能在政治上發揮一點影響力的機會，因為一旦戰事走向激烈，甚至勝負底定之時，他們將再沒有獨立自處的空間了。

最後，以周恩來於 1945 年七大上的發言，〈論統一戰線〉總結自第一次大革命以來，有關於統一戰線的歷史問題和經驗作為本章的結語：

> 內戰時期，小資產階級甚至小資產階級的上層分子是我們的朋友，特別在“九一八”以後，就是中產階級都可以作朋友……比如現在的大後方，反對蔣介石法西斯獨裁專制的，有許多地方實力派，在這一點上當然可以跟他們聯合。但是一定要懂得他們本身還是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138]

周恩來此番言論，與毛澤東的「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有異曲同工之妙。當主要敵人遭擊潰，原先的次要敵人，也就成為了攻擊的對象。

[136] 毛澤東，〈《共產黨人》發刊詞〉，《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頁 606、613。

[137] 筆者發現已有的研究論著，甚至直接跳過這段話。如在《中國民主黨派史（新民主主義時期）》一書中，引用這段時，直接捨棄了「統一戰線，是實行武裝鬥爭的統一戰線」這句。詳見，張軍民，《中國民主黨派史（新民主主義時期）》，頁 4-5。

[138] 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論統一戰線〉，《周恩來選集》，上卷，頁 209-210。

第三章　中共建政初期的黨外安排

章伯鈞以民主人士的身份進入共和國後，無非是其政治生涯上的一項轉折，也開啟了另一段旅程。中共對黨外份子以及知識份子以一種包下來的態度，給予政治舞台與經濟上得援助，然而為何在反右運動前夕會冒出如此眾多對中共激烈的批評聲浪？勢必在章伯鈞陷入反右運動前，應對中共對於黨外人士的政治安排有一定瞭解與討論。

關於中共治下的非黨人士是否有職有權的問題，歷來受到不少研究者的關注，其中大多認為中共對於民主黨派，甚至包含無任何黨派背景的知識份子，是採取一種「包下來」的方式，並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以下簡稱〈共同綱領〉）限制了這些知識份子的言行，[1]民主黨派成了政治花瓶的民主擺設。相較之下，大陸地區的研究論述則有很大的不同，一般認為〈共同綱領〉促成了民主的聯合政府，參與了各級政權，而且有職有權，中國實行了名符其實的多黨合作制度。[2]此間差異與實際問題根源，為本章探討的方向所在。

對於統戰工作議題討論的另一個面向，歷來多與反右運動相結合。在毛澤東號召黨內開門整風與黨外大鳴大放下，鼓勵黨外人士批評中共的官僚主義，因而出現許多極為激烈的言論。其中九三學社[3]宣傳部副部長並時任《光明日報》總編輯的儲安平（1909-1966？），在中央統戰部座談會上聲稱：「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4]直指中共的黨組織控制一切，並認為黨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5]因此可知，中共的統一戰線以及使民主黨派有職有權的政策是失敗的。然本章並非探討反右運動的開啟究竟是「陰謀」抑或「陽謀」的人為因素，[6]而是以檢視 1957 年以前中共的統戰工作為焦點，提

---

[1]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臺北：聯經，2001 年），頁 504-505。

[2] 鄧麗霞，〈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共對民主黨派政策演變論析〉，武漢：華中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思想政治教育碩士論文，2002 年 3 月，頁 3-4。民革中央《中國的參政黨》編寫組編，《中國的參政黨》（北京：團結出版社，2006 年），頁 29-30。關於這方面的研究論述繁多，不一一條列。

[3] 中國民主黨派之一，前身為「民主科學座談會」。成員以科學技術知識份子為主，1945 年將「民主科學社」正式定名為「九三學社」，以慶祝中國對日戰爭勝利。

[4] 中共瀋陽醫學院黨委整風辦公室編，《章伯鈞張百生等人言論集》（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57 年），頁 31。

[5] 中共瀋陽醫學院黨委整風辦公室編，《章伯鈞張百生等人言論集》，頁 31。

[6] 歷來反右運動史研究的起點約可分為四種類型，第一：多從 1956 年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談起，並接續到中共的八大與開門整風，如朱正，《兩家爭鳴——反右派鬥爭》（臺北：允晨文化，2001 年），頁 11；第二：以毛澤東欲奪回黨內發言權與主控權為焦點，反擊了周恩來所提的「急躁冒進」，如李福鐘，〈關於「反右」起因的若干疑點與商榷——1956 至 1958 年中共政局再思考〉，《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期 27（2007 年 5 月），頁 44；第三：從 1956、1957 年中國農村、工廠與學校的實際情況下手，顯現反右運動以前地方上的不平靜，見錢理

供反右起因的另一個面向，也啟發出為何章伯鈞會陷入 1957 年風暴中的另一項因素。因此本章將探討人民政府成立後，中共如何在統一戰線的架構下，對黨外份子的工作與職權安排為焦點，並藉以分析制度與人為意向上的矛盾。

第一節 〈共同綱領〉的精神與應用

對於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所制定出來的〈共同綱領〉，其與毛澤東所提出的「新民主主義論」有著密切的關聯。在〈共同綱領〉序言中明言：「……**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基礎……**」[7]，因此〈共同綱領〉的主要精神可說是從「新民主主義論」而來。並在中共中央委派周恩來主持起草〈共同綱領〉的實際過程中，毛澤東曾多次對〈共同綱領〉草案進行修改與反覆審視。[8]因此對於〈共同綱領〉的精神走向，毛澤東無疑是主導者。故本節將從探討毛澤東所提出的「新民主主義論」到 1949 年 6 月的〈論人民民主專政〉的演變過程，檢視〈共同綱領〉的發端，以及應用在建國初年對黨外人士的實際安排上。

一、〈共同綱領〉的由來

所謂〈共同綱領〉的最初來源，是毛澤東於 1940 年 1 月在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演講上出現，此演講即為後來的〈新民主主義論〉[9]。此文從文化層面著手，分析了中國的歷史特點，其中歸結出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是共產黨欲革除的對象，並建立新的中華民族文化。毛澤東明言了中國的歷史進程，必須分為兩個步驟：第一步是民主主義的革命，第二步是社會主義的革命，是兩種不同性質的革命過程。[10]此處的民主主義可說是新民主主義，由此衍伸出的政治、經濟與文化領域，都是屬於新民主主義的範疇。

群，《拒絕遺忘："1957 年學"研究筆記》（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 19-55；第四：毛澤東欲鞏固從馬克思、列寧以來一脈相承的革命正統，並樹立意識形態的權威地位，如齊茂吉，《毛澤東和彭德懷、林彪的合作與衝突（1954-1971）》（臺北：新新聞文化，1997 年），頁 2-10。

[7]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五星紅旗從這裡升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誕生記事暨資料選編》（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4 年），頁 47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年），頁 1-2。

[8] 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起草過程中的批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 年），頁 1-3。

[9]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頁 662-711。

[10]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二卷，頁 665。

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的重要論點，即為兩階段的革命理論，並且成為後來〈共同綱領〉中暫時不寫入何時進入社會主義的日程之由來：

> 這個中國革命的第一階段（其中又分為許多小階段），其社會性質是新式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還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革命，……建立以中國無產階級為首領的中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的社會，以完成其第一階段。然後，再使之發展到第二階段，以建立中國社會主義的社會。[11]

而在毛澤東所謂的第一階段革命時期，中國的各個階級（包含了無產階級、農民、知識份子和其他的小資產階級）是決定國家未來的基本力量。甚至是要為中華民主共和國的國家構成和政權構成的基本部份，而其中無產階級則是領導的力量。[12]毛澤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論」是個思想理論上的開端，在大的架構與前提下，闡述了中國不能立即進入社會主義時代，需要一個新民主主義的過渡時期，這也可說是列寧主義中的工農民主專政時期。

關於這個過渡時期，毛澤東在同年 2 月的延安各界憲政促進會成立大會上再次申明。在此演講上，毛澤東說明了新民主主義的憲政不是舊的、過時的、歐美式的、資產階級專政的民主政治；也還不是蘇聯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民主政治。[13]至於什麼是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在當時刻即為對於漢奸反對派的專政，也屬於一種抗日統一戰線的憲政。[14]關於這點，在日後中共建國後演變成為對於大資本家、大地主與富農的專政。

在實際宣傳面具有相當影響力的，就是毛澤東在 1945 年 4 月的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15]。當時的民主人士章伯鈞也受到了影響。[16]至於其實際內容在一般綱領上，是要建立聯合一切民主階級的統一戰線的政治制度。且政權組織應採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決定大政方針，選舉政府。[17]在具體的綱領上，毛澤東呼籲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一個由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和無黨無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聯合組成的臨時的中

---

[11]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二卷，頁 671-672。
[12]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二卷，頁 674-675。
[13]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二卷，頁 732。
[14]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二卷，頁 733。
[15]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年），頁 1029-1100。
[16] 即第二章曾提及的：毛澤東及時放出來“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和高揚“聯合政府”的旗幟，它們終於打動了這些民主人士。務虛的羅隆基、務實的章伯鈞都相信了。儘管他們都不信共產主義和馬列主義，但都覺得中國歷史進程的確需要“民主主義”，中國社會的確需要“聯合政府”。參見，章詒和，《順長江，水流殘月》（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 181。
[17]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三卷，頁 1056-1057。

央政府，並發佈一個民主的施政綱領。[18]並期望在將來，經過自由的選舉，召開國民大會，成立正式的聯合政府。

在對日戰爭勝利後，伴隨國共內戰情勢的急轉直下。中共中央在 1947 年 12 月於陝北楊家溝召集會議，討論了當時的情勢與接下來的任務。其中對革命對象毛澤東有進一步的闡釋，其言曰：「新民主主義革命所要消滅的對象，只是封建主義和壟斷資本主義，只是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而不是一般地消滅資本主義，不是消滅上層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19]此處在階級問題上，已將知識份子與民族資產階級排除在革命對象範圍內，成為將來新政權建立後的統一戰線的框架。並在 1948 年 9 月中共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明確指出要以無產階級為領導，並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加上了資產階級民主分子參加的人民民主專政作為新政權的階級性。[20]而在 1949 年 1 月底 2 月初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Artiom Ivanovich Mikoyan, 1905-1970）來華時，毛澤東也解釋了為何採取這種政權形式。即因中國的經濟條件、政治條件、革命條件與群眾條件等因素，故必須行使這種最有利於與民主人士合作的政權模式。[21]

在中共建政前夕，1949 年 6 月於紀念中國共產黨二十八週年上，毛澤東發表了著名的〈論人民民主專政〉[22]。薄一波（1908-2007）認為毛澤東的這些思想，為〈共同綱領〉奠定了理論和政策基礎。[23]〈論人民民主專政〉可說是承接 1948 年 9 月政治局會議而來，即人民民主專政的基礎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聯盟。至於民族資產階級在革命的第一階段裡頭，仍占有很大的重要性，但卻不能充當革命的領導者且不應當在國家政權中占主要地位。毛澤東認為其因素是民族資產階級的社會經濟地位規定了他們的軟弱性，並缺乏遠見和足夠的勇氣。[24]

藉由上述探討，可以得知〈共同綱領〉的原則與精神，主要是由毛澤東一手

---

[18]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三卷，頁 1067。

[19]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年），頁 1254。

[20]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 年），頁 20。

[21]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 21。據薄一波進一步闡釋與理解為，當時中國經濟落後，因而在政治上需要團結民族資產階級；在政治條件上，國民黨失去威信，共產黨取得領導權；議會制度在中國喪失威信，從袁世凱、曹錕直到蔣介石的國大均失敗；而與民主人士聯合，可保障我黨領導權，又能聯合一切的民主力量。

[22]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頁 1468-1482。

[23]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 21。

[24]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頁 1479。人民民主專政對於中共來說就是工農民主專政，但如果對外是以工農民主專政進行宣傳，會引起民主人士的不安，對統一戰線工作會有不利的影響，因此中共刻意要求不必去宣傳人民民主專政就是工農民主專政，也不要在報紙刊物上發表或討論。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就是工農民主專政”給三野政治部的指示〉，《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一冊，頁 105-106。

主導，並且其經過最早可上溯至 1940 年的〈新民主主義論〉到 1949 年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之演變過程。促成了〈共同綱領〉背後的指導思想。

二、〈共同綱領〉精神的具體應用

在〈共同綱領〉的表現上則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與人民政府組織構成原則的展現。在〈共同綱領〉第二章政權機關上規定：「國家最高政權機關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中央人民政府為行使國家政權的最高機關。」、「在普選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前，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全體會議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25]，因此藉由觀察黨外份子在政治協商會議、人民政府上的職務安排，來檢視中共對非黨人士的實際利用與統戰工作。

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階段，中共就廣邀非黨人士與民間團體的代表性人物參加。[26]籌備會議的組織原則在組織條例中寫明：「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即由新政治協商會議原提議人中國共產黨與贊成中共一九四八年“五一”口號等五項之下列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及無黨派民主人士等二十三個單位組成之……」[27]，其中人選為各本單位提出。在最後出爐的名單中，23 個單位，共 134 人。不將民主黨派中的跨黨份子與極左份子算入的話，中國共產黨代表者共 7 人，[28]不到總人數的 6%，若將人民解放軍 7 個代表也算入，共 14 人。[29]在職務安排上來看，21 個常務委員中，非共黨人士就佔有 17 位。其中李濟深、沈鈞儒、郭沫若（1892-1978）、陳叔通（1876-1966）等 4 人位為常務委員會副主任。[30]不過，在

---

[2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一冊，頁 4；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中央人民政府法令彙編（1949-1950）》（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 年），頁 18。

[26] 關於無黨派的民主人士應被視為統一戰線工作的範疇內，周恩來曾作解釋：「……他們在形式上沒有結成黨派，但實質上是有黨派性的。……他們雖然都沒有組織一個政黨或者政治團體，但卻領導著很大一批民主人士，聯繫著許多方面的人士在奮鬥著。……」，詳見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政黨制度研究中心、九三學社廣西區委會、廣西社會主義學院編，《多黨合作重要文獻選輯——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論多黨合作》（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2007 年），頁 101。

[27]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五星紅旗從這裡升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誕生記事暨資料選編》，頁 265。

[28]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五星紅旗從這裡升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誕生記事暨資料選編》，頁 277。中共代表分別為毛澤東、周恩來、林伯渠、董必武、陳雲、薄一波、李維漢。解放軍代表為朱德、彭德懷、林彪、劉伯承、陳毅、聶榮臻、葉劍英。

[29] 若將跨黨份子中具有共黨背景者算入，中共黨員可達 43 人之多。其中進步人士中，還隱藏著 15 名秘密黨員。據此保障中共對籌備會的領導。參見，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頁 504。

[30]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五星紅旗從這裡升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誕生記事暨資料選編》，頁 278。

籌備會議的同時，中共中央沒忘了要緊抓住權力，當時周恩來就曾提到：

> 為保證我黨在新政協籌備工作中政策上與工作上的一致，經中央書記處決定，組織新政協籌備會黨組幹事會及常委會統一領導。以後凡關於政治性及政策性的問題，必須事先向所屬黨組提出，經過黨組討論或經黨組負責同志同意後始得向黨外提出；對於黨組的一切決定，應堅決執行；同時在工作中發現的各種問題，也應及時向所屬黨組報告。[31]

在正式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中，正式代表五百一十人，中國共產黨和解放軍共佔名額七十六名。[32]在此第一屆全體會議下通過了〈共同綱領〉，而前文已探討過〈共同綱領〉精神的由來，且在起草過程中毛澤東進行多次的修改審視。對於非黨人士而言，在討論〈共同綱領〉過程中，具有多少影響力，目前仍不得而知。[33]然在政治協商會議的成員比例中，中共展現了誠意，並在接下來的人民政府組成上再次體現。[34]不過應注意的是，不僅是在會議組織裡中共藉由跨黨與進步份子再加上黨組而握有組織中的主導權，且在政府機關中，亦憑藉黨組掌握政策的領導權。

在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六人中，黨外人士三人。委員五十六人中，黨外人士共二十七人。十五名政務委員中，黨外人士九人。[35]而其實際擔任職務見表 1：

---

3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關於成立新政協籌備會黨組幹事會及常委會的通知〉，《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 年），頁 111。

32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五星紅旗從這裡升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誕生記事暨資料選編》，頁 535-538。

33 李維漢曾論及：「會議進行要採用充分的協商方法，使代表們有充分發言的權利，能夠毫無顧慮地提出任何意見和批評。」，詳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新形勢與新任務〉，《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一冊，頁 156；中共中央統戰部研究室編，《歷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概況和文獻》（北京：檔案出版社，1988 年），頁 17。

34 如周恩來為請黃炎培出任政務院副總理及輕工業部部長，曾兩次登門勸說。詳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年），頁 4-5。

35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 23；張憶軍，《風雨同舟七十年——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關係史》（上海：學林出版社，2001 年），頁 397。

表 1： 人民政府非共黨人士一覽表

部門名稱	職務	姓名
中央人民政府	副主席	宋慶齡、張瀾（民盟）、李濟深（民革）
中央人民政府	委員	何香凝（民革）、陳嘉庚、馬寅初、馬敘倫（民進）、郭沫若、高崇民（民盟）、沈鈞儒（民盟）、沈雁冰、陳叔通（工商聯）、司徒美堂（致公黨）、李錫九（民革）、黃炎培（民建）、蔡廷鍇（民革）、彭澤民（農工黨）、張治中（民革）、傅作義、李燭塵（民建）、李章達（民革）、章伯鈞（農工黨）、程潛（民革）、張奚若、陳銘樞（民革）、譚平山（民革）、張難先、柳亞子（民革）、張東蓀（民盟）、龍雲（民革）
辦公廳	副主任	余心清（民革）、羅叔章（民建）、周新民
政務院	副總理	郭沫若、黃炎培（民建）
	政務委員	譚平山（民革）、章伯鈞（農工黨）、馬敘倫（民進）、陳劭先（民革）、王昆侖（民革）、羅隆基（民盟）、章乃器（民進）、劭力子（民革）、黃紹竑（民革）
	副秘書長	許廣平（民革）、郭春濤（民革）、孫起孟（民建）、辛志超、屈武（民革）
政治法律委員會	副主任	張奚若、彭澤民（農工黨）
財經經濟委員會	副主任	馬寅初
文化教育委員會	主任、 副主任	郭沫若 馬敘倫（民進）、沈雁冰
編制審查委員會	主任、 副主任	章乃器（民建） 屈武（民革）、孫起孟
人民監察委員會	主任、 副主任	譚平山（民革） 潘震亞
內務部、財政部、貿易部	副部長	陳其瑗（民革）、王紹□（民進）、沙千里（民建）
地質部	部長	李四光

燃料工業部	副部長	李苑一
紡織工業部	部長、副部長	蔣光鼐（民革）、陳維稷（民建）
鐵道部	副部長	石志仁
郵電部	部長	朱學范（民革）
交通部	部長、副部長	章伯鈞（農工黨）、季方（農工黨）
輕工業部	部長、副部長	黃炎培（民建）、楊衛玉（民建）、王新元
農業部	部長、副部長	李書城、吳覺農、楊顯東
林墾部	部長、副部長	梁希（九三學社）、李相符
水利部	部長、副部長	傅作義、張含英
勞動部	副部長	施复亮（民建）
文化部	部長、副部長	沈雁冰、丁西林
教育部	部長、副部長	馬敘倫（民進）、韋慤、曾昭掄
衛生部	部長	李德全（民革）
司法部	部長	史良（民盟）
人事部	副部長	孫起孟（民建）
法制委員會	副主任	許德珩（九三學社）
體育運動委員會	副主任	蔡廷鍇（民革）
華僑事務委員會	主任、副主任	何香凝（民革）、李任仁（民革）、李鐵民（民盟）、庄希泉（民盟）
掃除文盲工作委員會	主任	楚圖南（民盟）
海關總署	副署長	丁貴堂
新聞總署	副署長	薩空了（民盟）
出版總署	署長、副署長	胡愈之（民盟）、葉聖陶（民進）、周建人（民進）

中國人民銀行	行長	南漢宸（民建）
政務院參事室	主任、副主任	郭春濤（民革）、屈武（民革）
政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	局長、副局長	余心清（民革）、辛志超
中國科學院	院長、副院長	郭沫若、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楨、吳有訓
革命軍事委員會	副主席	程潛（民革）
	委員	薩鎮冰、張治中（民革）、傅作義、蔡廷鍇（民革）、龍雲（民革）、劉斐（民革）
最高人民法院	院長、副院長	沈鈞儒（民盟）、張志讓
最高人民檢察署	副檢察長	藍公武

資料來源：李震雷，〈建國初期民主黨派在新中國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昆明：雲南大學科學社會主義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碩士論文，2007 年 5 月，頁 24-26；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 23-24；張憶軍，《風雨同舟七十年——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關係史》，頁 397-39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一冊，頁 20-21。等整理而成。

資料說明：此表為中共建國初年非黨人士於政府各職位的的情況，並由毛澤東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名義於 1949 年 10 月 1 日公告發出。可以注意的是中上階層的非黨人士，包含民盟、民革、民進、致公黨、農工黨在內，除了握有各部門的職務外，還被囊括到人民政府副主席及委員與政務院政務委員的名單之中，具有多重身份。

從表 1 可以得知黨外人士遍佈中央人民政府的各組織當中，對於職務安排，中共中央可說是盡力地籌劃。毛澤東為此曾幾次在華北局幹部會議上說過：「安排民主人士好處很多：第一，可以“賺”人，……第二，可以“賺”來四萬萬人民，賺來土地改革。第三，可以“賺”一個社會主義。這叫做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36]，為此已依照新民主主義與〈共同綱領〉的精神，將許多民主黨派以及各階級

[36]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 24。

人士納入了統一戰線工作的旗幟底下，並在中共建政之初大體完成了黨外人士職務安排的布局。並且依靠這些黨外人士背後所聯繫的廣大知識份子與工商業者，對經濟穩定與政權重建有一定的助益和功用。[37]然不可諱言的，表 1 裡的許多非共黨人士，有些與中共有著十分親密的關係，是為在中共眼中的左派進步份子。對於中共而言，人民政府中的非黨進步份子，是有助於中共領導權鞏固的「暗樁」。同時，對於其他非黨人士來說，代表著統一戰線的對象，確實包含著左、中、右三個方面，如此一來能降低統戰只是為了「拉攏」黨外份子（中間與右派）的意義程度，也更能顯現出「聯合政府」的味道。無論如何，這些進步人士或以民主黨派身份活動的跨黨份子被安插在人民政府當中，對中共或是黨外人士都有特殊意義，且在重要的政務院中，24 位部長有 11 名是非黨人士，[38]足以顯現中共對非黨人士的「誠意」了。不過在中央政府底下，分有政務院、最高人民法院、以及最高人民檢察署，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即由非黨人士沈鈞儒擔任，然而中共雖對外沒有明言，但是內部人士對其態度有別，當時的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以下簡稱「和大」）作為中介國家首長與外賓的接見事宜，對於不同的國家首長有不同接待待遇，其中對於最高人民法院與最高人民檢察署的首長就比國務院總理低一級別。[39]

值得注意的是，在民主集中制以及中共握有主控權的情況下，政治協商會議的集體討論方式與「半民意」質詢機構性質，有職無權的問題不易顯見。頂多存在著「個別地方政府對協商委員會以命令行事」、「協商委員會性質既是政治協商，而政治協商則可有各種方式，協商委員會即成為可有可無、無足輕重的機構」[40]。且在〈共同綱領〉中已將政協機構定義為施政建議的諮詢對象。[41]因此在職務運用上，本非處於主動權的地位。而在推選人民政府成員這項職能上，雖然中共握有政治協商會議與日後的人民代表大會中的領導權，但是就上文的探討中可得知在職務安排上，仍安插了許多非黨人士，不至於偏離〈共同綱領〉的精神太遠。

---

[37] 日後人民代表大會舉行後，許多黨外人士被移至人民代表大會，被批評喪失聯合政府的模式。參見，中共瀋陽醫學院黨委整風辦公室編，《章伯鈞張百生等人言論集》，頁 32。然而這不影響本文的論述結構，因為不論在政府機關或政協機構，甚至是人民代表大會當中，都存在相同的問題。關門主義與有職無權是普遍存在的現象。

[38]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頁 504。

[39] 關愚謙，《浪——一個叛國者的人生傳奇》（臺北：寶瓶文化，2003 年），頁 316-317。

[4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關於全國省市協商委員會秘書長會議情況向中央的報告〉，《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年），頁 340。

[41] 1949 年 9 月 22 日周恩來在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對〈共同綱領〉起草過程進行報告時也說了：「……就是在普選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以後，政協會議還將對中央政府的工作起協商、參謀和推動的作用。」，詳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人民政協共同綱領草案的特點〉，《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一冊，頁 16。

第二節　統戰工作會議的調整

除了政協機構的質詢意味較濃厚外，中共中央至少在職務安排上（包含協商機關與人民政府），對黨外人士進行了拉攏與統戰工作。甚至在生活上也照顧周道，例如羅隆基享受的是部長級的待遇，[42]而章伯鈞住著有七十九間房的大四合院，[43]因此中共對知識份子的安排從工作到現實生活中都已經「包下來」，因此章伯鈞在為中共建國一週年時的言論中說到：

>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僅僅一週年，就有如此輝煌偉大的成就，這便象徵著新中國的建設前途，是有無限的光明，然而這些成就，一點一滴都和掌握著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中國共產黨是分不開的。因此，我們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是要堅定意志，緊緊跟著中國共產黨和人民領袖毛澤東的鮮明旗幟前進，為建設新民主主義國家而努力而奮鬥到底。[44]

然而在生活條件好的狀況下，章伯鈞也明言跟著共產黨與毛澤東的腳步走，但黨外人士是否也能達到有職也有權呢？本節將從中共建政初期以來的歷次統戰工作檢討，探討中共主事者的主觀意願不斷地在強調加強統戰工作，以及現實情況中存在的黨組問題與關門主義進行討論。

目前可以看到較早對關門主義的討論是在 1949 年年底時，針對土地改革運動不時出現過火的現象進行的檢討。其事發從華中局決定糾正鄉村工作幹部不良作風，並由中共中央批准在全國各地推行。就事件內容來看，當時不少地方幹部亂打、亂殺、亂抓人，違反了中共一貫以群眾鬥爭的階級鬥爭模式。[45]因為藉由群眾運動的集體譴責方式，中共可避免在人民中戴上共產黨員亂殺人的不好形象。於是華中局要求「將黨所制定的一切決定作成建議，交付代表會議討論通過，有組織地向下傳達，使黨的方針變為群眾的方針」[46]。從「決定」作成「建議」，再由人民代表會議「討論」、「通過」，這一連串手法就顯現了這一道理。因為，實際上人民所討論的，早已由中共「決定」了，如果政策實行不如預期，甚至最後發生過左的傾向，中共也可以將責任推向代表會議，由群眾自行糾正。不過中共所冀望的這套手法，有一重要的先決條件，即為：

---

[42]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頁 661。

[43] 章詒和，《最後的貴族》（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3。

[44] 《人民日報》，1950 年 10 月 1 日，版 4。

[4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共中央批准華中局《關於糾正鄉村工作幹部不良作風的決定》的指示〉，《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一冊，頁 48-49。

[4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共中央批准華中局《關於糾正鄉村工作幹部不良作風的決定》的指示〉，《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一冊，頁 50。

> 一切黨與非黨的幹部均應認真實行代表會議的決定，糾正過去只在黨內的幹部會內來決定問題及只經過少數幹部推動執行的習慣。凡是群眾中所發生的錯誤，皆應經過群眾自己的組織與會議，由群眾多數決定糾正，而所有群眾工作幹部均應接受群眾的監督，由群眾分別批評或贊同擁護，這樣才能把對上級負責，對黨負責與對群眾負責統一起來。[47]

由上述事件可以得知，中共黨員幹部的關門主義傾向，不僅是針對非黨人士，還疏忽了運動應聯合群眾。

根據七屆二中全會確定的方針，於 1950 年 3 月 16 日在北京召開了第一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在會議期間李維漢作了〈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新形勢與新任務〉的報告，並於同年 9 月經中共中央批准在黨內印發。此次報告針對民主黨派的問題，進行大範圍的檢討。首先在黨派關係上，李維漢即要求在組織上尊重民主黨派的獨立性，而不是「從組織上去控制它們」[48]。其次在民主黨派的工作問題上，更針對有職無權的情況進行檢討：

> 黨外人士既然擔任了一定的職務，即應享有與其職務相當的權力，履行與其職權相當的責任。這不僅要在工作中同黨外人士商量一切應該同他們商量的問題，取得大多數人的協議，然後付諸執行，而且要在共產黨員和黨外人士之間進行必要而適當的分工，並主動地幫助黨外人士做出成績來。[49]

由此來看，黨外人士似乎擁有了政策的決定權。但因黨組控制了政策的解釋權，這意義遠高過於決定權。如果黨外人士所討論出來的政策走向，不符合中共中央的想法，當會受到黨組會議的推翻，久而久之，成了黨組（中共）決定一切。加上中共又握有重要的人事安排權，更孤立了黨外人士的立場。論其本意，本非欲以黨代政，甚至要求黨組不能代替政權工作，[50]但事實上卻使黨外人士愈來愈不

---

4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共中央批准華中局《關於糾正鄉村工作幹部不良作風的決定》的指示〉，《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一冊，頁 51。

4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新形勢與新任務〉，《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一冊，頁 154；中共中央統戰部研究室編，《歷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概況和文獻》，頁 16。

4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新形勢與新任務〉，《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一冊，頁 155-156；中共中央統戰部研究室編，《歷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概況和文獻》，頁 16-17。

50 為此李維漢曾批評黨員：「口頭上承認統一戰線的必要性，也承認與黨外人士合作的原則，但在實際上卻怕麻煩和不放心，不願與黨外人士合作，或者只要進步分子，不要中間分子，更不要中右分子……此外，也存在著敷衍主義傾向，認為統一戰線只是一種手段，拉拉攏攏，做做樣子而已……」，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新形勢與新任務〉，《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一冊，頁 157-158；中共中央統戰部研究室編，《歷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概況和文獻》，頁 18。

會出現異議之聲。這應是當時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以及周恩來所意料之外。[51]

同年 5 月朱德在中央直屬系統黨、政、軍、群各級黨的紀律檢查委員聯席會議上批評了關門主義的作風，針對黨員擺老資格、恃功挾賞的思想進行批判，認為黨員「以功臣自居，認為天下是他們打出來的，黨和人民就必須給他們以很高的地位和待遇。他們看不起黨外人士，看不起群眾，輕視黨的組織和紀律，輕視政府和法律。」[52]為此朱德要求將這些官僚主義與不願同黨外人士合作的情緒加以克服。

針對建國初期的統戰工作檢討，可以發現強調的是中共黨內的關門主義的作風。至於實際成效如何，從 1950 年年底交通部經驗一事可略窺端倪。章伯鈞當時任職於交通部部長，而交通部黨組在日常工作上卻出現了「事前不請示，事後也很少報告」、「幹部有事，都到xxx處去談話，不請示章伯鈞。由此，章有插不上手之感」、「在人事配備上，事先未與他商量，常有臨時告章，在部務會議上通過的情形」[53]等情況，周恩來為此要求時任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與財政部部長的薄一波起草交通部黨組關於團結民主人士問題的檢討報告，並由中財委分給所屬各部、署、行、局的黨組進行通報。在此通報中即聲明：「要使黨外人士有職有權。這不是句空話，共產黨員應保證這句話不折不扣的實現……使他們真正感覺到有參加決定大事之權……用人也應與黨外人士商酌。黨外人士所舉薦的人，更應慎重考慮，能用者盡量予以錄用。」[54]薄一波這一份經驗報告，於同年 11 月 17 日由毛澤東批示，轉發給中財委系統以外的各部門黨組研究，並且要求有

---

[51] 此外，周恩來也對有職有權的問題進行強調：「非黨人士要有職有權。陳雲同志主持中財委的工作，都是要各部部長對本部工作做報告。非黨人士擔任部長的就要非黨人士做報告，如輕工業部就要黃炎培報告，水利部就要傅作義報告。開始他們情況不熟，報告後可由副部長補充，久了情況熟了，連補充也不需要。……有職、有權、有責，自然會發揮他們的積極性。……有關文件等也交非黨人士審查，一切指示、法令也要他們修改。……這些政策法令是經過他們討論同意的，事後他們也會更好地進行宣傳解釋。」為此周恩來還要求統戰部應參加各級黨委會會議，特別是參加黨組會議，參加討論統戰工作並討論各項政策法令。在人事安排方面，對於非黨幹部的安排，應聽統戰部的意見。且非黨幹部應包含資產階級人士。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發揮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積極作用的幾個問題〉，《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一冊，頁 187-188；中共中央統戰部研究室編，《歷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概況和文獻》，頁 32-33。

[5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加強黨的紀律檢查工作〉，《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一冊，頁 233。

[53] 〈交通部黨組關於團結民主人士問題的檢討〉，1950 年 11 月 6 日，轉引自，章立凡，〈“反右”與中國民主黨派的改造〉，收錄於章詒和編，《五十年無祭而祭》（香港：星克爾出版，2007 年），頁 145。

[5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同黨外人士合作共事的四點經驗〉，《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一冊，頁 464-465。

類似問題嚴重的黨組依照交通部黨組的方式寫出檢討。[55]薄一波事後回憶認為從建國開始，中共中央就十分注意加強與黨外人士的真誠合作，並認為黨外人士參加政府的最大好處，是使中共能經常聽到不同的聲音，使國政大事能辦得更好。[56]然而此話或許只說對了一半，因事後證明中共中央雖有誠意合作，但問題仍不斷地出現與存在，關於這點下文將會繼續探討。[57]

從這次事件來看，從建國之初到 1950 年 3 月的第一屆全國統戰工作會議與 5 月召開的紀律檢查委員聯席會議都不斷地強調應使黨外人士有職有權與克服關門主義的問題，顯示出這些問題自建國伊始就已存在。換言之，新民主主義與〈共同綱領〉似乎沒有發揮預期目的與效果。而對於這幾次統戰工作成效的檢討，參看冰山一角的交通部黨組問題，從結果論上來看可說是失敗的。

從 1951 年的第二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開始到 1956 年知識份子問題會議與第六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之前，歷經了三反、五反運動、制定憲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第二屆政治協商會議名單、以及第一個五年計畫等等。而從目前的資料來看這些事件，中共中央要求統戰部應列席政府黨組會議、[58]強調有職有權的問題、[59]要求黨員不能排斥別人壟斷一切權利、[60]批判關門主義與官僚主義的作風、[61]黨外人士應接受或加強共產黨領導等等，[62]此類檢討層出不窮，本文不在

[5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同黨外人士合作共事的四點經驗〉，《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一冊，頁 464。

[56]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 25。

[57] 章立凡認為中共中央領導人在此次交通部事件中，當時還很重視維護統一戰線的形象。參見章立凡，〈"反右"與中國民主黨派的改造〉，收錄於章詒和編，《五十年無祭而祭》，頁 145。然而實際上中共中央領導人對於統一戰線的維護，不是只有出現在此次事件中。相反地，在反右運動以前中共高層仍不斷在檢討統戰工作。

[5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加強統一戰線工作的指示〉，《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二冊，頁 83。

[5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進一步加強政府機關內部的統一戰線工作〉，《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二冊，頁 328、33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統戰部《關於縣、市以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制實行時安排民主人士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實行後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組織問題的補充意見》〉，《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五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年），頁 14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共中央關於統一戰線工作的指示〉、〈中共中央關於市、縣人民委員會中黨員和非黨人士的比例及市、縣設置政協委員會等問題的規定〉，《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六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年），頁 25、83-84。

[6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進一步加強政府機關內部的統一戰線工作〉，《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二冊，頁 332。

[6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關於民主黨派工作的決定〉，《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年），頁 25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共中央關於在中央一級機關中具體執行《中共中央關於開展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命令主義、反對違法亂紀的指示》的決定〉、〈中共中央批准全國統戰工作會議《關於人民代表大會制實行後統一戰線組織問題的意見》、《關於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時安排民主人士的意見》〉，《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四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年），頁 117、434、44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共中央關於統一戰線工作的指示〉，《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六冊，頁 20-23。

[6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關於民主黨派工作的決定〉，《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三冊，

此細部贅述。不過透過上述的檢討，一再地顯現出一個事實，即中共中央不是只在 1950 年年底交通部黨組問題中，維護統一戰線的工作而已。且就不斷的強調統戰這一點來看，中共也不是單純欲保持統戰工作的形象，而是關門主義、官僚主義的問題一直無法解決。

然為何在中共中央願意維護統戰工作下，黨外份子仍無法有職有權且關門主義也得不到改善？首先，必須分析何謂是「有職有權」。有職，代表著職務的安排與任用；有權，則是能夠決定、參與以及討論相關問題。對於「有權」的問題，中共已經再三要求了，實際上中共中央也同時要求民主黨派接受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因此從一開始兩者就不是處於平等關係。既然要由中共來領導，卻又要使黨外人士有職有權，凸顯了矛盾與衝突。一般大陸學者的研究認為資產階級的多黨輪流執政，將使人民政權脫離工人階級政黨的領導，且民主黨派力量比較弱小、政黨機制也不健全，不具備總攬全局的執政能力，[63]甚至一般民眾也接受了多黨輪流執政不適合中國。[64]但從本質上來說，中共不會讓民主黨派人士單純舉手表決通過議案與政策，必會要求讓其參與討論，且面對政策要負責。然而，「有職有權」在黨內、黨外意見一致時，不會引發矛盾。但如果想法分歧時，在「由中共領導」這一準則與意義下，將無法使黨外份子「有權」。[65]畢竟，民主黨派與中共黨組意見分歧時，在無權力決定最後結果、無法改變中共黨組想法的情況下，稱不上是完整的「有職有權」。最後事實表明，「由中共領導」、「黨組擁有政策解釋權」還是壓過了黨外人士的「有權」。於此也顯示了人為意願與黨政制度上的矛盾所在。

頁 25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共中央批准全國統戰工作會議《關於人民代表大會制實行後統一戰線組織問題的意見》、《關於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時安排民主人士的意見》〉，《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四冊，頁 44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關於政協章程和政協地二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名單問題〉，《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五冊，頁 695。

[63] 黃安余、邱格屏，〈周恩來對處理黨派關係的理論貢獻〉，《社會科學家》，期 4（1997 年），頁 88。也因此中共對民主黨派的領導只能是政治上的領導而不是工作中的領導。參見，童慶平，〈周恩來發展政黨協商民主的思想〉，《上海市社會主義學院學報》，期 6（2008 年），頁 28。雖然要求只是在政治上的領導，不是工作中的領導，然而在「黨組」（政治）有「政策」（工作）的解釋權下，無形之中，中國共產黨同時握有了政治與工作上的領導權，尤其是在那政治領導高於一切原則的時代下。

[64] 如北大民主運動中，林希翎曾說：「……資產階級的兩黨制倒可以競爭一下，在我們國家裡，當然這不需要。但這說明能多提意見是好的。」詳見，牛漢、鄧九平主編，《原上草：記憶中的反右派運動》（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 年），頁 165。

[65] 章乃器後來在 1957 年 5 月中央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上也說了：「……有人批評了黨，明明提的意見是對的，黨員也不承認。有人提的意見盡管是符合黨的政策的，但是只黨員負責同志一搖頭，非黨員要堅持意見也是很困難的。……」，詳見，中共瀋陽醫學院黨委整風辦公室編，《章伯鈞張百生等人言論集》，頁 13。如果黨員不僅有關門主義的作風，而實際上也能力不足或屍位素餐的話，問題也就更為嚴峻了。參見，中共瀋陽醫學院黨委整風辦公室編，《章伯鈞張百生等人言論集》，頁 55。

其次還有黨組書記兼職副職的問題。在人民政府各部委黨組書記中，大多兼任該組織的副職，造成上下職權的複雜化。例如，1952 年 9 月中央新設糧食部，由民主建國會的章乃器（1897-1977）出任部長一職。其在與臨時黨委書記見面時就說了：

> 你是共產黨員，我是民主建國會成員，我們的領袖都是毛主席，我們的共同經典都是毛主席著作，我們是革命同志。但在工作上，我是部長，你是副部長，你是我的下級和助手。因此，你必須絕對服從我的領導，你們黨組不許背著我自行其是。這是原則問題，必須首先講清楚！[66]

副部長由部長領導指揮，副職為正職之助手，皆為常理之事。然而對於中共來說，黨組代表的是中共中央對各部會的監督與政策執行單位，而「不是糧食部的下屬單位」[67]。兩造說法皆有合理之處，但要由部長領導副部長、抑或是黨組書記（兼副部長）非為部長的下屬單位，顯現出制度上極為矛盾的特點。然為何不直接由黨組書記兼任正職，進而避免領導上出現的衝突，此正是中共欲擺脫將民主黨派僅視為政治花瓶上的用意，藉由非黨人士擔任正職可以更加顯示出〈共同綱領〉的精神與「聯合政府」的色彩。若反之，將會呈現名符其實「黨天下」的局面。但這樣做的結果，就是中共黨內的黨組問題不斷出現。章乃器也才會說：「我這個有職有權，是鬥爭得來的。」[68]

第三節　知識份子問題會議

上節已將黨組問題與中共領導人的主觀意願作了探討，然而在 1953 年以後毛澤東便加速朝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前進，[69]並在三大改造即將完成的情況下，欲推動大規模的經濟建設。故在知識份子運用於經濟建設的前提下，針對調動黨外人士積極性的知識份子問題會議應運而生。

一、知識份子問題會議

根據目前研究，早在 1955 年下半年時李維漢已請民主同盟調查知識份子狀況，歸納出六個方面的問題，簡稱「六不」，即估計不足、信任不夠、安排不妥、

---

66 周伯萍，〈我在糧食部十二年〉，《黨史博覽》，期 4（2007 年），頁 14。

67 周伯萍，〈我在糧食部十二年〉，《黨史博覽》，頁 15。

68 中共瀋陽醫學院黨委整風辦公室編，《章伯鈞張百生等人言論集》，頁 13。

69 李福鐘認為經過了 1953 上半年毛澤東大刀闊斧整頓後，所有官員再不敢向資產階級妥協，一份份朝著社會主義過渡的計畫與報告紛紛出籠。參見，李福鐘，〈中國共產黨為什麼放棄新民主主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40（2003 年 6 月），頁 229。

使用不當、待遇不公、幫助不夠，[70]並將此問題即時向周恩來與中共中央進行反應。[71]同年 11 月 23 日，周恩來到毛澤東處開會，匯報了關於知識份子的問題，並提出自己的意見。會議決定在 1956 年 1 月召開一次大型會議，全面解決知識份子問題。並成了由周恩來領導的十人小組，進行會議的籌備工作。[72]

根據上一節的討論，可以得知「六不」的問題是由來已久。中共中央一直無法解決統戰工作中出現的問題，這一點毛澤東不會不清楚。故在面對加速經濟建設的時候，問題的解決也就更顯得急迫。因此不能說毛澤東已經控制了知識份子，欲調動其積極性才召開會議。更精準的說法應是，黨外份子一直無法受到有效的利用，甚至是有職無權，在面臨當前情勢下，毛澤東才會要求召開一個大型會議，欲全力解決以往統戰工作中出現的種種弊病。

在正式會議召開前，中央十人小組將經由周恩來審定[73]的〈中共中央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草案）〉發至全國各省委、市委、各部委、國家機關和人民團體的黨組，要求加以討論。其中言及：

> 目前黨的迫切任務就是加強對於他們的領導，對於他們所從事的工作做出全面規劃，使他們能在工作中充分地發揮力量和不斷地提高業務能力。……目前黨內的主要傾向，卻是對他們的政治變化估計不足，不按照他們的實際工作和政治立場，把他們看作勞動人民的一部分。不了解工人、農民、勞動知識分子的親密聯盟是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條件，因而同他們之間存在著某種程度的隔閡。[74]

依照此中央指示，各地紛紛召開知識份子問題會議，並向中共中央提交了調查研究。根據沈志華的研究，這些調查材料多呈現了「六不」的問題。[75]

1956 年 1 月 14 日至 20 日知識份子問題會議在北京召開，論其參加人數與

---

[70] 沈志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三卷：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1956-1957）》（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 年），頁 19。

[71]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 年），頁 811-812。

[7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上卷，頁 521。

[73] 在《周恩來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只註明由周恩來所改訂，實際上毛澤東也參與了修改過程。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上卷，頁 525；毛澤東，〈對中央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草案的批語和修改〉，《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五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年），頁 475。

[7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上卷，頁 525。此文件遲至 2 月 24 日才定稿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共中央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八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 年），頁 132。

[75] 沈志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三卷：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1956-1957）》，頁 30-38。

規模巨大是建國以來所罕見。[76]在此次會議上，周恩來發表了經由胡喬木（1912-1992）所寫的初稿與十人小組反覆修改後的〈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一文。[77]此報告提到中國面臨的國家建設與科學技術研發，需要大力擴充知識份子隊伍，也談及知識份子在經過歷次改造後，已是工人階級的一環，故必須改善他們的工作條件與生活待遇。此外，報告中針對由來已久的宗派主義、關門主義思想進行了檢討。對此論及：

> ……目前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的主要傾向是宗派主義，但是同時也存在著麻痺遷就的傾向。……不認識他們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認為反正生產依靠工人，技術依靠蘇聯專家，因而不認真執行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不認真研究和解決有關知識分子方面的問題……黨外的知識分子除了需要應得的信任，還需要應得的支持。這就是說，應該讓他們有職有權，應該尊重他們的意見，應該重視他們的業務研究和工作成果……[78]

從此報告中的確呈現出欲改善關門主義與知識份子的工作條件，然在黨外份子的眼中有多少效果，像是章伯鈞就曾私下談到：「什麼使用？還不是利用！」[79]甚至在內部的農工民主黨座談會上也說：「知識分子問題提出後，情況有了大變化。共產黨過去對知識分子是"打"，現在是"拉"。為什麼先打後拉？這就是政治。搞政治的人不懂得這一點，連做漢高祖都不行，更不必說做毛澤東。蔣介石為什麼不行？就因為他只會打，不會拉。」[80]沈志華與章詒和都認為此次會議，並沒有解決歷次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過火的問題。[81]此外，對於知識份子的階級屬性沒有得到確定，甚至也沒觸及思想和學術自由的問題。因此會議結束後，經由調查仍發現未克服宗派主義思想、對知識份子仍不信任，顯示出此次知識份子會議與新政策的失敗。[82]

然而思想改造與學術自由都是根本性的問題，中共不會作出讓步與自打嘴巴的檢討。不論是主觀自願亦或無奈接受，黨外份子與民主黨派都已明文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其要去爭取政治思想與學術自由，倒不如先爭取實質上的有

---

[76] 沈志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三卷：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1956-1957）》，頁 47-48。

[7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上卷，頁 528、537。

[7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八冊，頁 14、18-24。

[79] 章詒和，《順長江，水流殘月》，頁 8。

[80] 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執行局編印，《章伯鈞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57 年），頁 30。

[81] 章詒和，《順長江，水流殘月》，頁 8；沈志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三卷：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1956-1957）》，頁 56-58。

[82] 沈志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三卷：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1956-1957）》，頁 54-59、72。

職有權要來得實際些。也是因為如此，在章伯鈞看來，此次為提高黨外人士積極性而召開的知識份子問題會議，只是欲「使用與利用」知識份子而已。因為「六不」問題依然存在，黨員幹部仍未向非黨人士開啟大門。沒有權力，又要求提高工作成果，呈現的是工作上的利用關係。至於會議過後的改善工作條件、失業與使用不當問題、擴大吸收知識份子入黨等等新政策，只是一種治標不治本的作法。沒有解決有職無權的老問題，才是知識份子問題會議與新政策失敗的主要原因所在。不過此次會議至少讓一部分沒看清楚事實真相的知識份子感覺到中共有在進步與改善自己的作法。如傅雷（？-1966）就曾說到：

> 我很想以知識分子的身份，對知識分子的改造做一些工作。比如寫些文章，批評知識分子的缺點等等。政府既然已經做了這樣大的努力幫助我們，我們自當加倍努力來配合政府。改善党與知識分子的關係是個關鍵性的問題，而這個問題的解決是雙方面的，絕非片面的。[83]

政府給其不錯的待遇以及生活上的幫助，然而這是在調動知識份子的積極性為前提，有點像是將電器接上電源令其工作的感覺，但知識份子與黨外人士畢竟不是給糖吃就會乖的小孩，中共政策上的善意敵不過制度上的缺陷。

二、〈七年方針〉

中共中央統戰部配合知識份子問題會議而召開了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在此之前，已由李維漢草擬〈一九五六年——一九六二年統一戰線工作方針〉（簡稱〈七年方針〉），並於一月二十八日送交中央審稿，經修訂後交付第六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討論。[84]李維漢提起此事時，曾說明〈七年方針〉送中央審查時，內容作了修正：「我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成了“社會主義的統一戰線”，各民主黨派和工商聯“已經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政治團體”。二月初，恩來同志審閱時指出這些提法不妥。我們當即取消這些提法，並對文件重新作了修改。」[85]至於周恩來修改的理由在 2 月 6 日二屆政協常委會第十七次會議講話上作了說明：

> ……我們還有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嘛，怎麼能說都是社會主義成份了呢？還要有一個過程。人民團體裡頭還有工商聯，民主黨派裡還有代表資產階級的黨派，海外華僑裡頭有很多是資本家，各民族現在還有貴族。……現在改變名稱不太好，一改名，就把統戰範圍弄窄了，弄混了。[86]

---

[83] 傅敏編，《傅雷家書》（香港：三聯書店，2006 年），頁 132-135。
[84]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頁 815。
[85]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頁 815。
[86] 中共中央統戰部研究室編，《歷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概況和文獻》，頁 208-209。

由此可以看出中共中央上層對民主黨派份子的階級屬性未取得共識。且周恩來此種解釋將民主黨派與工商聯排除在社會主義之外，避免了中國共產黨在領導權上的動搖。若統戰會議將其視為社會主義團體的話，將象徵民主黨派與中共處於平等關係，中共的領導黨地位也將會受到衝擊。從這層意義上來看，不論中共如何改造知識份子成功，甚至認同其為工人階級而為人民政權服務。一旦以黨派團體性質看之，他們仍不會被當作社會主義團體。中共也因此處於領導者的地位。

再來討論〈七年方針〉內容。在中共中央於 3 月 31 日批准〈七年方針〉並發至全國各地黨委與國家機關黨組時，提到在統戰工作上仍存在著關門傾向與右傾保守傾向，要求各地加強改善。[87]至於在〈七年方針〉的內容中，首先承認了知識份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並成立社會主義學院幫助知識份子學習馬列主義理論，此外在工作條件上應加以幫助，要民主人士真正有事可作等等。[88]基本上並不超出知識份子問題會議時所下的結論，而李維漢在會議的總結發言上也仍指出：

> 現在，民主人士並不都是有職有權，有許多人的權是不很多的。對他們信任不夠，對他們的職權尊重不夠，不注意聽取他們的意見，他們坐的是冷板凳。有事的時候，要發表宣言、發表談話，就去找人家了，平常就不大理會。要求人家多，給人家的幫助很少；只說教育人家，但是，很少想到要向人家學習點什麼。[89]

從 1949 年到 1956 年，一直是老調重彈，也代表中共統戰政策的失敗。李維漢事後回憶認為〈七年方針〉對當時形勢分析與強調教育工作是正確的，但對調動黨外人士為建設服務這一點強調得不夠。[90]不論如何，第六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與〈七年方針〉都無法解決（甚至是沒有意識到）有職無權、關門主義問題的根源。無奈的是，毛澤東已著手黨內開門整風，陸定一（1906-1996）也在 5 月 26 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報告會上，進行題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演講。隔年 1957 年，統戰部配合中共中央政策，邀請民主黨派舉行座談會，決定克服黨內相當嚴重的關門主義傾向，一些被視為「毒草」的言論紛紛出籠。如章乃器「片面強調服從領導，就必然有職無權。」[91]章伯鈞的：「在非黨人士擔任領導的地方，實

---

[8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共中央批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二年統一戰線工作的方針》的指示〉，《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八冊，頁 203-204。

[8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共中央批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二年統一戰線工作的方針》的指示〉，《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八冊，頁 204-210；中共中央統戰部研究室編，《歷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概況和文獻》，頁 246-249。

[89] 中共中央統戰部研究室編，《歷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概況和文獻》，頁 254。

[90]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頁 817。

[91] 《人民日報》，1957 年 5 月 9 日，版 1。

際上是黨組決定一切，都要黨組負責。既然要黨組負責，就不能不要權，這是形成非黨人士有職無權的根本原因。」[92]張百生的：「黨的絕對領導權造成的嚴重宗派主義」[93]等等。這些在中共看來，是針對共產黨領導權的挑戰，然而長久以來中共中央對於改善黨外人士有職無權的問題，總是朝著提高工作條件、生活待遇與克服關門主義的方向在走，顯然的，歷次下達的改革指示與統戰會議的檢討都是失敗的。

本章從〈共同綱領〉的討論著筆，到知識份子問題會議的召開，欲釐清民主黨派是否為民主花瓶的擺設，提出另一種方向的解釋。學者陳永發曾論及非黨的上層政治活動份子被中共「包下來」，也參與建國初期的復原工作，因此他們也不無有職有權的感覺，一旦中共從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改變到社會主義以後，他們就難有同樣的舒暢感覺。[94]然而可以得知中共中央在反右運動以前，雖然對黨外人士給予優渥的待遇，甚至到了養生送死的地步，[95]但卻也不斷地要求改善知識份子的工作情況，也認清黨內存在著關門主義與宗派主義的問題。甚至在經濟穩定前就有有職無權的爭議了，如 1951 年章伯鈞所在的交通部就已出現黨組問題，當然這應不是唯一一例。[96]故雖然中共中央不是把民主黨派當作花瓶擺設而已，且最起碼還要「使用與利用」黨外份子的工作能力，然而事與願違，黨組問題一直是個解不開的結。章伯鈞在 1957 年時說到：

> 有人認為，統戰部徵求意見不止一次了，到今天還要人家提意見，有些人都不願意提了，因為過去提的意見沒有下文，沒有交代。如去年統戰部無準備地制定各民主黨派幹部制度，開了幾次會徵求意見，毫無結果。再如 1950 年統戰部就曾強調有職有權問題，迄今七年，這個問題還沒有很好解決。[97]

黨組問題不能解決是有職無權背後真正的因素，也因此問題延宕七年未決後，黨外人士對於統戰部要求提供意見時，顯得消極又被動。

在反右運動研究的意義上來說，毛澤東與中共中央不會不知道黨內長期以來

---

[92] 中共瀋陽醫學院黨委整風辦公室編，《章伯鈞張百生等人言論集》，頁 1。
[93] 中共瀋陽醫學院黨委整風辦公室編，《章伯鈞張百生等人言論集》，頁 55。
[94] 相關細節參閱，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頁 519-520。
[95] 如黃炎培之子被殺害、陳叔通之兄死，周恩來都指示給予幫助。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央關於聘請一批黨外人士為上海市政府顧問的電報〉，《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一冊，頁 28。
[96] 此外，周恩來在 1949 年 10 月對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進行總結時，也曾提到關門主義與遷就主義的問題。詳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在全國政協黨組第二次會議上的講話提綱〉，《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一冊，頁 434。由此可見，黨組的關門主義傾向問題很早就浮現在檯面上。
[97] 中共瀋陽醫學院黨委整風辦公室編，《章伯鈞張百生等人言論集》，頁 1。

存在的問題。也因如此，毛澤東幾次說服黨內開門整風批判官僚主義，對於知識份子會有什麼樣的言論出現，不會是完全摸不著頭緒的。「反擊說」[98]也站不住陣腳。因為黨外份子有職無權，早是中共中央欲解決的問題了。

既然中共中央（甚至是毛澤東本人）已瞭解知識份子中的「六不」問題了，為何一直無法有效改善。中共各黨組於國家機關、人民團體中的密佈，的確是造成「六不」問題的原因之一。然而卻無法構成問題的核心。此因，第一，在黨組如雲、「黨天下」的情況下，中共中央仍要求給予黨外人士有職有權並且條件合適下給予擔任正職，甚至倡導黨組只能在政治上領導，不能在工作上領導，這是人事上的主觀意願；第二，「中共領導其他民主黨派」、「黨組握有政策的解釋權」侷限了黨外人士對於異議提出的空間。如同本章中討論的，對於黨內、外意見分歧時，沒有最終決定權的話，稱不上是完整的有職有權，這是制度上呈現的實際問題。人事上的意願與制度上的矛盾衝突，才是問題一直無法有效解決的主要原因。至於黨組的過度延伸，只是增加了惡化的速度而已。

為加快經濟建設與調動知識份子積極性而開的知識份子問題會議，以及隨之而來的第六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仍然沒有解決問題的狀況下，毛澤東主導的大鳴大放將導火線給引燃起來，1957 年也成了眾多知識份子心中的夢魘。

---

[98] 即中共官方認為反右鬥爭不是中共主動挑起的，而是右派先猖狂進攻。

第四章　章伯鈞在一九五七

章伯鈞之女章詒和曾在其書云：「我這輩子沒有什麼意義和價值，經歷了天堂、地獄、人間三部曲，充其量不過是一場孤單的人生。」[1]，體現出了章伯鈞從開國之初受到的優渥待遇，直到反右運動開始從此背負大右派的帽子直至生命的盡頭，因此對於當時整個章家來說，以「從天堂跌入地獄」的轉折來形容之可謂十分貼切。[2]

關於章伯鈞在 1957 年前後的種種，章詒和眾多的回憶資料可約略看出端倪，筆者沒有掠美之嫌，然而將以歷史研究的角度重新考察章伯鈞人生中的劇變。從第二章的討論中可以發現章伯鈞帶著無奈不能三分天下的心境進入共和國，而透過第三章的分析，可以得知當毛澤東下定決心號召黨內開門整風與大鳴大放之時，就已埋下反右運動的種子。單就當時的發言來看，儲安平的「黨天下」一詞可說是最猛烈與切中要點，然而右派的首腦卻是章伯鈞與羅隆基兩人，[3]是什麼因素導致章伯鈞被列為右派之首，後文將有所討論。

從中共建國到 1957 年反右這段期間，除了前章所探討過有職無權的問題外，還存在著許多爭論議題，如經濟上與農村裡的統購統銷、政治上的整肅問題與民主黨派發展上的限制、教育上的入學不公等等，[4]限於資料與篇幅不一一細論，然無可諱言的上述這些問題都直接或間接地影響章伯鈞在公、私場合中的政論導向，換個方式來說，章伯鈞的種種發言實其來有自。

第一節　開門整風

有學者認為在波蘭事件後毛澤東故意使「牛鬼蛇神」出來鬧一鬧，藉以清除這些對政權的潛在威脅，[5]此即為對反右運動是毛澤東引蛇出洞的「陰謀」手法

---

1 章詒和，《最後的貴族》（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x。

2 章詒和也說到：「這年的春與夏，對知識份子和民主黨派來說，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春暉霜露，乃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季節；對我的父母來講，則親歷了由天入地的墜落。」參見，章詒和，《最後的貴族》，頁 11。

3 即「章羅同盟」，它屬於右派分子的最高定罪。參見，戴晴，《毛澤東黨天下野百合花》（臺北：新風出版社，1991 年），頁 261。

4 即優先照顧工人農民、特定軍人、革命烈士子女、少數民族和華僑。參見，麥克法夸爾、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編，謝亮生等譯，《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革命的中國的興起：1949-1965》（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年），頁 226。

5 丁抒，《陽謀——「反右」前後》（香港：九十年代雜誌社，1991 年），頁 57。也有人認為毛澤東的本意不是以整風來「引蛇出洞」，而是以整風來證實他的創造性理論，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樹立樣板，尤其在蘇共二十大對斯大林的衝擊後。參見，郭羅基，《歷史的漩渦——一九五七年》（香港：明報出版社，2007 年），頁 24。

論點的主要支持者。然而此種說法有其再商議之處，藉由第三章的討論可以得知中共的官僚主義傾向與關門主義作風已為上層不斷檢討，再加上急於調動知識份子的積極性為建設付出心力而召開知識份子問題會議，因此從某方面來說，中共的確有欲改革之象，不過也透露出一項重要卻為人所忽略的意義，即毛澤東如此大肆宣揚大鳴大放的情況下，如果事如所順，知識份子與黨外人士會有何種言論出現並非是無法預料的了。於是之故，從此角度來看，說中共在 1956 至 1957 年間的舉動是一種「陰謀」手法也不完全無錯，只是改革與誘發兩道並存罷了。在有此先備知識下再來探討 1957 年前後的章伯鈞，較能排除加害者與被害者此種非理性因素。

事可從 1956 年蘇共對斯大林（Joseph Vissarionovich Stalin, 1879-1953）批判開始說起，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 1894-1971）批評斯大林的政治清洗與個人崇拜，第一次揭露蘇聯模式的弊端與表示出變革之意。[6]為此章伯鈞也發出氣憤之感，章詒和憶起：「那段時間，家裏屋外都聽到父親帶着憤怒的議論：『斯大林就是代表最醜惡的名詞。』」[7]章詒和認為其父如此氣憤的原因除了其胞弟死於蘇聯大清洗下外，章伯鈞自身就反對斯大林模式與蘇聯道路。[8]由此回頭觀看第一章討論第三黨的政治思想時，也可以發現其對蘇聯一貫的態度，即中國不應盲目聽從或追尋蘇聯的腳步，而應走出自己的道路來。於是之故，章伯鈞認同蘇共二十大的檢討也就有因可尋了。在赫魯雪夫的秘密報告事件之前，毛澤東就作了〈論十大關係〉的報告，[9]在此份報告中可以看出毛澤東檢討各項問題，並欲將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服務。[10]其中除了檢討斯大林治下一些蘇聯政策上的錯誤外，也針對黨外關係作出評論：

> 中國現在既然還有階級和階級鬥爭，就不會沒有各種形式的反對派。所有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雖然都表示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但是他們中的許多人，實際上就是不同程度的反對派。……無產階級專政不能沒有很大的強制性。但是，必須反對官僚主義，反對機構龐大。在一不死人二不廢事的條件下，我建議黨政機構進行大精簡，砍掉它三分之二。話說回來，黨政機構要精簡，不是說不要民主黨派。希望你們抓一下統一戰線工作，使他們和我們的關係得到改善，盡可能把他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為社

---

6 朱正，《兩家爭鳴——反右派鬥爭》（臺北：允晨文化，2001 年），頁 11。

7 章詒和，《順長江，水流殘月》（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 9。

8 章詒和，《順長江，水流殘月》，頁 9。

9 朱正認為在蘇共二十大召開以前，就已開始檢討蘇聯的道路問題。故蘇共二十大與〈論十大關係〉的報告並無確切直接的影響關係。參見，朱正，《兩家爭鳴——反右派鬥爭》，頁 11-17。

10 毛澤東，〈論十大關係〉，《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頁 82。

會主義服務。[11]

由此我們更可以看出毛澤東對黨內存在已久的問題之不滿，因此在幾日後於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章伯鈞為此興奮地認為多黨制度中的眾議院和參議院，以及在朝黨與在野黨的存在體現了資本主義的活力。[12]

中共中央統戰部為配合「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在 7 月與 10 月召集民主黨派展開座談。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在其回憶錄中曾談到章伯鈞在這兩次會上提出的一些問題：

> 第一，監督應有法律的保障，民主黨派向相當政府部門應有質詢權。第二，民主黨派可以在人民代表大會中設立類似資本主義國家的"議會黨團"，每個黨派的"議會黨團"有權單獨向中外記者發表主張。第三，政府部門和政協對民主黨派提出的批評建議，應認真處理，不得敷衍應付。……章伯鈞一再表示不滿，主張打破"防區制"、"包幹制"。……章伯鈞主張中國應實行兩院制，使政協變成建議、監督、審核的機關，相當於資本主義國家的上議院。他還提議各民主黨派領導人成立政治討論會，定期討論國家大事，向黨和政府提出政策方針的建議。他這一主張，因高級民主人士反映冷淡而作罷。[13]

章伯鈞上述這些意見可以反映出，在中共建國之後黨內的官僚主義與關門主義傾向之突出，為此替民主黨派追求更多存在的空間與價值。此外，也可看出這些言論是基於民主黨派「監督」中共的立場上發聲，似乎看不出章伯鈞在向共產黨奪權。而打破民主黨派的防區制增進組織發展，除了是章伯鈞自身的野心外，[14]平心而論欲達「監督」之功效而發展民主黨派也無可厚非，尤其是農工黨在組織發展上是侷限於大中城市和以中上層醫藥衛生人員為主。

1956 年 9 月中共八大召開，起先還在以「繼續加強同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合作……缺點中最根本的，就是在黨的許多幹部的思想和工作中，還沒有擺脫主觀主義」[15]、「必須用加強黨內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們隊伍

---

[11] 毛澤東，〈論十大關係〉，《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 95-96。

[12] 章詒和，《順長江，水流殘月》，頁 10。

[13]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 年），頁 820-821。李維漢在最後提到：「他這一主張，因高級民主人士反映冷淡而作罷。」此句是否是基於替其他在場民主黨派人士掩護的用意不得而知。

[14] 章詒和曾說：「『八個黨派加起來才九萬人』這是他常說的一句話，是感慨，是無奈，更是不滿。……現在機會來了，父親怎能放過？對民盟、農工的組織發展工作，他早就憋足了勁兒。」詳見，章詒和，《順長江，水流殘月》，頁 14。

[1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建國以

中的這些嚴重的缺點。」[16]為號召，然而在波蘭、匈牙利事件爆發後不久，中共提升了改革腳步，在 1956 年 11 月 15 日八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了「採取整風方法，同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的傾向作鬥爭。」[17]黨內整風浮現檯面。此後，章伯鈞等人常聚集議論國事，並批評中共在政策上的錯誤。[18]章詒和也回憶起，當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後，章伯鈞「興奮立即轉化為動力，起勁地去到農工中央和民盟中央作報告，玩命地組織參加各種座談會，以幫助整風。」[19]

在 1956 年 11 月至 1957 年 2 月章伯鈞隨彭真（1902-1997）以全國人大代表團副團長身份，前去蘇聯和東歐進行訪問。在這段時間裡，毛澤東作出了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報告，在此次報告中重申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必要性，毛澤東說到：

> 在我們國家裡，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屬於人民內部的矛盾。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一般地屬於人民內部的階級鬥爭，這是因為我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有兩面性。……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他們的思想意識是一定要反映出來的。一定要在政治問題和思想問題上，用各種辦法頑強地表現他們自己。要他們不反映不表現，是不可能的。我們不應當用壓制的辦法不讓他們表現，而應當讓他們表現，同時在他們表現的時候，和他們辯論，進行適當的批評。……有錯誤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進行鬥爭。……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兩個口號，就字面看，是沒有階級性的，無產階級可以利用它們，資產階級也可以利用它們，其他的人們也可以利用它們。所謂香花和毒草，各個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也有各自的看法。[20]

毛澤東將意見的衝突視為人民內部矛盾作處理，應該開放不同的意見進行公開討論與爭辯。隨後在 1957 年 3 月 1 日第十一次最高國務會議的總結發言上，還說了：「不要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馬克思主義是不怕批評的，應允許互相批評，批評政府不犯罪。老幹部不怕批評。……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沒有安排，

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九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 年），頁 350-353。

[16]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 203-204。

[17] 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的總結發言〉，《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 247。

[18] 章詒和，《順長江，水流殘月》，頁 19。

[19] 章詒和，《最後的貴族》，頁 12。

[20]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 318、347、34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 年），頁 63、92、93。

安排不夠。」[21]毛澤東甚至還贊成出版蔣介石全集但不公開發行。[22]聽了這次會議的章伯鈞在結束後，其感覺良好也十分激動。[23]

毛澤東這次的會議除了檢討長期以來民主黨派與知識份子的問題外，還有另一項因素，即當時存在的罷工、罷課問題，當時全國各地大大小小約共有一萬多工人罷工，一萬多學生罷課，[24]毛澤東特地要求：「凡是犯了錯誤的都應該指出他們的錯誤，使他們得到教訓。但是一般地不要挫傷廣大群眾的情緒，也不要挫傷好幹部的情緒。……如果行動合理合法，當然不應該加以歧視；即使犯有嚴重錯誤，一般也不應該採取開除辦法。」[25]然或許問題沒有如此可以簡單解決，三個月後才會有「六六六」教授會議的召開。

章伯鈞於此之後，曾在中國民主同盟與中國農工民主黨召開多次座談會，留下了不少時政言論，如 4 月 3 日於民盟地方負責幹部座談會上講到了：

> ……中國的民主黨派，除了民盟、農工兩個政黨，其他黨派的成立，基本都是共產黨發起的。成立民主建國會時，中共向民盟借了二十幾個人去。解放後，中共全面領導，政治、組織領導，交叉幹部、兼職幹部等問題都產生了。去年，毛主席提出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問題。民主黨派組織獨立，政治自主。它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今天我們自己當家作主，幹部問題，兼職問題，交叉問題，都可以逐步解決。過去有問題找統戰部，今天請示我們的民盟中央，大家要共同研究，什麼馬都騎就會弄成五馬分屍。……民主黨派既沒有太子，也沒有第一書記，第二書記。所以，我們人事安排是個不斷需要研究的問題。[26]

章伯鈞這番言論清楚表明了，民主黨派中存在的交叉黨員的問題，有交叉黨員或兼職幹部的存在就侷限了黨派的獨立性。而毛澤東喊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口號，就外人來解釋，想要達到互相監督之效，首要之務不就是應加強組織的

---

21 毛澤東，〈在第十一次最高國務會議作結束語的提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 36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作結束語提綱〉，《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冊，頁 105。

22 毛澤東，〈在第十一次最高國務會議作結束語的提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 36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作結束語提綱〉，《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冊，頁 107。

23 章詒和，《順長江，水流殘月》，頁 20-21。

2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共中央關於處理罷工、罷課問題的指示〉，《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冊，頁 154。

25 毛澤東，〈對《中共中央關於處理罷工、罷課問題的指示》（修正稿）的批語和修改〉，《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 370-373。

26 〈1957 年 4 月 2、3 日「民盟地方負責幹部座談會」紀錄稿〉，轉引自，章詒和，《順長江，水流殘月》，頁 25-26。

獨立，否則民主黨派還是會受到黨內交叉黨員的掣肘。不過，章伯鈞還是有其保守的一面，當時不斷有呼聲將「互相監督」列入民主黨派的工作重點當中，然而章伯鈞卻認為如果「民盟大喊監督，各民主黨派都大提倡互相監督，黨內〔指中共，引者註〕百分之九十以上有牴觸，這將產生很多困難和問題」[27]，因此要在「中共內部對『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思想改變了時，才可以更好地貫徹」[28]。不過，這只是一種階段性問題，章伯鈞對於「互相監督」的政策仍是採取認可的態度，此從他在 4 月 8 日農工黨六屆三中全會上的發言就可以看出：

> 由於中共與各民主黨派有密切關係，有許多共產黨員一開始就交叉了民主黨派，往後民主黨派成員中，也有不少參加了共產黨，現在由於新的方針的提出，這些人都要逐步撤回去，有些人已經撤回。這是一種趨勢，我們首先要對此有所認識，要有對策。[29]

因此雖短期內不能朝「互相監督」的方向大步邁去，然而是一種目標則毋庸置疑。當交叉黨員逐漸退去民主黨派獨立性更完整後，才是「互相監督」能作更好發揮的時刻。

不過，章伯鈞在此階段替毛澤東思想進行自我闡述，就有點過於自滿了，其在 4 月 24 日農工黨舉行「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座談會上說：

> 老毛……現在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一下就得到了這個六億人口的天下。懼的是中國六億人口，吃什麼？穿什麼？我們常說很多國家伸手向美國要美金，其實，也有不少國家伸手向蘇聯要盧布呀！
>
> ……
>
> 斯大林這個人是很橫蠻的，我們中國歷史上的一些帝王就是如此，革命一成功就是大殺。不狠當不了英雄。
>
> ……
>
> 毛澤東思想現在有了很大的變化，這種變化莫說黨外人士跟不上，就是共產黨內部也有百分之九十的黨員跟不上，這是個大問題。我就是機會主義，我們要掌握。……很多共產黨員看不起民主黨派，這是錯誤的，他們

---

[27] 〈1957 年 4 月民盟全國工作會議領導小組舉行第十一次會議紀錄〉，轉引自，章詒和，《順長江，水流殘月》，頁 27。

[28] 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執行局編印，《章伯鈞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57 年），頁 29。

[29] 〈1957 年 4 月 8 日在農工黨六屆三中全會上的開幕詞〉，轉引自，章詒和，《順長江，水流殘月》，頁 29。

不了解民主黨派的作用，中國是一個六億人口的大國，光靠共產黨還能搞好嗎？……老實說，我們不要自卑唻！有些地方我們也可以教育共產黨員，像這個問題，我們就可以教育他們。[30]

第三章就曾提到章伯鈞的兩面性格，在此也可以清楚顯現。其在農工黨內部的會議上表露了其內在的想法，姑且不論對毛澤東思想的自我解釋，由上述言論可以看到對共產黨員由來已久的不滿，不僅是共產黨員看不起黨外人士而造成有職無權的問題；在整體上來說，章伯鈞認為中國不能沒有民主黨派，更不能單靠共產黨來處理國內外大事。現在毛澤東主動提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了，章伯鈞沒有不擁護的道理。因此在 5 月 5 日在民盟中央就說了：

整風要有黨外人士參加，兩種元素可以起化學作用。但黨外人士不是自己搞，而是幫助共產黨整風。各省、市都要有黨外人士參加，幫助共產黨整風，打破沉悶的空氣。……再次是有職有權的問題。統一戰綫中的矛盾是什麼呢？恐怕就是有職有權的問題吧！過去民主人士有職了，但是沒權。所以有人講民主人士不大好當，有些惱火。現在不但應該有職，而且應該有權。因此這次整風，對有職無權的問題也要整一整。[31]

從 1957 年 5 月 8 日起中共中央統戰部為徵得民主黨派負責人與無黨派民主人士對中共和統一戰線的意見，而召開十幾次的座談會，章伯鈞即以代表民盟的身份參加座談。章伯鈞在這幾場座談會上發表了許多日後成為攻擊「罪狀」的言論，其談到的有些是存在許久的問題，有些則是新的提議和建言，討論前應當區別兩者不同：

……幾年來，有些民主黨派的成員在國家事務中確實沒有很好地發揮作用，他們是有能力的，但是沒有條件。例如某機關的一個計劃科長，因為是非黨員，不能參加國家計劃委員會召開的他本應參加有關會議，很感苦惱。過去選拔留學生、學校留助教，都是首先考察政治條件，有些有能力、有專長的人，常被認為歷史複雜而不能入選，非黨人士出國學習的機會不多。非黨幹部要得到提拔很困難，黨員提升得快，好象只有黨員才有能力、有辦法。

……

民盟中有人認為：黨中央對統戰工作從理論、政策到貫徹執行和宣傳教育

---

30 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執行局編印，《章伯鈞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頁 24-26。

31 〈章伯鈞傳達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講話的紀錄稿〉，轉引自，章詒和，〈附件一〉，《順長江，水流殘月》，頁 102、104-105。

> 都重視得不夠。有人認為，民盟中央“帶病延年”，對長期共存方針無獨立見解，也無具體辦法，這點也是統戰部對我們的“病”幫助不夠，即互相監督不夠，統戰部也應檢查。還有人認為：統戰部單靠開會提意見不解決問題，希望能夠多花一點時間深入訪問一下，個別交談。深入訪問時，不要只找正副主席、正副秘書長，還要找專下面的人。[32]

關於有職無權的問題在第三章已有所討論，而章伯鈞此段言論也告訴我們黨與非黨之間的鴻溝有多深，不僅是有職無權而已，過去有更多的問題是中共取材要「紅」還是「專」的問題，事實證明優先考量的是政治背景要夠「紅」。像是羅隆基就曾提到：「現在有些知識分子不願意參加民主黨派，怕別人說他“落後”，而願意爭取加入共產黨。有人問：加入民主黨派是否影響加入共產黨，如果有影響，就不參加。」[33]其負面影響不只有左右國家建設而已，還會導致社會間一種不正常的競爭心理。此因有職無權的問題與積極爭取入黨、入團是帶有一種交互作用的情況在，因為非黨人士矮人一截，在工作上、學業上處處受到壓抑，也因此才要處心積慮爭取入黨，甚至在政治鬥爭中作出攻擊他人吸引上層注意的行為來。[34]章伯鈞在此是用較婉轉的說法道出這一情況。另外，章伯鈞點出了以往統戰部沒有做好調查工作，只知道注意上層民主人士的意向，而忽略更多民主黨派中下層人士的想法。然而，上層人士有職無權的問題都無法解決了，何況更多的中下階層。

在座談會仍進行的過程中，毛澤東已開始擬定反右運動，其於 5 月 15 日寫出的〈事情正在起變化〉透露出此一訊息。[35]章詒和認為促使毛澤東作出把整風

---

[32] 中共瀋陽醫學院黨委整風辦公室編，《章伯鈞張百生等人言論集》（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57 年），頁 1-2。

[33] 《人民日報》，1957 年 5 月 11 日，版 2、中共瀋陽醫學院黨委整風辦公室編，《章伯鈞張百生等人言論集》，頁 27。《章伯鈞張百生等人言論集》一書中摘錄自 5 月 17 日實屬錯誤，實際上羅隆基此言刊於 5 月 11 日的《人民日報》。

[34] 時在北京外國語學習修習俄文的關愚謙曾憶起：「還有什麼比做黨員更時髦的？你是黨員或團員，就說明你的思想比別人進步。我們的學習材料裡引用過史達林〔即斯大林，引者註〕的一句話：「共產黨員是用特殊材料製成的。」……入團以後，我逐漸發現，我們青年人之間也樹立了鴻溝，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越來越不真實，所謂的追求思想進步，很多都帶有虛假的一面。有的是為了取得組織上的信任，假裝積極。」參見，關愚謙，《浪──一個叛國者的人生傳奇》（臺北：寶瓶文化，2003 年），頁 148、184。

[35] 即「最近這個時期，在民主黨派中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他們以為中間派是他們的人，不會跟共產黨走了，其實是做夢。中間派中有一些人是動搖的，是可左可右的，現在在右派猖狂進攻的聲勢下，不想說話，他們要等一下。現在右派的進攻還沒有達到頂點，他們正在興高采烈。黨內黨外的右派都不懂辯証法：物極必反。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詳見，毛澤東，〈事情正在起變化〉，《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 470-471。不過，可以注意的是，在前一日即 14 日當時，毛澤東還在要求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彭真等人，注意當時國內報紙上刊載的整風消息。參見，毛澤東，〈關於注意閱讀整風消息的批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 468。詳細情形不得而知，然而可以確定的，對於從整風轉到反右運動上，毛澤東早已醞釀；另外，劉少奇、周

轉為反右的因素在於毛澤東從大量的民主人士言論中，發現事情並非合乎他的判斷，人們要求改變制度、撤銷黨組、取消黨委制、民主黨派要政治獨立、要有職有權的呼聲，撼動毛澤東與共產黨的領導地位。[36]其實藉由第三章的探討就可以得知中共高層對於有職無權、以及黨組發生的問題早有所知，如果要說成毛澤東在開門整風後才驚覺的批判聲浪之兇猛未免不合邏輯，因此合理的解釋為毛澤東早已預料到會走向反右運動這一天。而會走向這一步，似乎也是毛澤東的一意孤行，當時其他的領導高層也是在事後才得知的。[37]至於面對此般情勢的變化，中共中央統戰部的李維漢等人卻還不斷召開座談會徵求意見，不論其是否洞悉內情，都已成了整風前夕收集批判材料的工具。尤其是毛澤東發佈〈事情正在起變化〉的訊息後隔天 16 日，毛澤東還以中共中央的名義還發出指示，[38]要求對待黨外人士批評時除了要針對問題改進工作外，還要「放手讓他們發表，並且暫時（幾個星期內）不要批駁，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動面目，過一個時期再研究反駁的問題。」[39]

在 1957 年 5 月 21 日第八次的座談會上，章伯鈞繼續發表意見，雖引論不少，然為配合文論進行，有其必要：[40]

> 近兩週來提出的學校中的黨委治校的問題，引起了很多的討論。就我接觸到的朋友來說，大家的看法基本接近，都認為共產黨的領導是不可缺少

恩來、陳雲、彭真等人似乎在 15 日之前，仍不知道毛澤東作了這個決定，直到〈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完成後，毛澤東才指示給劉少奇、周恩來、陳雲、朱德、彭真等人詳加閱讀。不過，此文正式公開對外發表要遲至 1977 年 4 月了。參見，毛澤東，〈事情正在起變化〉，《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 476。故從這個角度上來看，以往研究中曾認為毛澤東在「20 世紀 50 年代初期和中期他的總的做法是通過廣泛的討論來決定政策，……毛澤東對有效的決策和黨的團結的貢獻由於在 1949 至 1957 年期間他主要的政治參與的性質而進一步增加了。」此番論點有必要作出修正。參見，麥克法夸爾、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編，謝亮生等譯，《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革命的中國的興起：1949-1965》，頁 63。另外，中共黨內一般黨員對開門整風的真實用意也不明白，如鄧拓一開始也是採保留態度的。參見，丁抒，〈論「陽謀」〉，收錄於丁抒主編，《五十年後重評「反右」：中國當代知識份子的命運》（香港：田園書屋，2007 年），頁 125。

[36] 章詒和，《順長江，水流殘月》，頁 37。

[37] 即前文註釋討論的 5 月 14 日和 15 日間的轉變，中共高層「獲得」毛澤東即將反右的風向球。

[38] 此因指示標題上為中共中央發出，然而文中已談到 5 月 14 日毛澤東要求黨內高層注意當時報紙刊載的整風消息，而翻看 16 日的指示中，繼續要求掌握報紙言論，並且出現了「五月十四日我們已告訴你們了」這段話。由此可知，16 日的指示同 14 日一樣皆由毛澤東發出。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共中央關於對待當前黨外人士批評的指示〉，《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冊，頁 273；毛澤東，〈關於注意閱讀整風消息的批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 468。

[3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共中央關於對待當前黨外人士批評的指示〉，《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冊，頁 273。

[40] 此端經過章詒和曾描述：「五月二十一日，父親『入套』了。頭天午夜已過，李維漢親自打來電話，請他出席統戰部下午的座談會。有些腹瀉的父親對李維漢說：自己說的已經很多了，對中共沒什麼意見可提。李維漢就是不放電話，非要他出席不可，真是『盛情』難卻」參見，章詒和，《順長江，水流殘月》，頁 40。

的，黨是可以從政治上領導科學的。但是，另一方面，大家也都感到這種制度有缺點，發生了宗派主義、教條主義和官僚主義的缺點。因此，大家認為應該更多地聽取教授和學生的意見。這証明，鳴，放，並不影響共產黨的領導，而是愈益提高了共產黨的威信。……現在光是中上層人物的意見，固然能夠反映很多方面的意見，但是，還應該普及到下層才好。……過去，作了許多轟轟烈烈的好事，但是，有些事情也給國家帶來了損失。如果在工作進行之初，就多聽聽人大常委會、政協、民主黨派的意見，就可以少走彎路。如掃盲運動、五年一貫制、推廣雙輪鏵犁等問題，如果事先經過國務院的部長們，根據材料，多方面地進行討論，或經過民主黨派、高級知識份子、專家的討論，就會減少損失。如果黨內一決定，就那麼幹下去，是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的。又如體制問題、中央和地方的分權問題，去年只交地方黨委書記和少數黨外高級幹部進行討論。主要是黨內討論。應該利用政協、人大的各種委員會、民主黨派去討論，這些人都有相當的認識和經驗。再如文字改革，我認為既不是國防機密，又不是階級鬥爭問題，是一個人民內部的矛盾問題，卻只由少數熱心分子作了討論。這樣，是不是人人都搞通了呢？我看包括黨內的一些同志，大有問題，相當混亂。

……

現在工業方面有許多設計院，可是政治上的許多設施，就沒有一個設計院。我看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應該是政治上的四個設計院。應該多發揮這些設計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先交他們討論，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現在大學裡對黨委制很不滿，應該展開廣泛的討論，制度是可以補充的，因為大家都是走社會主義的路。這樣搞，民主生活的內容就會豐富起來。政協，人大不要等到期滿，今年就可以進行明年所要作的大事的討論，

……

大多數教授都反映說會多，這要看什麼樣的會，假使是千篇一律的報告會，形式主義的會，最好是少開一點。比如國務院開會常是拿出成品要我們表示意見，這樣的形式主義的會，是可以少開的，但如果能夠提出問題，拿出材料認真討論，有豐富的內容，能夠發揮各個人的見解，這種會大家不會感到多的。……在政協、人大常委會裡面，共產黨中央要考慮放上一批能幹的共產黨員。共產黨的許多領導同志，有知識，有精力，可否在統一安排的原則下，分配一部分參加到上述機構裡面，經常同各方面的人士交換意見，而不要象現在的一些共產黨的同志那樣，只是看看你們怎麼

講，……鎮反、三反、肅反中的遺留問題，一再討論，黨和政府應該下決心，檢查一下。……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在革命中發生了極大的作用。這方面的經驗還得總結一下，從馬克思、列寧那裡找理論根據教育共產黨員，那固然必要；但是還不如從實際生活中，從孫中山同中國共產黨合作開始直到現在的統一戰線工作，作一個總結，對黨員的教育作用更大。在作某一部門的總結的時候，也可以請有關的民主黨派參加，這也可以少發生一點主觀主義的毛病。[41]

在此引出了不少章伯鈞的言論，其中有些是點出實際存在的問題，並在此基礎上提出許多新的建議。首先因為民盟的主要工作是從科學研究與高等院校入手，幫助中共進行整風，因此章伯鈞在其發言當中不少是關於學校的情況，比如學校的黨委制問題，章伯鈞並未批評共產黨的領導，取而代之的只是要求克服黨內的官僚主義與關門主義，並多聽取師生的意見；此外，章伯鈞也提出了過去會議太多的問題，其中有不少是沒有必要的形式性的開會，但如果是有意義並會採納各方建議的會則不反對召開。然而，章伯鈞忘了在那政治優先高於一切的年代，「形式」性質的會議只會被中共嫌少不嫌多。即便如此，在中共黨內的關門主義影響下，也只能要求黨員多聽聽非黨人士的意見，而無法做到取消這種「政治味」濃厚的會議。其次是有職無權的問題，章伯鈞表明了政協、人大常委會裡面，中共中央應要放上一批能幹的共產黨員，此顯示出對於關門主義的問題提出了另一種解決之道，簡而言之，即換掉具有官僚主義與關門主義作風的黨員，替以「有知識、有精力」的共產黨員。

至於被廣為討論的「政治設計院」問題，已有研究者指出章伯鈞的建議是以共產黨的領導為前提，並且出發點是欲使國家少走彎路用意良善的，此外當時的發言也帶有漫談和即興發揮的色彩。[42]而《毛澤東傳（1949-1976）》中說的：「“政治設計院”和共產黨的領導怎麼擺？他沒有明說，但把他在 5 月 8 日的發言對黨委（黨組）領導的否定性批評聯繫起來看，事情已很清楚了」[43]，也與事實不符。[44]此番認為大體來說沒有問題，然而有一點需要特別注意的，章伯鈞即使是即興漫談，但在政治鬥爭中被無限上綱也不應意外，況且中共較會感到刺耳的應是章伯鈞認為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先交給他們（即政治設計院）進行討論，如此

---

41 中共瀋陽醫學院黨委整風辦公室編，《章伯鈞張百生等人言論集》，頁 2-4。

42 宋霖，〈公正評價 1957 年的章伯鈞——兼與《毛澤東傳（1949-1976）》作者商榷〉，《黨史研究與教學》，期 1（2005 年），頁 71。

4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年），頁 694。

44 宋霖，〈公正評價 1957 年的章伯鈞——兼與《毛澤東傳（1949-1976）》作者商榷〉，《黨史研究與教學》，頁 70。

一來被說成章伯鈞在向共產黨奪權也是有跡可循。另外，章伯鈞將人民團體也列為其中一個設計院，這是否與第三黨政治思想背景中的「職業團體」有直接關係則不得而知，然而要硬說沒受第三黨政治背景影響也是不合理的，因為從農工黨與鄧演達的歷史來看，職業團體在平民政權中是占有重要地位的。

前文提到在 3 月時，毛澤東已對罷工、罷課問題提出因應之道，然而實際上隨著鳴、放過程愈演愈烈學潮有不可收拾之像，為此章伯鈞也十分地著急。[45]於是在 6 月 6 日特別為此問題召集幾位教授展開討論，此即為「六六六」教授會議，參加者計有曾昭掄（1899-1967）、錢偉長（1912-）、費孝通（1910-2005）、陶大鏞、吳景超（1901-1968）、黃藥眠（1903-1987）六位教授、以及民盟辦公廳主任葉篤義（1912-2004）、史良（1900-1985）、胡愈之（1896-1986）、金若年、閔剛侯等人。[46]至於這是不是一場密謀會，六位教授是否是章羅聯盟的謀士或軍師，則各說各話了。[47]

在此次會上各教授反映出北京各高等院校中學生普遍存在的不滿情緒與過去政治鬥爭中造成的誤審誤判，反映出當時中共遇到的許多問題，為此章伯鈞認為：

> 共產黨內部問題也大，計委差不多都是黨員，但撤換李富春的大字報貼在李的門口，這是估計不到的。
>
> ……
>
> 我主張民主黨派要大大的發展，至少應該發展一兩百萬人。無黨派的人都應參加組織，現在黨團員有三千幾百萬，民主黨派發展一兩百萬人不算多。同時民主黨派應該深入到縣一級，這樣才能真正發展民主黨派的監督作用。……列寧死後有兩個人，一個是南斯拉夫的鐵托成為反對派，另一個是中國的毛公，他繼承了列寧主義。這次整風運動，要黨外的人提意見，其後果我想毛公一定是估計到的。民主黨派提意見想來總是客客氣氣的，但估計不足；沒估計到黨會犯這樣多的錯誤，現在出的問題大大超過了估計，真是「超額」完成了任務，弄得進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現在

---

45 章詒和，《順長江，水流殘月》，頁 43。有研究指出，從 1956 年 6 月到 1957 年 1 月間，大大小小罷課多達 30 次。參見，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臺北：聯經，2001 年），頁 682。

46 章詒和，《順長江，水流殘月》，頁 45。

47 此因時人將此次會議視為一場密謀奪權的密會，參見，石人編寫，《章羅聯盟罪行錄》（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 年），頁 4。據目前可以得知當時的發言狀況，其紀錄則是由中共、民盟的交叉黨員閔剛侯在日後所作的揭發材料而出現。參見，章詒和，《順長江，水流殘月》，頁 46。

> 我們民盟有責任要幫助黨。[48]

姑且不論章伯鈞欲大力發展民主黨派的想法起點何在，至少從「互相監督」這點上來看，中共與民主黨派的黨員人數比過於懸殊，「互相監督」也難以成效。且在發展黨員之時，也同時將範圍觸角伸入地方以達全面地監督，這些用意都是出於良善，然而章伯鈞的估計有正確也有失誤的一面。其認為毛澤東在整風之時已預料到後果如何，也印證了筆者先前的討論，[49]但是其認為毛澤東欲藉由民主黨派幫助整風以改善共黨的問題，卻忘了有些過去的「績業」是毛澤東無法去否定的。[50]

不論是什麼原因選定公開反右運動的日期，在 1957 年 6 月 8 日中共中央發出指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51]，且於《人民日報》上刊出〈這是為什麼？〉社論。在〈這是為什麼？〉裡說了：

> 國內大規模的階級鬥爭雖然已經過去了，但是階級鬥爭並沒有熄滅，在思想戰線上尤其是如此。……在"幫助共產黨整風"的名義之下，少數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領導權挑戰，甚至公然叫囂要共產黨"下臺"。他們企圖乘此時機把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打翻，把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打翻，拉著歷史向後倒退，退到資產階級專政，實際是退到革命勝利以前的半殖民地地位，把中國人民重新放在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反動統治之下。[52]

毛澤東於此已公開點燃戰火，這把火不僅燒向了章伯鈞，還擴散到幾十萬的知識份子身上。其將原本民主黨派的批評提升為思想上的階級鬥爭，並視為在向共產黨奪權，至此中共也不得不展開「反擊」了。而章詒和曾回憶起當天形容到：「讀後〔指〈這是為什麼？〉一文，引者註〕，父親傻眼了。氣不順、想不通的他，想找個人說叨說叨。他首先想到的是史良，當晚就找上門去。」[53]為此章伯鈞也不禁手足無措。

---

[48] 《人民日報》，1957 年 7 月 4 日，版 2。

[49] 李福鍾也提到：「毛澤東其實相當清楚基層的抱怨聲音，大鳴大放究竟會鳴放出什麼東西，完全在其掌握中。」詳見，李福鐘，〈關於「反右」起因的若干疑點與商榷——1956 至 1958 年中共政局再思考〉，《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期 27（2007 年 5 月），頁 81。

[50] 如邵燕祥曾提到毛澤東一定要肯定肅反的成績，不能因民主人士一罵就軟下來。詳見，邵燕祥，《別了，毛澤東：回憶與思考（1945-1958）》（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 340。

[5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共中央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冊，頁 284-286；毛澤東，〈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 496-498。

[52] 《人民日報》，1957 年 6 月 8 日，版 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這是為什麼？〉，《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冊，頁 289。

[53] 章詒和，《最後的貴族》，頁 13。

第二節　淪為人民公敵

關於在 1957 年 6 月 8 日前的情況在上一節已作了討論，而本節將對反右運動開始後的批判言論進行探討，其中政治鬥爭下的言論不論是否有其合理根據（如曾有人批評章伯鈞曾說過：「對一個人，只讓他住洋房、坐小汽車、穿呢制服、吃山珍海味，不許他獨立思考，也會引起革命的」[54]，進而被衍生成圖 1 中的章伯鈞手拿「兩院制」且乘著一輛「右派」車子，進而反諷在「獨立思考」的情況下卻不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圖 2 的「精彩」設計也是同樣道理)，都代表章伯鈞當時親歷過的一些實態，並且也反映出當時身為五十幾萬「人民公敵」之首的境遇。[55]

在反右運動開始的頭幾天，針對章伯鈞的批評聲浪還尚未充斥。目前看到最早的是在《人民日報》6 月 9 日刊出的北京大學何運華的言論，其言：「章伯鈞不滿意文字改革，有些人反對報紙橫排。但是，照我看來，他們表面上強調民族傳統，實際上反對一切新的東西。這才是古典教條主義呢！」[56]其將單純的文字改革問題，提高為新、舊意識之爭。時日，章伯鈞還在民主同盟的座談會上被中共的秘密黨員吳晗（1909-1969）點名批評：

> 章伯鈞說現在工業方面有許多設計院、政治方面就沒有。他要求由政協、人大、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組成政治上的設計院。這話是很難理解的。憲法序言中講到我國的統一戰線由共產黨領導。……各民主黨派也都承認共產黨對各民主黨派的領導作用。……現在國家的重大措施，都是經過各民主黨派討論的。人大、政協每年開會，人大常委會每月開會，章伯鈞參加了這些會議，他應該了解討論的情況。……章伯鈞還說國務院開會，常是拿出成品，要大家表示意見。他認為這樣的會是形式主義的。……開會確實有兩種不同的方法。一種是事先準備，徵求意見，然後拿出一套比較成熟方案由大家討論。另一種是英美議會式的。往往抓住一個問題長期辯論，了無結果。……總之，章伯鈞這樣提出問題，是不是對社會主義的政

---

[54] 《人民日報》，1957 年 6 月 13 日，版 3；中共瀋陽醫學院黨委整風辦公室編，《章伯鈞張百生等人言論集》，頁 6。

[55] 官方人數中的右派分子達 55 萬人左右，然實際人數可能多達百萬左右。參見，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頁 689-690；丁抒，《陽謀——「反右」前後》，頁 1；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 年），頁 436；李福鐘，〈關於「反右」起因的若干疑點與商榷——1956 至 1958 年中共政局再思考〉，《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頁 45。

[56] 《人民日報》，1957 年 6 月 9 日，版 2。同篇還提到：「陳銘樞先生關於取消學校黨委制的意見，我也有不同的看法。我認為，這樣下去，也許不久就有人會提出全面取消黨的領導的意見。這怎麼成呢？」鑑於報紙投稿與刊登日期，此文可能在 9 日以前就已出現，然而直到 8 日確定開始反右鬥爭後，才於隔天 9 日刊出，此時反右運動已經開始。

治方式不感興趣、有所懷疑呢？[57]

吳晗抓住了章伯鈞在 5 月 21 日座談會上的發言，批判尤以章伯鈞提到的「政治設計院」與形式主義的會少開為重點。其認為「政治設計院」的主張是一種不服中共領導的路線，前文已探討關於「政治設計院」的問題，即是否設立此機構應不是中共所關注的焦點，而為政策問題應先交由此機構討論。至於開會的問題雖涉及政治制度層面，然而反對事先經由中共討論再開會商討的手法，則被擴大解讀成反對社會主義與共產黨也不應感到意外。

章伯鈞面對這些批評一開始還沒料到其嚴重性。[58]因此才會在 6 月 10 日民盟中央的座談會上帶著一種平穩的口氣認為：

我的意見可能是大錯誤，也可能沒有那麼嚴重……一個人的講話不能保證都對，不對的自己說出來的時候總以為是對的。經過大家的批評、提醒，自己可以檢查一下，有那些不對，這對我是有幫助的，是好的。……中共中央統戰部開了十三次會，有七十三人發言，大家提了很多意見，都是批評，共產黨沒有覺得這是"圍剿"。現在，其他方面提出了不同的意見，這不能說是"圍剿"。否則，就是只許你批評，不許別人批評。人民日報的社論提出"要有積極的批評，也要有正確的反批評"，這是合乎情合乎理的。……關於對我提的意見，我不想辯論，因為那就太小氣了。我的意見可能是對抗黨的領導、損傷黨的領導權的大錯誤，也可能沒那麼嚴重。我說到政治上的設計院問題，設計是工程技術人員的事，不是居於領導地位的，也談到國務院的開會程式問題等，也許就我在政治生活中所處的地位，不適宜於提這些問題，也許我的話說得含糊。我決不辯護，不說言不由衷的話。

……

同意各方面對儲安平的批評。[59]

---

57 《人民日報》，1957 年 6 月 11 日，版 2。
58 章詒和，《順長江，水流殘月》，頁 50。
59 《人民日報》，1957 年 6 月 11 日，版 2。



圖 1：獨立思考的結果？

資料來源：《人民日報》，1957 年 6 月 20 日，版 2。在《順長江，水流殘月》一書中誤植為 7 月 20 日。參見，章詒和，《順長江，水流殘月》，頁 167。

資料說明：章伯鈞說：「一個人儘讓他坐小汽車，不許他獨立思考，也會引起革命的。」華君武繪製。



圖 2：「精采」設計。

資料來源：《人民日報》，1957 年 6 月 18，版 3。

資料說明：諷刺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主張。華君武繪製。

章伯鈞在此時刻仍認為事情沒有那麼嚴重，甚至還歡迎大家對他的批評。不過或許是由來已久的政治敏感度而對於領導權的問題進行了解釋，原本組織政治設計院的提議的確是一種政策上的考量，然而章伯鈞於此卻轉移焦點，解釋成只是「設計」上的問題而無關於領導層面，對此確實是在為先前的言論進行辯護。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章伯鈞在此次座談會上也認同了各界對儲安平的批判，帶有一種選邊站的味道，然而卻不知他人已將其與儲安平列為同類之列。[60]相隔不到一天的時間，在 11 日的《人民日報》上就刊載駁斥章伯鈞的檢討，其中提到：「民主黨派不但參加政權，而且得到了很大發展。……過去民主黨派是不是參加過基本立

[60] 此因章伯鈞在此次座談會上，針對他人的批評進行解釋與辯護，卻認同他人對儲安平的批評。

法呢？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不但是我們舉手通過，而且是我們參加製訂的。這不是明顯的駁斥了章伯鈞先生的論調麼？」[61]顯然事態的發展沒有在章伯鈞的預料之中。與此同時，11 日當天章伯鈞還收到一封長信，批評其 10 日的發言是「怕死」、「要做官」、「投降」，因此章伯鈞才「了解事情的嚴重……有人要利用我們資產階級思想的弱點，來反對共產黨」[62]，於此態度開始有所轉變。

到了 6 月 13 日章伯鈞發表〈我在政治上犯了嚴重錯誤〉[63]一文，坦言在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上犯了思想上的嚴重錯誤，其言曰：

> 5 月 22 日，我在中國共產黨中央統戰部召集的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座談會上的發言，思想上犯了嚴重的錯誤，各方人士已經提出嚴正的批評，其中最錯誤的，就是所謂"政治設計院"和國務院開會的"成品"問題以及文字改革問題。這說明瞭我的立場不穩，認識模糊，以十分不嚴肅的自由主義態度，對待國家的政策，以致造成政治上的不良影響，為右派分子所利用。我初步檢查結果，認為這是由於我幾年來學習不夠，我的資產階級思想意識沒有得到改造，因而思想跟不上國家新形勢的發展，以致犯此錯誤。[64]

不僅如此，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後，受到 7 月 1 日毛澤東在《人民日報》社論上公開點名影響下[65]，章伯鈞又針對「六六六」教授會議上的發言進行檢討：「我在一次六教授座談會上所說的計委門口貼大字報的話，是由於我站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立場，道聽途說以無當有不符合事實的極端錯誤的污衊黨的言行，……我感到萬分痛悔，我現在發表這個更正聲明並向他們請罪。」[66]起先對於政治設計院、形式性開會等問題還曾作過辯護，並認為還處於「批評與反批評」的態勢，至此章伯鈞公開表示錯誤且承認被右派分子所「利用」後，更多的政治鬥爭下的批判言論蜂擁而來，限於篇幅且無關文論的進行故不一一討論。

然而還有一個問題應該解決與探討，即單就鳴放期間北京地區的言論來看，儲安平曾說的：「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從而形成了現在這樣一個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認為，

---

61 《人民日報》，1957 年 6 月 11 日，版 3。

62 《人民日報》，1957 年 6 月 18 日，版 3。

63 章詒和，《順長江，水流殘月》，頁 52、99。章詒和在此引用 6 月 13 日《人民日報》，但需特別說明的，〈我在政治上犯了嚴重錯誤〉一文實際刊登日期是在 6 月 14 日而不是 13 日。

64 《人民日報》，1957 年 6 月 14 日，版 2。

65 雖然事後在《毛澤東傳（1949-1976）》中說：「事實證明，這些批評並不能成立」，然而這也指「章羅同盟」這一點不能成立而已。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頁 711。

66 《人民日報》，1957 年 7 月 7 日，版 2。

這個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67]更顯得再向共產黨「奪權」，朱正也認為儲安平的發言是「當年右派分子向共產黨猖狂進攻的代表作」[68]，然為何毛澤東會說：「整個春季，中國天空上突然黑雲亂翻，其源蓋出於章羅同盟」[69]，造成章伯鈞擠身為「章羅聯盟」[70]的頭面人物，此應於幾個方面來討論。

第一，筆者認為 6 月 14 日是一個轉折點，從 8 日開始到 14 日章伯鈞是以右派身份遭受檢討，而批判焦點如前文所述是集於章伯鈞提出的開會問題與「政治設計院」上，然而到了在 6 月 14 日毛澤東首先點名批評《光明日報》與《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後[71]，在 15 日與 16 日兩天《光明日報》社務委員連續開會，章伯鈞在會上認為要對儲安平在光明日報的工作負政治責任，並聲明儲安平以《光明日報》總編輯名義發表的言論，事先沒有看過。[72]也因此要求儲安平應「作很好的準備，向真理投降，承認錯誤，把責任擔當起來。資產階級思想，我們都有，然而可以改正。」[73]從職等上的關係來看，章伯鈞身為《光明日報》的社長而儲安平為其總編輯，章伯鈞連帶地遭到檢討不應意外。只不過到了 16 日，章伯鈞還說了：

> 今天這樣的會，檢查毛病，不但對光明日報有好處，對我們三人〔指章乃器、儲安平和章伯鈞，引者註〕，也有好處。……有人說儲安平的"黨天下"擊中了要害，這是指其嚴重性來說的。我看，你昨天說我是"投降將軍"，倒也是擊中了要害，思想上的要害。……有人說我兩面，我看我還不止兩面，還多一面。有資本主義思想的一面，也有社會主義願望的一面。另外還有封建思想殘餘的一面。……古人說"四知"是假的，我想只有一知，自家心事自家知。我在整風運動中有錯誤，我願意承認錯誤，乘此機會改正。我和儲安平思想上有共同性，但人事上素沒有聯繫。[74]

章伯鈞不僅提到其兼具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封建思想的性格，且談到與儲安平具有思想上的共通性，雖然章伯鈞沒有清楚點明，但已可以看出此思想上的要害

---

67 中共瀋陽醫學院黨委整風辦公室編，《章伯鈞張百生等人言論集》，頁 31。

68 朱正，《兩家爭鳴——反右派鬥爭》，頁 141。

69 毛澤東，〈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 530。

70 有研究指出最早的用法是在 7 月 1 日毛澤東撰寫的〈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中提出「章羅同盟」一詞，然而胡愈之為避免旁人將「章羅同盟」同中國民主同盟視為同義詞，而改稱「章羅聯盟」，後來的批判文章幾乎全採用「章羅聯盟」這個提法。參見，朱正，《兩家爭鳴——反右派鬥爭》，頁 216-217。

71 毛澤東，〈文匯報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 508。

72 《人民日報》，1957 年 6 月 18 日，版 3。

73 《人民日報》，1957 年 6 月 18 日，版 3。

74 《人民日報》，1957 年 6 月 18 日，版 3、中共瀋陽醫學院黨委整風辦公室編，《章伯鈞張百生等人言論集》，頁 10。

與共通性指的是皆具有資產階級的思想，[75]這也是章伯鈞自己承認錯誤並檢討過的。此外，也可看出章伯鈞欲撇清儲安平的「黨天下」發言與其有關。行文至此可以確定的，從 8 日至 16 日這段期間章伯鈞是以資產階級思想意識沒有改造好這點做出辯解，然而卻沒預料到更嚴重的揭發批判接踵而來。

第二，除了第一點提到的章伯鈞與儲安平職等上這層關係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導致即使章伯鈞指出「黨天下」發言與其無關，然而在 7 月 1 日時被毛澤東比喻成「章羅同盟」在興風作浪。此因在這段時期內，不少農工黨即第三黨的中下層人士揭發章伯鈞在中共建國前的一些言論與行動。

農工黨王深林在 6 月 26 日曾說到:「章伯鈞在我 1942 年加入農工民主黨時，告訴我：農工黨本來是一半反蔣，一半反共，二全大會以後就完全跟共產黨走，要我好好工作，可是，章伯鈞背地裡卻仍然幹反共的勾當」[76]，此外王人旋也提及:「解放前，章伯鈞的主張是在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鬥爭中求發展，希望國民黨倒而不倒，他來“漁翁得利”。」[77]兩人點出章伯鈞在 1949 年以前的兩面手法，此在第二章時有概略提及。而張雲川說得更是直接:「解放前，當民盟被迫解散時,在上海我和章伯鈞坐三輪車到張瀾家裏去,路上我向他說:看今天報上消息,解放軍在山東有一仗打的吃虧了。章伯鈞怎麼說？他說：吃點虧也好，這樣可以使和談更快一點。」[78]章伯鈞認為只要國、共兩黨之間沒有判出高下，進而和談才會有第三勢力存在的空間。而謝維漢在座談會上指出:「他們(共產黨)不行，我們要幹下去,我們第三黨人要有這種抱負,中國這麼大,我們也可以搞幾個省。」[79]而李伯球的言論中對章伯鈞想要共分天下的念頭說的十分詳細：

> 1948 年在章伯鈞北上前，正是解放戰爭勝利的前夕，我黨召開了中央擴大會議，通過了政治決議。但他仍然違反這個決議，作軍事上的佈置，企圖在長江以南抓一把，作為政治資本。臨行前一天找我到半島酒店談了半天，他說“我已經和各友方商約，編幾十萬軍隊。計劃閩贛由第三黨搞，鄂湘桂由某友方搞，廣東為共同的基地，……他並預料蔣介石在美國支持下可能仍保有江浙。他認為，這樣就可以和中共組織聯合政府了。此次北行就是與某友方代表去和中共談判。他這種三分天下的軍事投機，害得我

[75] 章伯鈞在此說的與儲安平沒有人事上的聯繫，指的應是儲安平發表「黨天下」的相關言論，並沒有事先與其討論。而章伯鈞說自己有「思想上的要害」，指的是思想上有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的一面，也暗指了儲安平的「資產階級思想」。

[76] 北京市工會聯合會、北京市學生聯合會編,《關於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章乃器、龍雲、黃紹竑的材料》(出版地不詳:北京市工會聯合會、北京市學生聯合會編印,1957 年),頁 3。

[77] 《人民日報》,1957 年 6 月 18 日，版 2。

[78] 《人民日報》,1957 年 6 月 20 日，版 2。

[79] 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執行局編印,《章伯鈞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頁 7。

> 黨不少同志在解放後仍有敵我不分的錯誤。他在北上途中船上聽到濟南解放的廣播時，知道此行的目的達不到了（他自己追述的）。到了哈爾濱後，他卻寫信給留港部分中委，大意說："我到哈後，深悔此行，此間無事可為，我很懷念香港，仍想設法回到香港來。"1949 年 3 月，我來到北京時，他又對我說，"我的主張沒有錯，所差的只是沒有上山，如果上了山的話，那我們也有了總司令。"[80]

上述言論中充滿了章伯鈞的兩面手法，簡而言之，其當初設想的狀況在於既使中共已取得華北、東北的勢力後，短期內不會立即揮兵南下，且美國會對國民黨援助並保有剩餘江山。如同第二章談到的，這帶有檯面上要求的民主和談以維持第三勢力地位，同時在私底下隨着戰事發展須保有或組織第三黨的軍事力量，如此一來不論國、共兩黨之間是打、是談，章伯鈞都能保有活動的空間。除了這種「三分天下」的想法外，章伯鈞還被書面材料指控與「臺灣民眾聯盟」有所牽扯，還接受其經濟上的支助。[81]此說法是否屬實就不得而知了。

章詒和認為其父親堅持中間路線的政治主張，堅守第三黨地盤，是章伯鈞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思想根源和歷史根源。[82]然而這說法十分隱諱，實際的情況在上段已有說明，章伯鈞這種情況與例子，其實也就似於中共建國初期鎮壓反革命運動下的漏網之魚，只不過因章伯鈞身為民主人士，又具有民盟副主席和農工黨黨主席、以及《光明日報》社社長的背景，更重要的是章伯鈞又是開國之初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政務委員、交通部部長的多重身份，鎮反運動難以涉及其身。而對於毛澤東來說，章伯鈞在建國前的行徑也應不難察覺，既使是等到揭發材料散諸各報章書籍後才發覺，也足以認為開門整風的這段時間是章伯鈞在搧風點火，於是在 7 月 1 日時將莫須有的罪名「章羅同盟」套用在章伯鈞身上，並認為「階級敵人是一定要尋找機會表現他們自己的。他們對於亡國、共產是不甘心的。」[83]至此可了解到，毛澤東合於情理地判斷出章伯鈞因資產階級思想作祟而對中共建國後是「黨天下」的局面不滿，並看出章伯鈞對當時無法共分天下之憾，與儲安平相較，可說是罪上加罪。於此需注意的是，章伯鈞此事件不能與內戰期間起義與投降的國民黨將領相提並論，其原因除了章伯鈞特殊的民主人士身

[80] 《人民日報》，1957 年 6 月 20 日，版 2。

[81] 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執行局編印，《章伯鈞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續集（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57 年），頁 8。

[82] 章詒和，《順長江，水流殘月》，頁 74。

[83] 毛澤東，〈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 532。沈志華也提及：在權力鬥爭中，毛澤東最敏感、最警惕的就是有組織有計劃的活動，無論是在黨內或黨外。參見，沈志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三卷：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1956-1957）》（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 年），頁 613。

份與第三黨背景外，還有一點即其表面合作的態度，然而心理並未坦然歸順中共，此心理或許屬於常態，但在反右開始後被揭露出有實際從事軍事行動且與下文將討論的「六六六」教授會議結合來看，章伯鈞在毛澤東眼裡就不能與原國民黨將領等同視之。

第三，就是「六六六」教授會議所造成的影響。沈志華曾提到在 6 月 6 日的《內部參考》中就已披露農工黨黨員積極做發展工作，其發展的對象都是被中共鬥過的人，而「六六六」教授會議則將情勢推演得更為嚴峻。[84]沈志華還認為，不論在 6 月 6 日會議當天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章伯鈞的確想要幫助中共渡過難關，從而為民主黨派爭取更大的權力和地位。此舉在毛澤東眼裡和中共是最忌諱的，是乘人之危。[85]此論點大致合理，然而錢理群認為：「在毛澤東看來，這顯然是一個信號：上層的民主黨派右派正準備利用學生把事態擴大到社會，煽動工農鬧事，逼自己動用三百萬軍隊用武力解決，那就真正不好收拾了。這是毛澤東的一個底綫。」[86]於是原本 15 日前後要公開反右的，面對此局勢下又發生了「盧郁文事件」[87]，因此朱正與錢理群認為反右時間點才被提前拉到 8 日上演。[88]不過，「六六六」教授會議的會議紀錄是在 7 月 4 日才被揭發的，且在毛澤東 6 月 8 日發佈視為反擊右派的號角〈這是為什麼？〉一文中，通篇沒有提到關於「六六六」會議的消息，且明顯是以 6 月 6 日的「盧郁文事件」為機會發動。故毛澤東是否在 6 月 8 日前就已經知道「六六六」會議的消息了值得商酌，且即使是後來章伯鈞曾提到的：「7 日，國務院開會。史良對我說，前一天晚上已和周總理談了，總理未置可否，她叫我再和總理談一談。在會上，我寫了條子給總理，說情況很嚴重，談話的人的態度頗為誠懇等等。總理也未表示可否。」[89]可以看出章伯鈞與史良告訴周恩來的是當前社會的嚴峻問題而已，更不可能親口告訴周恩來說民主黨派要大大發展或是爭取更大的權力和地位來幫助共產黨，甚至不是交代了整個「六六六」會議內容，因此筆者對朱正的「提前的原因，也就是在 6 月

---

84 沈志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三卷：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1956-1957）》，頁 613。

85 沈志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三卷：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1956-1957）》，頁 614。

86 錢理群，《拒絕遺忘："1957 年學"研究筆記》（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 68-69。

87 盧郁文為民革中央委員，在 5 月 25 日民革中央擴大會議後，於 6 月 6 日收到匿名恐嚇信。6 月 7 日上午吳冷西在與毛澤東聚會中聽到毛澤東說匿名信是反擊右派的好機會，且過去幾天一直思考何時反擊，現在顯然是一個機會，因為是匿名的信件、攻擊的又是黨外人士。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頁 703-704；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斷》（北京：新華出版社，1995 年），頁 39-40、42；《人民日報》，1957 年 6 月 7 日，版 2。

88 錢理群，《拒絕遺忘："1957 年學"研究筆記》，頁 67-68；朱正，《兩家爭鳴——反右派鬥爭》，頁 172。

89 《人民日報》，1957 年 7 月 4 日，版 1。

6 日這一天，發生了另外一件沒有預料到的事情。〔指『六六六』教授會議，引者註〕」[90]之說法持懷疑保留態度。

另外需要說明的，不僅是沈志華、朱正、錢理群或其他的研究，都忽略或遺漏一件事實，即如上段所說的「六六六」教授會議當天的紀錄稿是在 7 月 4 日的《人民日報》上由當時在場的閔剛侯所揭發，然而對外首次出現「六六六」會議的言論內容是早在前三天 7 月 1 日毛澤東為《人民日報》撰寫的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就已提到此次會議的內容，甚至在 4 日的揭發中還特別註明：「本報七月一日社論曾提到六月六日章伯鈞向北京六教授作了一次利令智昏的對目前形勢的估計。這篇文章就是對這次會議的記述。」[91]如此得出的結論是：在閔剛侯 7 月 4 日刊載揭發文章前，毛澤東與中共高層早已獲悉「六六六」會議的訊息，因此不論是沈志華提到關於 6 月 6 日的《內部參考》內容，或是民盟當天召開的六教授會議，都促使毛澤東在 7 月 1 日發表反擊民盟與農工黨的社論。[92]不過，閔剛侯所揭露的「六六六」會議發言紀錄，不論是否在 6 月 8 日反右運動開始前或 7 月 1 日發表〈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一文前就已傳入毛澤東耳裡，都只是徒增毛澤東在 7 月 1 日將章伯鈞定罪為「章羅同盟」的一份材料，因為此時的毛澤東已經認為章伯鈞要藉著中共「犯這樣多的錯誤」[93]與學生問題來向共黨奪權，並指責章伯鈞是「到處點火可以煽動工農，學生的大字報便於接管學校，大鳴大放，一觸即發，天下頃刻大亂，共產黨馬上完蛋。」[94]

綜合前文分析與上述三點來看，雖然章伯鈞在大鳴大放期間發表的言論之火力遠不及於儲安平的「黨天下」要猛烈，另與章乃器（1897-1977）、羅隆基等民主人士的「有職無權」的意見不相上下，[95]然而在反右期間被揭露出數年前的「三分天下」想法就顯得格外令人注目。因此，如果 6 月 8 日是全面打擊右派的話，7 月 1 日就是抓出其中的首領。此因從 5 月 15 日〈事情正在起變化〉黨內傳看開始到 6 月 8 日以前毛澤東就在抓把柄反擊右派，而在 6 月 8 日反右運動後揭發

---

90 朱正，《兩家爭鳴——反右派鬥爭》，頁 172。

91 《人民日報》，1957 年 7 月 4 日，版 2。

92 不過如果指得是中共將開門整風轉為反右運動，其時間點就提早到 6 月 8 日《人民日報》上刊出的〈這是為什麼？〉。

93 《人民日報》，1957 年 7 月 4 日，版 2。

94 毛澤東，〈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頁 532。

95 章乃器曾說：「要解決有職有權問題，必須克服宗派主義思想，這樣就首先要明辨是非，把明辨是非放在第一位，把利害關係、感情關係放在第二位。」參見，《人民日報》，1957 年 5 月 9 日，版 1；而羅隆基在 5 月 22 日座談會上提到：「黨員固然有責任，機構也有問題。他說，他在森林工業部裏面是有職有權的，但是部以上有國務院的八個辦公室，有國家計劃委員會和國家經濟委員會，另外還有黨中央的各部，你這個部沒有法子有權。很多事情都是從上往下貫徹，往下交任務」，參見，《人民日報》，1957 年 5 月 23 日，版 1；中共瀋陽醫學院黨委整風辦公室編，《章伯鈞張百生等人言論集》，頁 29-30。「有職無權」的問題在整風期間成為一項「熱門」的議題，文中不再一一條列。

出來的上述第二點（根據前三章的討論，於此毛澤東知悉章伯鈞的兩面手法：即檯面上的民主要求尋求政治舞台、檯面下的武裝力量望求「三分天下」，甚至包含中共早已瞭解的第三黨與章伯鈞素來不認同中共的策略路線、以及親附蘇聯的手法）與第三點合起來解讀，毛澤東當然要抓住章伯鈞這條「漏網之魚」[96]，這也是章伯鈞會被扣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主要原因之一。附帶一提的，朱正也談到當年那些為章伯鈞抓武裝的人，都在反右運動時被劃為右派。[97]

在 1957 年 6 月 18 日時，民主同盟徹底清算章伯鈞的歷史問題，章詒和形容其父親時說到：「父親感受到的是一個世界的顛覆，劍一樣鋒利，鉛一般沈重。章伯鈞明白了：自己已然被推入毛澤東掀起的政治狂瀾的中心。」[98]十天之後，章伯鈞即遭到撤除盟內職務，並被要求作出檢討。[99]然而章伯鈞不斷地反覆檢查與交代都過不了關，甚至到了被要求從幼年時期開始寫起檢討。[100]直到隔年 1 月 26 日，民盟正式將章伯鈞與羅隆基等人劃為右派分子，宣告了政治生命的終結。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不僅家裡遭到紅衛兵的佔據，還不時要接受革命群眾的批判，[101]直至 1969 年病逝。

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章伯鈞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材料已被推倒，然而沒有平反改正，保留了右派的身份。關於這點李福鍾曾提到：

> 既然右派分子的進攻「極為猖獗」、「極為狠毒」，那麼把這些毒草鋤了當肥料，也就順天應人了。這是中共至今不願承認反右鬥爭在政策上犯錯，只願承認「錯在擴大化」的最根本理由。同時，對右派分子的「摘帽」只稱之為「改正」，而不是「平反」，原因亦在於此。[102]

章伯鈞作為右派的指標性頭面人物，在 1980 年時更不可能受到平反。儘管如此，章伯鈞之妻李健生（1908-1990）在一次政協會議後告訴章詒和說：「在政協會上，見我而落淚的人有兩個。一個是千家駒，另一個你猜是誰？……是李維漢。想不

---

96 李福鍾的研究認為：「毛澤東為奪取黨內財經政策的最終決策權，策動了整起反右運動」，那與本研究的結果來看，章伯鈞則成了附帶的收穫了。參見，李福鐘，〈關於「反右」起因的若干疑點與商榷——1956 至 1958 年中共政局再思考〉，《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頁 87。

97 朱正，《兩家爭鳴——反右派鬥爭》，頁 220。

98 章詒和，《順長江，水流殘月》，頁 55。

99 章詒和，《順長江，水流殘月》，頁 57-58。

100 章詒和，《順長江，水流殘月》，頁 73。

101 章詒和，《最後的貴族》，頁 22。

102 李福鐘，〈關於「反右」起因的若干疑點與商榷——1956 至 1958 年中共政局再思考〉，《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頁 54。有研究指出：關於摘掉帽子，維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的，在中央一級中有五名（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彭文應、陳仁炳）、地方上有九十多名，不足原戴帽子的萬分之二，以支持反右運動只錯在擴大化而已。詳見，戴晴，《毛澤東黨天下野百合花》，頁 132-133。

到吧？他說到伯鈞時，臉上清淚兩行。」[103]李維漢會有如此激烈的反應之原因為何，章詒和沒有說明。不過與章伯鈞在 1957 年後的政治轉折應有一定關聯，至於能不能解釋身為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的李維漢與 1957 年中共的風向轉變有無關係，則無從得知。然也多少可以反映出當時代的知識份子甚至是身為黨員的無奈。章伯鈞的長子章師明就曾回憶到：「一直到死，父親不斷地和我談論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每次談及都無比激動，無比痛心。」[104]激動的章伯鈞與李維漢都陷入當時代的知識份子命運。而從章伯鈞 1895 生年之始，至文化大革命而亡，期間中國局勢紛擾不已，也沒入了歷史洪流之中。

[103] 章詒和，《這樣事和誰細講》（臺北：時報文化，2009 年），頁 106-107。
[104] 江耀進，〈章師明談父親章伯鈞〉，《中國工商》，期 11（2003 年），頁 127。

結　論

一般地認為在中共建國前存在的第三勢力運動中，章伯鈞夫唱婦隨成了中共遙控的民主人士，而到了 1949 年後則因有職無權成了政治花瓶，甚至到了反右運動時被打為右派首腦，卻沒人細明其由來經過與實際情況。本論文研究的重點在第二章與第四章，然而觀看本研究的討論步驟就可發現，從首章開始便是環環相扣，有些是基礎背景問題，有些是重要相關問題皆必須深入探究，畢竟從「民主人士」到「人民公敵」如此劇烈的轉變一定事出有因，不能一概地推責於政治運動的無的放矢。然本論文並非為傳統的人物史研究，亦非為人作傳那樣地鋪陳人物的諸種事蹟筆筆交代。影響論文結構走向的重要因素，無可諱言的在於資料來源受限問題，章伯鈞個人未留有文集或日記可供後人探悉，這也造成筆者研究進行之初一直裹足不前的原因，然而回歸到研究的問題意識時出現一條可追尋的方向，此即章伯鈞的政治轉折，筆者將焦點著重於成為民主人士與中共建國後的右派身份上，此兩項轉變可謂為論文的中心所在，也可以說是兩個事件的集合體，然兩部份並非毫無關聯，而是有著緊密的關係，兼而論之可發現許多以往疑點中的端倪。此外，也可就所能掌握的資料有據地解決章伯鈞的政治轉折。

第一章主要說明章伯鈞於 1949 年前行動的依歸點，並延伸出章伯鈞在鄧演達為第三黨立下的政治思想中究竟傳承了甚麼，顯然的這些反蔣與對中共的不認同思想成為章伯鈞的一個重要面向。而需要說明的，本論文最早從第二章著手，但卻只能瞭解章伯鈞是受到國、共兩黨間一推一拉才逐漸靠攏中共，然而卻無法查明為何章伯鈞仍欲發展軍事力量。爾後隨著更多資料的參考與細部地論證，結合第一章與第二章來看，章伯鈞雖然不是在第三黨發展之初就居於主導地位，然而隨著黃琪翔身繫於軍事事務中且章伯鈞不斷以第三黨的名義遊走於政壇之間並成為實際負責人，於是第三黨與第三勢力成了其生涯的政治資本，但不能忘了第三黨的政治理念帶有濃厚的反帝國主義、反蔣色彩，並且對於共產黨也不無好感，共有的是對於社會主義的憧憬。由此來看，在西安事變之後限於時勢所驅，章伯鈞雖無法高喊反蔣或是再次引發內戰割據，並隨著戰事演變民主黨派與第三勢力成為政壇上一股不容忽視的輿論力量，然而這只是章伯鈞其中一面的作法而已，其另外一面是仍未放棄構築自身的軍事實力，甚至到了內戰爆發後還妄想中國出現「三分天下」的局面，顯示出章伯鈞並未一開始就打著誠心依附某一方的算盤，因此當章伯鈞響應新政協口號並進入中共勢力範圍後，會感到無事可作灰心之樣。這說明了章伯鈞從鄧演達時代的第三黨開始就呈現了一貫地反蔣心理，而對於中共從一開始的反對其暴動路線的策略手法與背後的第三國際勢力，演變到後來與中共成為在野的「盟友」，而私底下卻望於三者鼎立的局面，呈現出了

第三黨一開始的「第三」色彩。

中共建國以後考量於民主黨派聯繫其各自的勢力與團體，對這些民主人士給予政治上與生活上「包下來」的待遇，然而以往研究卻簡化了兩方心理。中共雖然在名義與實際上成了領導者，然也應深知給予上層民主人士名器無法足以了事，此從建國之初即已不斷出現針對黨內關門主義作風的檢討層出不窮就可發現。當然本研究無從得知毛澤東是否誠心欲解決有職無權的問題，然而中共對於統戰工作的檢討從未間斷是個事實，甚至到後來知識份子問題會議召開的背景因素也是欲調動知識份子的積極性與力量而促成。經過第三章的討論可以發覺不論中共上層如何呼籲改善有職無權，制度上的缺陷是一個解不開的死結，此因中共在各方面緊握住領導者的地位的基本條件，與改善有職無權成了兩方衝突與矛盾的基本點。因此從 1950 年引發毛澤東關注的章伯鈞所在的交通部黨組問題開始（或是更早）到反右運動前夕，制度上造成的有職無權與中共的改革呼聲相伴相生。

本論文之所以會在第三章特別探討有職無權的問題，實與鳴放運動期間的批評聲浪有關。就如同章伯鈞的看法，在鳴放期間會出現甚麼批判言論，毛澤東不會完全沒有個底，畢竟中共中央關注這個問題延宕有七年左右，而章伯鈞在鳴放期間與統戰部座談會上的發言，大體來說也在有職無權的問題框架之下。然在反右運動中包含章伯鈞在內的這批知識份子紛紛中箭落馬，撇開反右運動的起因不談，只是因為章伯鈞批評連中共中央都知道的有職無權的老問題就成了右派首腦嗎，儲安平評論中共是「黨天下」不是更直接地切中問題要點。藉由第三章的討論，可以得知中共對於有職無權問題的掌握度，也可以瞭解章伯鈞的發言事出有因，而論文的最後一章則探討為何章伯鈞針對有職無權的批評卻成為人民公敵的「章羅同盟」之首。

根據第四章的分析可得知章伯鈞在鳴放前後的發言狀況，雖足以構成戴上右派帽子的因素，然而筆者進一步探悉章伯鈞之所以在反右運動已進行將近一個月時又被毛澤東扣上「章羅同盟」頭號大右派的帽子的原因。而以往的研究多沒有仔細考證時間因素而認為了「六六六教授會議」促使毛澤東將反右的時間點提前，然而筆者分析毛澤東在〈這是為什麼？〉以至於將近一個月後發表的〈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這中間的變化，尤其是從內容上來看在宣告反右運動時只引用「盧郁文事件」為開啟反右的口實，甚至沒有點到章伯鈞的名字，然而在〈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裡可以看出毛澤東對於章伯鈞與右派份子憤怒之深，已不能與〈這是為什麼？〉發表時的語氣相提並論。於是筆者檢討期間轉變的原因，章伯鈞成為人民公敵之首，除了與儲安平共同檢討出具有資產

階級思想傾向以及在《光明日報》社內的職等關係外，還可區分成「新、舊帳」兩項。舊有的問題是在反右期間（此時〈這是為什麼？〉已經發表了）被揭發出章伯鈞在中共建國前有欲與中共、國民黨抗衡並三分天下的想法，此問題不論毛澤東得悉的時間點何在，一旦與論文前兩章討論的第三黨政治思想中一貫的反對蘇聯影響他國革命內容與反中共早年的武裝暴動路線相結合，問題具顯得格外劇烈；而「新帳」方面，是為反右運動開始後被揭露出的「六六六教授會議」中章伯鈞欲大力發展民主黨派，並認為中共解決不了問題需由民盟來幫助中共，以及《內部參考》中指出農工黨員積極發展被中共鬥爭過的對象，此事件導致毛澤東認為章伯鈞對中共統治有所不滿並試圖改變現狀「煽風點火」使天下大亂。兩者合論促使毛澤東有理由將這個身兼民盟副主席、農工黨主席、《光明日報》社長、交通部部長的民主人士列為人民公敵之首。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當初在中共建國前替章伯鈞搞軍事活動的第三黨員也紛紛在反右期間被打為右派。

一般在討論政治運動下的受害者時，多著墨於政治運動起因、發難經過以及後期的心理感受，然而囿於鬥爭批評中常出現無限上綱上限或是無的放矢，與焦點集於上位者的政治鬥爭內容，導致鮮有注意歷史因素與批判內容的直接關係。此外，本論文非專門探討反右運動的研究，因此章伯鈞在 1957 年 6 月成為右派份子是一項既成事實，筆者目的是釐清出在鳴放期間的發言與其他右派份子不相上下的情況下，毛澤東為何加重其罪名。藉由章伯鈞的例子可以發現，既使一開始是其他緣由誘發鳴放與反右運動，然而撇開其中刻意扣上他人罪狀的「帽子」外，還有的是的確存在的批判因素。從長遠因素來看，章伯鈞政治生涯中的第三黨背景與不甘為孺子牛的心理，以及實際籌劃三分天下的舉動，與近期裡的鳴放期間公開對有職無權的發言與私下盟內、第三黨內的大力拓展組織行為相結合，會遭到鬥爭甚至被毛澤東視為幕後搗亂的主使也就其來有自。因此即使「章羅同盟」實為硬扣上的帽子，兩人政治立場不合，也可看成毛澤東收網的名目了。

徵引資料

一、檔案與史料彙編

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中央人民政府法令彙編（1949-1950）》，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政黨制度研究中心、九三學社廣西區委會、廣西社會主義學院編，《多黨合作重要文獻選輯——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論多黨合作》，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2007。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一九三九——一九四〇）》，第十二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一九三六——一九三八）》，第十一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一九三四——一九三五）》，第十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中央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寫，《中國農工民主黨章程》，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8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四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五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六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八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九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

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周恩來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中共中央統戰部研究室編，《歷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概況和文獻》，北京：檔案出版社，1988。
中共瀋陽醫學院黨委整風辦公室編，《章伯鈞張百生等人言論集》，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57。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五星紅旗從這裡升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誕生記事暨資料選編》，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4。
中國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中國民主同盟歷史文獻——1941-1949》，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3。
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執行局編印，《章伯鈞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57。
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執行局編印，《章伯鈞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續集，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57。
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中國農工民主黨歷史參考資料》，第一輯，醞釀建黨時期，出版地不詳：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1。
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中國農工民主黨歷史參考資料》，第二輯，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時期，出版地不詳：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2。
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中國農工民主黨歷史參考資料》，第三輯，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時期，出版地不詳：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出版年不詳。
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中國農工民主黨歷史參考資料》，第四輯，中國農工民主黨時期，出版地不詳：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出版年不詳。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
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五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北京市工會聯合會、北京市學生聯合會編，《關於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章乃器、龍雲、黃紹竑的材料》，出版地不詳：北京市工會聯合會、北京市學生聯合會編印，1957。
石人編寫，《章羅聯盟罪行錄》，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下冊，臺北：國史館，2007。

李春林主編，《光明日報歷任總編輯文選》，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9。
周天度、孫彩霞編，《救國會史料集》，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
周天度編，《鄧演達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邱錢牧、林浣芬等，《民主革命時期的民主黨派》，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海天出版社編，《現代史料》，第一集，出版地不詳：海天出版社，1933。
海天出版社編，《現代史料》，第四集，出版地不詳：海天出版社，1935。
陳伯達，《人民公敵蔣介石》，臺北：一橋出版社，1998。
傅敏編，《傅雷家書》，香港：三聯書店，2006。
福建省檔案館編，《福建事變檔案資料（1933.11——1934.1）》，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
鄧演達，《鄧演達先生遺稿》，上海：上海書店，1990。
薛謀成、鄭全備選編，《"福建事變"資料選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
譚平山，《第三黨政綱 ： 中華革命黨宣言》，Moskva: Izdatel' stvo KUTK，1929。

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

吳淑鳳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民國 21 年 6 月至 7 月）》，第 15 冊，臺北：國史館，2004。
王宇高編，《民國二十一年之蔣介石先生》，〈文物圖書〉，民國 21 年 7 月 24 日。
〈吳鐵城電蔣中正據報蔡廷楷反對第三黨秘密改編共匪謀取潮梅，偽府內部遂起糾紛〉，民國 22 年 12 月 7 日，特交文電，檔號：002080200137038。
〈又據戴笠報稱民主同盟因國民參政會席次問題發生裂痕〉，民國 34 年 5 月 1 日，文物圖書，檔號：002060100200001。
〈葉鎮宇函蔣中正中國民主同盟聽取黃炎培等報告赴延安與共黨毛澤東晤談及受歡迎情形暨民盟之立場等〉，民國 34 年 7 月 1 日，特交文電，檔號：002080200301070。
〈蔣中正主持中樞紀念週，國民政府委員陳其采、主計長徐堪等於週會中宣誓就職〉，民國 35 年 11 月 11 日，文物圖書，檔號：002060100218011。

二、回憶資料與年譜

千家駒，《從追求到幻滅——一個中國經濟學家的自傳》，臺北：時報文化，199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委員會編，《鄧演達》，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
牛漢、鄧九平主編，《原上草：記憶中的反右派運動》，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
包惠僧，《包惠僧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朱宗震等編，《陳銘樞回憶錄》，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
江迅，〈叫右派父親太沈重〉，《亞洲週刊》（1997 年 6 月 16-22 日），頁 44-45。
江耀進，〈章師明談父親章伯鈞〉，《中國工商》，期 11（2003 年），頁 126-127。
吳冷西，《憶毛主席 ： 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斷》，北京：新華出版社，1995。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
周伯萍，〈我在糧食部十二年〉，《黨史博覽》，期 4（2007 年），頁 14-20、26。
張發奎口述、夏蓮瑛訪談紀錄、鄭義翻譯校註，《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香港：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
陳正茂編，《左舜生年譜》，臺北：國史館，1998。
陳正茂編，《曾琦先生年譜》，臺北：國史館，1996。
章詒和，《一半烟遮，一半雲埋》，香港：星克爾出版，2007。
章詒和，《這樣事和誰細講》，臺北：時報文化，2009。
章詒和，《最後的貴族》，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
章詒和，《順長江，水流殘月》，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
章詒和編，《章伯鈞年譜（1946-1949）》，未刊稿。
蔣廷黻英文口述，謝鍾璉譯，《蔣廷黻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4。
鄭建邦、胡耀平整理，《我的戎馬生涯——鄭洞國回憶錄》，北京：團結出版社，2008。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
關愚謙，《浪——一個叛國者的人生傳奇》，臺北：寶瓶文化，2003。

三、專書

丁抒，《陽謀——「反右」前後》，香港：九十年代雜誌社，199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研究室編，《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農工民主黨（1930——1945）》，無出版項，內部研究資料。
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中國農工民主黨的奮鬥歷程》，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
民革中央《中國的參政黨》編寫組編，《中國的參政黨》，北京：團結出版社，2006。
朱正，《兩家爭鳴——反右派鬥爭》，臺北：允晨文化，2001。
吳明剛，《1933：福建事變始末》，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呂實強，《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一八六〇——一八七四）》，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
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臺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6。
沈志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三卷：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1956-1957）》，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
周天度主編，《七君子傳》，河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周偉嘉，《中国革命と第三党》，東京：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株式会社，1998。
邵燕祥，《別了，毛澤東：回憶與思考（1945-1958）》，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
金冲及，《轉折的年代——中國的 1947 年》，北京：三聯書店，2006。
金冲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
保羅．塔格特（Paul Taggart）著，袁明旭譯，《民粹主義》，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姜平，《中國民主黨派史》，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87。
姜平，《章伯鈞與中國農工民主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
彥奇、王幼樵編，《中國農工民主黨歷史研究：民主革命時期》，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4。
馬維政等編，《中國共產黨和民主黨派關係史》，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
張軍民，《中國民主黨派史（新民主主義時期）》，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6。
張憶軍，《風雨同舟七十年——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關係史》，上海：學林出版社，2001。
郭羅基，《歷史的漩渦——一九五七年》，香港：明報出版社，2007。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臺北：聯經，2001。
麥克法夸爾、費正清（Fairbank, J. K.）編，謝亮生等譯，《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革命的中國的興起：1949-1965》，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菊池貴晴著，劉大孝譯，《中國第三勢力史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
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香港：三聯書店，2008。
楊天石，《蔣介石真相之一 掌權：南京政府》，臺北：風雲時代，2009。
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係之研究》，臺北：東大圖書，1995。
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楊逸棠，《鄧演達》，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
楊維真，《從合作到決裂：論龍雲與中央的關係（1927-1949）》，臺北：國史館，2000。
廖風德，《學潮與戰後中國政治（1945——1949）》，臺北：東大圖書，1994。
聞黎明，《第三種力量與抗戰時期的中國政治》，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
齊茂吉，《毛澤東和彭德懷、林彪的合作與衝突（1954-1971）》，臺北：新新聞文化，1997。
編者不詳，《中國黨派》，南京：中聯出版社，1948。
鄭學稼，《列寧主義國家論之批判》，臺北：國際共黨問題研究社，1976。
錢理群，《拒絕遺忘：“1957 年學”研究筆記》，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
戴晴，《毛澤東黨天下野百合花》，臺北：新風出版社，1991。

四、論文

丁抒，〈論「陽謀」〉，收錄於丁抒主編，《五十年後重評「反右」：中國當代知識份子的命運》，香港：田園書屋，2007，頁 119-137。

王力平，〈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民主黨派的“中間色彩”淺析〉，《中國現代史》，期 9（1993 年），頁 19-23。

王玉，〈從「七君子」的背景看救國會的成立〉，《白沙人文社會學報》，期 2（2003 年 10 月），頁 213-236。

朱春燕、李鴻生，〈鄧演達品格初探〉，《學術研究》，期 12（1996 年），頁 67-71。

宋霖，〈公正評價 1957 年的章伯鈞——兼與《毛澤東傳（1949-1976）》作者商榷〉，《黨史研究與教學》，期 1（2005 年），頁 67-73。

宋霖，〈章伯鈞及其“紅色”家族〉，《黨史博覽》，期 6（2006 年），頁 11-14。

李福鐘，〈中國共產黨為什麼放棄新民主主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40（2003 年 6 月），頁 189-240。

李福鐘，〈關於「反右」起因的若干疑點與商榷——1956 至 1958 年中共政局再思考〉，《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期 27（2007 年 5 月），頁 43-98。

武菁，〈七七事變前《獨立評論》及其抗日宣傳〉，《紀念七七抗戰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1998 年），頁 1-23。

曹聚仁遺稿，〈民主同盟的形成及其下場〉，《傳記文學》，卷 72 期 1（1998 年 1 月），頁 77-82。

陳儀深，〈國共鬥爭下的自由主義（1941-194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23（1994 年 6 月），頁 237-266。

章立凡，〈“反右”與中國民主黨派的改造〉，收錄於章詒和編，《五十年無祭而祭》，香港：星克爾出版，2007，頁 125-204。

章清，〈“學術社會”的建構與知識分子的“權勢網絡”——《獨立評論》群體及其角色與身分〉，《歷史研究》，總 278 號期 4（2002 年），頁 33-54。

彭衛，〈農工民主黨在抗戰時期的積極作用評述〉，《重慶社會主義學院學報》，期 1（2005 年），頁 50-52。

童慶平，〈周恩來發展政黨協商民主的思想〉，《上海市社會主義學院學報》，期 6（2008 年），頁 26-30。

黃安余、邱格屏，〈周恩來對處理黨派關係的理論貢獻〉，《社會科學家》，期 4（1997 年），頁 87-91。

楊力，〈爭取中間勢力——記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在重慶與第三黨的交往〉，《重慶社會主義學院學報》，期 3（2005 年），頁 61-64。

五、學位論文

Olenik J. Kenneth, *Left wing radicalism in the Kuomintang : Teng Yen-Ta and the genesis of the third party movement in China, 1924-1931,*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h. D. dissertation , 1974.

文茂瓊，〈鄧演達社會主義思想初探〉，成都：西南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思

想政治教育碩士學位論文，2006 年 6 月。
李震雷，〈建國初期民主黨派在新中國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昆明：雲南大學科學社會主義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碩士論文，2007 年 5 月。
邵銘煌，〈抗戰前北方學人與「獨立評論」（一九三二——一九三七）〉，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79 年 6 月。
張曉芳，〈中國民主同盟之研究（民國二十八~三十八年）〉，臺北：國立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 年。
陳佑慎，〈鄧演達與國民革命軍政工制度〉，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08 年 6 月。
鄧麗霞，〈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共對民主黨派政策演變論析〉，武漢：華中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思想政治教育碩士論文，2002 年 3 月。

六、報刊資料

《人民日報》（北京），1950 年 10 月 1 日至 1957 年 7 月 7 日。
《獨立評論》（北平），1933 年 12 月 3 日，第 79 號至 1936 年 6 月 21 日，第 206 號。
《新華日報》（太岳版），1946 年 4 月 9 日至 1947 年 5 月 19 日。
《光明報》（香港），1946 年 11 月 18 日，新 7 號至 1948 年 6 月 16 日，新 1 卷期 8。

七、網頁資料

http://www.epochtimes.com/b5/3/9/28/n384381.htm。（下載時間：2007 年 6 月 4 日）。